

王佐榮 著

來去滿洲

滿洲國「虛與實」寫真

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

一個面積大於臺灣32倍的廣袤土地、一個曾是亞洲最富強的國家、一個承載眾人理想所建立的樂土、
一段被刻意埋沒與曲解的歷史。再加上臺灣人與滿洲建國之間的祕辛，以及出乎意外的密切往來。
滿洲的建設與成果，足以顛覆讀者的認知，同時臺灣人的投入也超乎想像。
無怪乎，1935年流傳於臺灣知識分子間的流行語，即為「來去滿洲」！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來去滿洲

王佐榮 著

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

滿洲國「虛與實」寫真

一個面積大於臺灣32倍的廣袤土地、一個曾是亞洲最富強的國家、一個承載眾人理想所建立的樂土、
一段被刻意埋沒與曲解的歷史。再加上臺灣人與滿洲建國之間的祕辛，以及出乎意外的密切往來。
滿洲的建設與成果，足以顛覆讀者的認知，同時臺灣人的投入也超乎想像。
無怪乎，1935年流傳於臺灣知識分子間的流行語，即為「來去滿洲」！

大滿洲帝國蘭花國徽與國歌

天地內，有了新滿洲。
新滿洲，便是新天地。
頂天立地，無苦無憂，造成我國家。
只有親愛並無怨仇，
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
縱加十倍也得自由。
重仁義，尚禮讓，使我身修；
家已齊，國已治，此外何求。
近之則與世界同化，遠之則與天地同流。

謝忱（筆畫順尊稱略）：
司馬文武、朱家煌、何思瑩、李博信、郭双富、許丙家族、黃隆正、張園家族、廖明睿、劉宜俊、蔡蕙頻

目錄

1. 「龍興之地」與「滿洲人」 3
2. 「臺灣經驗」的移植與關東州 37
3. 「王道樂土」幻影的誕生 63
4. 滿洲國中謎樣的臺灣人脈 127
5. 神光宇宙下的外交與國防 169
6. 蘭花綻放下的虛與實 193

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

滿洲
來去

1

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

「龍興之地」與「滿洲人」



女眞族的「龍興之地」

「滿洲」在地理上泛指今長白山、黑龍江周域，自古為通古斯族世居之地，而其後裔女真族在此建立起數個部落。於是「白山黑水」從此成為滿洲的代稱和女真族的精神象徵，同時更是其「龍興之地」。

廣義而言，大元與大清都是「阿爾泰民族」，屬於通古斯族的清太祖努爾哈赤（1559～1626）在統一女真各部落之後，1616年開國於「龍興之地」滿洲地區，建立「女真國」（Jusen Gurun）。1634年「大蒙古國」的共主林丹汗（1592～1634）死後，女真國的皇太極汗（1592～1643）承接了「大元帝國玉璽」；藉此他在1636年盛京（瀋陽）召開的「庫里爾台部族大會」中，被各阿爾泰大汗推舉成新任共主，此後「大清」等於實質上承續源自蒙古忽必烈大帝「大元」的領導權。而新國號「大清」（Daicing Gurun）一詞，在滿洲語當中則為「戰士之國」的意思。站在「大蒙古國」的法統上而言，大元與大清這兩個政權有先後承續關係，同時對大清國而言消滅在關內的明帝國不過就是「收復失土」的概念而已。

與之前的蒙古族所建立的「大元帝國」（Daion Yekhe Mongol Ulus，蒙古語「廣闊的大蒙古國」之意）相比，在中原失去政權之後還能全身而退、回到外蒙古生養之地不同。清太宗皇太極所建立的戰士之國「大清」在入主關內之後，有別於大元帝國的高壓統治，其繼任者為加速控制整個中國地區大幅起用漢人竊佔，最後造成滿洲族被人口佔絕對優勢的漢民族「同化」，而女真人的關外「龍興之地」也逐步被非法移民的漢人所蠶食鯨吞，等到政權覆亡之後滿洲故里已經變成有家歸不得。

在大清帝國崩壞之後，連「白山黑水」、「龍興之地」的滿洲先人根據地，也淪為新政權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對滿洲人而言，原本與中國毫不相干的故土，在政權交替之後卻被當作是新國家的「固有疆域」，站在滿洲人的立場抑鬱之情可想而知。這就好比1945年之後來臺的中華民國政府，如果主張曾統治臺灣的日本是臺灣領土的一部分，當時因戰敗無力反抗的日本人必然也覺得十分荒謬一般。

圖為日本治下的大連「大廣場」（攝於1928年，今中山廣場），該廣場最早由沙俄建於1899年，當時名為「尼古拉耶夫廣場」。



大清帝國的崛起

自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今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一統女真各部落、開國「後金」（滿文Aisin Gurun「大金國」）之後，經由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積極厚植國力並且稱帝成為蒙古各族共主，將「大金國」國號改為滿語中的戰士之國「大清」，並定滿語為「大清國」正式國語。至清世祖順治皇帝（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終於得以入關殖民，成為掌控中原的新政權，為便於就近統治新獲得的中國殖民地，最終將國都遷至關內北京。

清聖祖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即位之後，於1662年將大明帝國位於中國南方的最後反抗勢力（南明）剷除，同時敉平以吳三桂為代表的「三藩」漢人軍閥集團，徹底統一中國地區。從1618年明清戰爭爆發，到1662年由漢民族所建立的大明帝國滅亡為止，總共耗時44年，經歷大清四代君主。至此，在中國地區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政權，繼大元帝國入主中土之後第二度亡國，代之以由滿人以及蒙古王公所建立的非漢族殖民新政權統治。

既然皇太極在1636年繼承了「大蒙古國」的法統地位，大清國在「政治責任」上征討位於關內的朱姓王朝反叛組織成為君主的「天命」。雖然皇太極在位期間提昇國內漢人的地位，有才能者免除其原有的奴隸身分，但是這畢竟只是政治上的舉措，收復原先大元帝國失土、逐鹿中原才是大清立國的終極目標。同時雖然在若干政治制度上取法關內的中國政權，但身為阿爾泰游牧民族的子孫，皇太極依然諄諄教誨國人滿語騎射的重要性，深怕滿蒙貴族「服漢人衣冠，盡忘本國語言」遭到同化，可惜在歷經數代之後言之諄諄、聽之藐藐。

圖中為位於今遼寧瀋陽的「昭陵」（亦稱「北陵」）。在「昭陵」中，葬有清太宗皇太極與孝端文皇后（孛兒只斤・哲哲）。「昭陵」於1643年開始興建，至1651年基本建築架構宣告完成，後經多次增建，始成今日宏偉規模。



大元帝國與大清帝國的漢族政策

大清帝國的「漢族政策」與1279年消滅南宋的蒙古族大元帝國有所不同。大元帝國從世祖孛兒只斤・忽必烈大帝以降，對於漢人與漢文化採取「消極接納」的政策。同時在高壓統治之下，大量重用來自西域各國的「色目人」（元帝國對來自中亞、西亞、歐洲各色名目之人的統稱）為官。

由於大元帝國極盛時期版圖擴及歐洲，因此彙集各佔領區優點，在國家律法與典章制度上，採取伊斯蘭諸國的文化制度與漢民族文化制度混合並行。同時禁止漢族進入蒙古地區。也因此，在1368年元帝國滅亡後，蒙古族幾乎完整退回蒙古地區，並得以保存實力，使得繼承元帝國統治中原的大明帝國無從染指，形成雙方長期對峙的狀態。

反觀大清帝國，為延續在中國地區的統治國祚，積極漢化、融入漢族社會、大量起用漢人，甚至讓漢人移民滿洲。自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開始，更是醉心漢族文化，上行下效結果，使得滿文與滿語只在宮廷內或正式文書上使用，儼然成為「一種方言」的畸形現象，最終造成大清帝國晚期大權、軍權旁落於李鴻章、袁世凱等漢族官吏的後果，導致1912年在帝國覆亡之後，滿族人幾無容身之所，亦無力回到滿洲「龍興之地」再圖復興，徒呼無奈之下間接形成「大滿洲帝國」成立的遠因。

此外，滿人統治中原後期，憑藉豐厚俸祿而疏於投入國家大政，將朝政委由漢人主事，造成大權旁落亦是主因。此即好比，將企業的執行與經營權交由漢人專業經理人主導，而滿人只成為分享盈餘紅利的股東；時日一久，股東自然喪失經營能力，甚至不願實際經營企業。待企業虧損、破敗，滿人股東亦回天乏術。

圖中為位於今瀋陽東北方的「福陵」的隆恩紅門。「福陵」（亦稱「東陵」）中葬有「大金國」後金開國皇帝努爾哈赤，以及其后妃葉赫那拉氏、孛兒只斤氏。「福陵」於1629年在後金首都「盛京」（瀋陽）開始興建，於1651年初步建築完成，後經多次增建始成今日面貌。



俄羅斯帝國的入侵與潰敗

在大清帝國積極開拓帝國疆域的同時，俄國歷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維奇（Ivan IV Vasilyevich，1530～1584）也開始積極往俄羅斯帝國東西方向掠奪土地。1636年，俄羅斯人到達鄂霍次克海，俄羅斯帝國征服了西伯利亞全境。對領土擴張欲望極強的俄羅斯民族來說，接下來再由西伯利亞地區向南發展開拓亦乃必然之舉。

因此，自1652年開始，大清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發生多次領土爭奪戰。對大清帝國而言，這片位於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的廣大土地屬於大清「龍興之地」的一部分。於是在大清康熙皇帝的主導下，於1685年派遣滿人大將軍董鄂‧彭春擊退沙皇軍隊，摧毀俄國所自行建立的的雅克薩城（Yaksa）。同時在1689年9月7日，與俄羅斯帝國簽訂第一紙具國際法效力的《尼布楚條約》，劃定清俄兩國的明確疆界。

圖中為在雅克薩城外，遭清軍俘虜的俄羅斯帝國士兵，以及正被清軍驅逐出境的大批俄羅斯移民，在圖中明顯看出羅斯人的怨懟與屈辱。俄羅斯帝國在持續30餘年不斷騷擾大清「龍興之地」之後，終於在1689年與大清帝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兩國疆界為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到外興安嶺至海一線，嶺南屬大清，嶺北屬俄羅斯；西以額爾古納河為界，河東屬大清，河西屬俄國。

簽約儀式由大清帝國領侍衛內大臣赫舍里‧索額圖與俄羅斯陸軍上將戈洛文伯爵（Feodor Golovin）代表簽訂。該條約簽訂之後，俄羅斯帝國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雖然獲得貝加爾湖以東直到額爾古納河的領土，但是此後165年間未能深入滿洲奪取新的土地，同時因為被迫簽訂國界條約，深感奇恥大辱。然而，俄羅斯帝國南下覬覦大清領土的計畫並未就此終止。



趁人之危的《瑷琿條約》

在清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的165年間，俄羅斯帝國未曾一日終止過由西伯利亞南下滿洲的野心。1856年，清英法「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當時大清帝國內有「太平天國」內亂、外有英法聯軍攻佔大沽，在英法聯軍逼近天津、北京之際，對一直虎視眈眈於側的俄國而言實機不可失。

1858年5月，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Nikolay Muravyov-Amursky，1809～1881）率領哥薩克騎兵南下，在兩艘砲艦護送下來到瑷琿（Aigun）城內與大清「黑龍江將軍」愛新覺羅・奕山（1790～1878）談判，聲稱俄羅斯帝國將派兵保護協助大清，免受英法兩國聯軍攻擊。但條件是必須廢止《尼布楚條約》，改以「沿黑龍江、烏蘇里江劃界」。奕山在大清內外重兵交迫、京畿自顧不暇無法派兵前來滿洲相助情況下；穆拉維約夫又兵臨城下連續以砲艦實施砲擊威脅，在這樣典型列強「砲艦外交」的強勢作為之下，終於迫使大清在5月28日與俄羅斯帝國簽訂《瑷琿條約》。這項條約在1860年11月14日簽訂的清俄《北京條約》中獲得追認生效。

大清帝國頃刻間失去100萬平方公里土地，其面積約等同於之後的「大滿洲帝國」全部國土、日本本土的3倍、臺灣全島的32倍！俄羅斯帝國不費吹灰之力、未用一兵一卒即獲得此龐大土地與利益。《瑷琿條約》只是開端而已。

圖中為《瑷琿條約》的簽約儀式。簽約雙方代表為俄羅斯帝國穆拉維約夫總督（1809～1881，左執筆者）以及大清帝國愛新覺羅・奕山將軍（右方）。在簽約完成後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18～1881）喜出望外，認為穆拉維約夫總督收復了該國在《尼布楚條約》中的失土，立刻冊封總督為伯爵。目前俄羅斯在此土地上，設有阿穆爾州、猶太自治州、濱海邊疆區、薩哈林州（庫頁島）以及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等五個州級行政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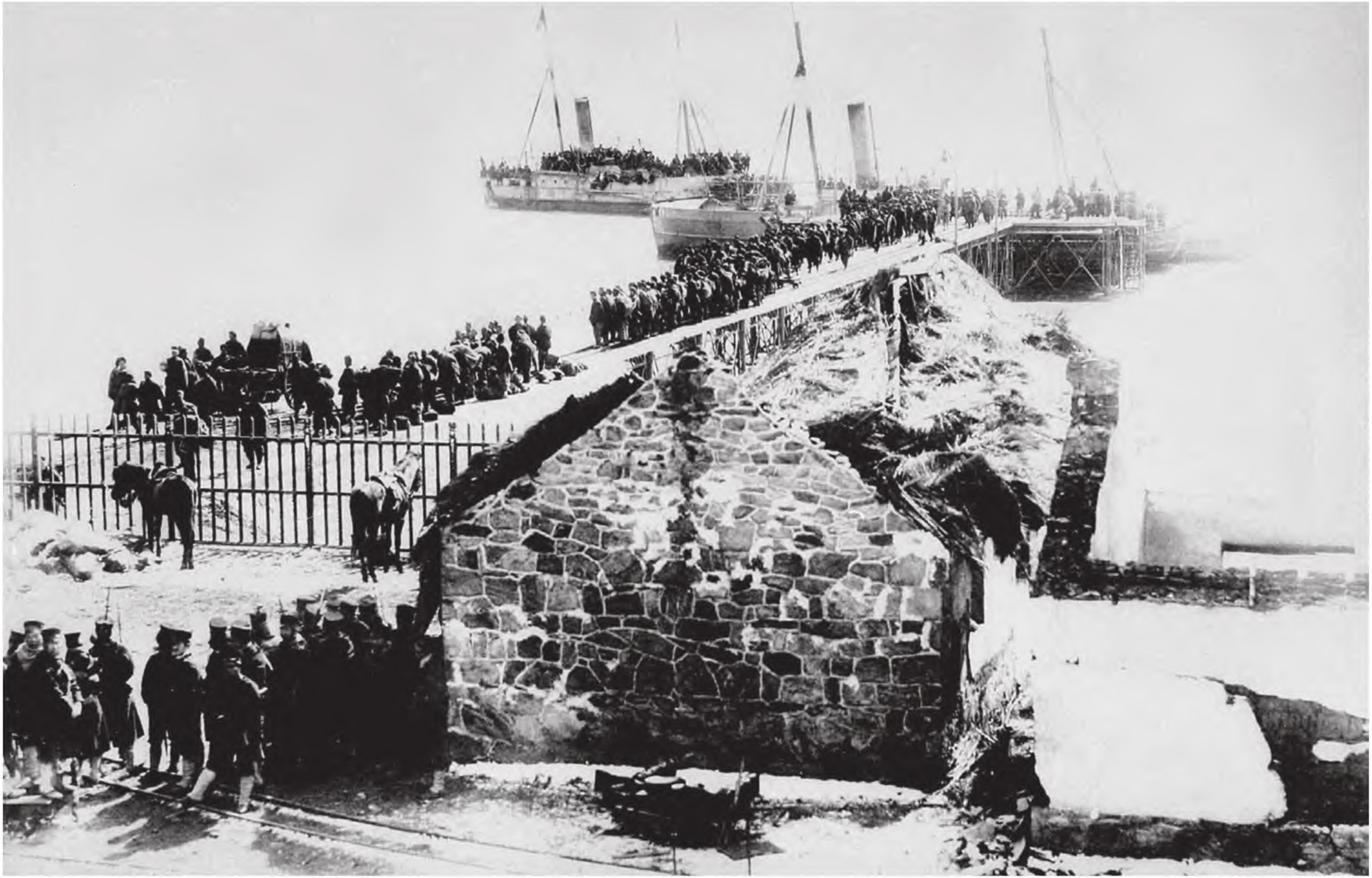


滿洲人口的空洞化與漢族移民關外

在滿洲人入關成為中國地區統治者之後，初期滿人在中國地區享有種種特權，當中包括可以任意掠奪原有漢族人的土地在內，於是滿洲人為獲得「戰利品」特權所帶來的利益與土地，爭先恐後移居中國關內，結果造成滿洲地區人口的空洞化。同時滿洲人的「龍興之地」，雖然總面積超過200萬平方公里，但是由於大量人口流失，致使廣大的土地幾無人煙。

順治皇帝在1644年短暫開放滿洲邊境，允許一定數量的漢人進入「龍興之地」移民，但這項讓漢族移入滿洲的政策不久即宣告終止。在滿人持續不斷外移的狀況之下，為防止漢人移入滿洲造成人口優勢導致「龍興之地」的加速漢化，康熙皇帝進一步在1668年頒佈禁止漢人移民的禁令。1735年大清乾隆皇帝登基，5年之後的1740年，大清對「龍興之地」採取更勝前朝的嚴厲「封禁政策」，完全禁止漢族出關前往滿洲。但是幾無人煙的滿洲的大片無人地帶，直接影響到與俄羅斯帝國之間的邊境防禦，這樣的「只出不進」的移民政策只會讓心懷貪念的北方敵人更加虎視耽耽。直到嘉慶皇帝（愛新覺羅・顒琰，1760～1820）主政後期，由於大清國內內亂頻傳、民變四起，朝廷無暇顧及關外，因此漢族難民與移民者藉機由河北、山東湧入，而滿洲地區由於住民稀少、邊防脆弱，也只能默認漢人偷渡移民「闖關東」的事實。

滿洲的漢人「封禁政策」一直持續到同治皇帝（愛新覺羅・載淳，1856～1875）在位期間才獲得解禁，其實部分原因是因為戰亂與天災，中國境內過剩的人口如同壓力鍋一般需要外移土地才得以紓解所致。特別是光緒皇帝（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在位的1878年還解除了漢族婦女前往滿洲的禁令，於是關內的男女老幼終於可以完全解禁名正言順的大批進入滿洲。從1870年代開始短短不到50年之間，滿洲人口由原先不到300萬人劇增至將近1,300萬人，新增人口幾乎全數為漢族，這也是造成在大清覆亡之後，滿人面臨「有家歸不得」窘境原因之一。圖為南滿地區金州城景象（今大連市金普新區）。



大日本帝國的國防戰略觀與《日清講和條約》

1894年爆發的日清戰爭，肇因於大清帝國的積弱不振與大日本帝國的戰略觀。（延伸閱讀本社《連合艦隊的黎明》）就當時新興的大日本帝國而言，首要重大戰略在於強化本身國力，避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前來吞併，同時為求自保必須躋身進入列強之林。以大日本帝國的戰略角度視之，俄羅斯帝國是其最大的威脅所在。

日本雖然是一個海島國家，但是從九州對馬島至朝鮮釜山僅僅只有50公里、從九州福岡至釜山也只有200公里之遙。日本認為俄羅斯帝國南下威脅是遲早的問題，因此必須有一個強大、穩定的朝鮮，作為大日本帝國防衛西北方的戰略縱深。當時的「李氏朝鮮王朝」是大清帝國的屬國，大清在該國擁有租界、屯兵、外交、經濟權。然而，作為朝鮮王朝「宗主國」的大清，在接連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已經是西方列強的俎上肉，既然無力自保，又如何侈言協助朝鮮抵抗俄羅斯帝國？

於是，從大清帝國手中廢除其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建立一個獨立的朝鮮國、強化朝鮮軍事能力以抵抗俄軍南下，是大日本帝國刻不容緩的選擇。在日清戰爭中，大日本帝國以24萬的兵力，對抗大清帝國63萬新式陸海軍；其結果以日方死傷17,069人，清方死傷35,000人收場。戰場則遍及朝鮮半島西岸、平壤、黃海、中朝邊境鴨綠江、遼寧旅順、山東威海衛、遼寧鞍山以及臺灣澎湖等地。

大清在陸海軍徹底戰敗之後，1895年4月17日由全權大臣李鴻章（1823～1901）作為代表，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簽訂《日清講和條約》（即《馬關條約》）。（延伸閱讀本社《帝國・臺灣》）在該條約中第一條即明訂：朝鮮獨立自主，同時解除一切與大清帝國間的從屬關係。在第二條與第三條當中則明訂：遼東半島、臺灣及澎湖諸附屬島嶼割讓予大日本帝國。日本藉此打算將其國防縱深延長至西面的滿洲與南方的臺灣。

此外，條約中還包括：大清需賠償2億銀元；被割讓地區人民有權販賣不動產後並自由遷徙選擇離去或繼續留住，而和約批准日起2年後未離開割讓地區者，即視其為大日本帝國國民；大清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予日本通商，並給予最惠國待遇；日軍於3個月內從大清領土內完成撤軍；清國同意日軍暫時佔領山東威海衛，以作為支付賠償金的擔保品；大清必須交還日軍戰俘並不得處刑與虐待，對於在戰爭中協助日軍的大清國民亦不得處刑與虐待；條約批准日起停止一切戰鬥；經由大日本帝國皇帝與大清帝國皇帝批准條約日期定為1895年5月8日，並於山東煙台換約。

圖中為，1895年2月12日，日清「威海衛戰役」結束之後，大清帝國北洋水師全滅，清國俘虜（中遠方）由大日本帝國運輸船艦運送準備遣返一景。這次的大清戰俘遣返工作，主其事者為福島安正陸軍大佐（1852～1919），其遣送與疾病控制的經驗也被福島安正運用在之後對「臺灣民主國」戰俘遣返作業上。（延伸閱讀本社《淡水新政記》）



列強的僞善與干涉

1895年4月23日，當俄羅斯獲知《日清講和條約》內容之後，立即表示反對條約中「割讓遼東半島予大日本帝國」條文。雖然舉世皆知俄羅斯帝國完全是出自於自我利益，不甘讓遼東半島落入日本勢力範圍。但是為增強反對勢力，因此結合法蘭西共和國、德意志帝國，共同具名反對，謂之「三國干涉還遼」。

對俄羅斯而言，南下滿洲遼東半島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同時還必須獲得旅順、大連等不凍港，如果遼東半島歸屬日本，俄羅斯擴張勢力必然受阻。對法蘭西、德意志而言，中國是一個可以長期盡情瓜分的沃土。如果遼東的土地讓日本一國獨得，就地理位置而言，大清京城所在的北京、各國租界所在的天津商港勢必受到威脅。更何況法俄兩國曾在1894年1月4日簽下《法俄軍事同盟密約》，法蘭西共和國響應俄羅斯的主張，既能符合「法俄同盟」精

神，又事關本身在中國的利益。此外，對日本獲得遼東半島一向採取「中立立場」的大英帝國與美利堅合眾國，為了平息各國利益的爭端，對日本採取規勸行動。要求大日本帝國遵守各國「平均分配中國利益」的默契前提，放棄獨佔遼東半島。

雖然在《日清講和條約》中日本提出的各項要求與條件，大清帝國均出乎預期的全盤接受。但是在日清戰爭爆發之前，其實西方列強並不看好日本會獲得最後勝利，在戰前觀察家與各國均推測在兵力、武器質量上都佔優勢的大清帝國將會獲勝。而日清戰爭的結果對大日本帝國而言，戰事的順遂程度與損傷的輕微，實在出乎人意料之外。

當時的日本，剛獲得「列強俱樂部」的入場券，因此不能不顧及西方列強的感受。同時，如果西方列強反對聲音日益強烈，有列強撐腰的大清帝國勢必不會讓《日清講和條約》如期在1895年5月8日生效。為免夜長夢多，1895年5月4日，日本對列強表明決定放棄遼東半島，其後並於同年11月8日與大清另訂《交收遼南條約》，大清以白銀3,000萬兩代價贖回遼東半島所有權。在那個帝國主義為主流的時代，世界各國假奉「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敗」、「物競天擇」理論，對弱小國家、人種進行支配剝奪；在此潮流的影響之下只有「侵略」與「被侵略」兩種選擇，各國憑藉武力作為後盾，大肆進行獲取商業利益的行為。同時「殖民」也被視為國力象徵，即使是標榜「市場開放、利益均分」的美利堅合眾國，同樣在菲律賓、中美洲、太平洋進行殖民運動。

圖中為當時描述日清戰爭之後，美其名為「三國干涉還遼」，實則列強準備進一步瓜分大清的諷刺畫。前排從左至右為大英帝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德意志帝國的威廉二世皇帝、俄羅斯帝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沙皇後方「法俄同盟」的法蘭西共和國與陷入長考、滿腹怨氣的大日本帝國。



荒謬至極的《李鴻章-羅拔諾甫協定》

1895年5月，由於德法俄三國的反對，因此日本決定放棄遼東半島割讓的議題。同年7月，俄羅斯帝國與法蘭西共和國還聯袂貸款給大清帝國，用以支付向日本贖回遼東半島的經費。1896年5月，欽差大臣李鴻章前往聖彼得堡，參加新任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68～1918）的加冕典禮。

6月3日，李鴻章與俄羅斯外交大臣羅拔諾甫親王（Aleksey Lobanov-Rostovsky，1824～1896）在酒酣耳熱之後簽訂《李鴻章-羅拔諾甫協定》（Li-Lobanov Treaty，又稱《清俄密約》）。該密約中明訂：當日本一旦侵佔俄國遠東地區、大清帝國與朝鮮領土時，清俄兩國將共同出動陸海軍作為抵禦；一旦對日本的戰爭爆發，清帝國所屬港口需開放供俄羅斯帝國軍艦使用；同時為方便作戰時俄軍部隊的補給運輸，大清帝國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修築鐵路（即之後的「大清東省鐵路」）並直達海參崴。該鐵路的修築與經營，交由「華俄道勝銀行」（Russo-Chinese Bank）承辦；俄羅斯在鐵路完成後，有權在任何時間運輸部隊與物資。

上述負責修築打通俄羅斯海參崴至滿洲吉林鐵路的「華俄道勝銀行」，其實是總部設在俄國首都聖彼得堡的俄國銀行，其業務專門負責俄羅斯帝國在中國的所有經濟利益。而李鴻章與俄羅斯簽訂此一密約的心態與背景，實在耐人尋味。因為此約一簽，即代表大清承認俄羅斯在滿洲的獨佔特殊權益，尤其是在《日清講和條約》中已經明訂大清放棄朝鮮的宗主權，日本勢力進入朝鮮已屬必然，因此，密約中的「當日本侵佔朝鮮領土，清俄兩國共同出兵抵禦」，已公然背離條約規定；且俄羅斯軍隊可隨意進出中國領土與港口，這已非假設性的問題，而是大清明顯對俄國的讓利。果不其然，1897年俄國假借保護大清名義，派軍艦從海參崴南下來到遼東半島叩關，同時在1898年3月與大清追加簽訂為期25年的《旅大租地條約》，以及延長「大清東省鐵路」從哈爾濱至旅順、大連的「南滿洲支線」條約。

李鴻章的外交思考，固然是基於「聯俄防日」的國防需求，但是的確也造成從《璦琿條約》以來，第二次對大清「龍興之地」的嚴重傷害。無怪乎外界另有「總理大臣李鴻章收受俄國50萬盧布、副總理大臣張蔭桓收受25萬盧布賄款」的傳言。

圖中為協助俄國修築「大清東省鐵路」的華籍苦力。該鐵路動用大批滿洲當地苦力，日夜不停的修築。而華籍苦力的婦女除協助張羅生活所需之外，還成為俄籍工程師的家庭幫傭。


192

俄羅斯帝國控制下的「大清東省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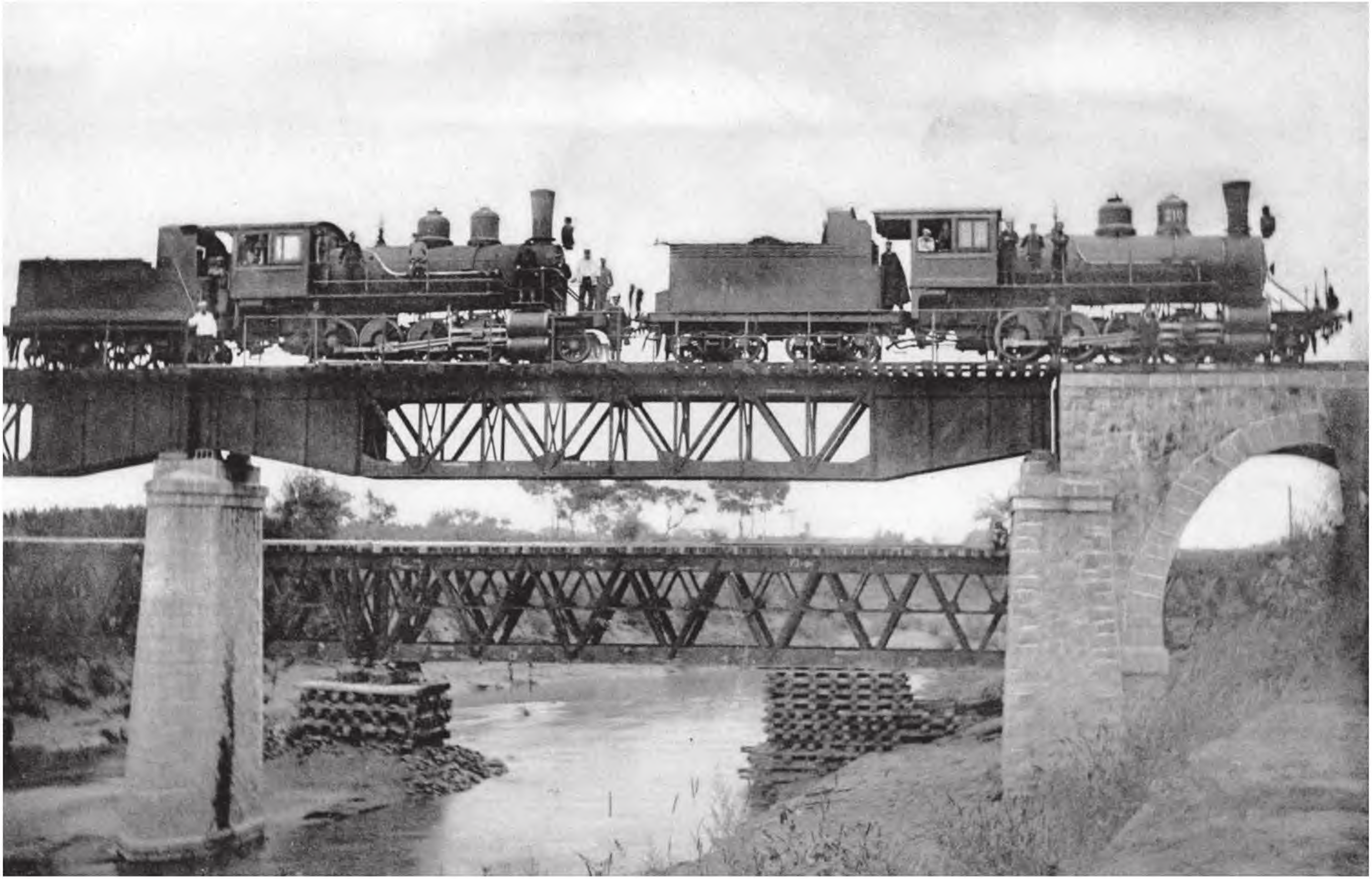
在李鴻章於1896年6月3日，與俄羅斯帝國簽訂一面倒的《李鴻章-羅拔諾甫協定》，對滿洲地區造成二度傷害後，1897年8月俄羅斯立刻開始興建「大清東省鐵路」（簡稱「東清鐵路」）。冠上「大清」兩字的這條鐵路，只是讓清帝國贏得面子，而俄羅斯帝國則是佔盡便宜，日後俄國勢力將大舉入侵滿洲人的「龍興之地」；然而對漢人出身的李鴻章而言，對這片土地則毫不帶情感，正如同臺灣的割讓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一樣。

「東清鐵路」，橫貫滿洲中北部，從俄國「外貝加爾邊疆區」首府赤塔（Chita）為起點，與1860年代完成的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形成環狀連結，途經滿洲西北部清俄交界城市滿洲里、滿洲中北部大城哈爾濱、滿洲東部清俄交界城市綏芬河直達俄國在《璦琿條約》中所奪取的天然不凍港海參崴。這項鐵路修建計畫，不僅讓俄國從赤塔到海參崴的鐵路車程縮短將近一半，同時橫斷滿洲的「東清鐵路」，讓俄羅斯帝國的勢力與軍隊可以快速長驅直入整個滿洲。

在20世紀前半，全世界蔚為主流的帝國主義，雖是以掠奪弱者為手段，獲取經濟、版圖利益為目標。但是俄羅斯從《璦琿條約》開始，趁火打劫、不宣而戰、哄騙兼施的行為一再發生。而其所經之地，必定奸淫擄掠、搶奪一空後，徹底破壞再揚長而去，實為包含大清在內的帝國主義各國中行徑最為卑劣者。1899年「東清鐵路」局部路段完工，通車典禮中以正式名稱「大清東省鐵路」稱之，但是鐵路經營權歸屬俄國「華俄道勝銀行」所有，因此對清帝國而言只是徒具形式毫不相干。

1898年3月俄羅斯帝國與大清又追加簽訂「東清鐵路」往南延伸的「南滿洲支線」條約。該路段是由哈爾濱出發，經長春、瀋陽、鞍山直達大連、旅順，同樣交由「華俄道勝銀行」旗下成立的「大清東省鐵路公司」負責經營與管理。

整個「東清鐵路」東西橫貫線以及南北縱貫線，分成「東段」、「西段」、「南段」同時動工興建，在滿洲土地上形成「T字形」動線。在俄羅斯雇用滿洲當地大批清國籍苦力不眠不休趕工下，1903年7月14日全線通車，效率之高前所未有。「大清東省鐵路公司」不僅獲得鐵路的經營權，同時也掌有鐵路沿線各項農、林、牧以及礦產的優先開發權。而大清帝國則是除了擁有一條徒具虛名的鐵路之外，鐵路開通的結果是造成整個滿洲門戶洞開，接著大量俄羅斯移民開始湧入。影像中為位於現今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的「大清東省鐵路」穆陵車站蒸氣車頭車庫。



日俄戰爭與南滿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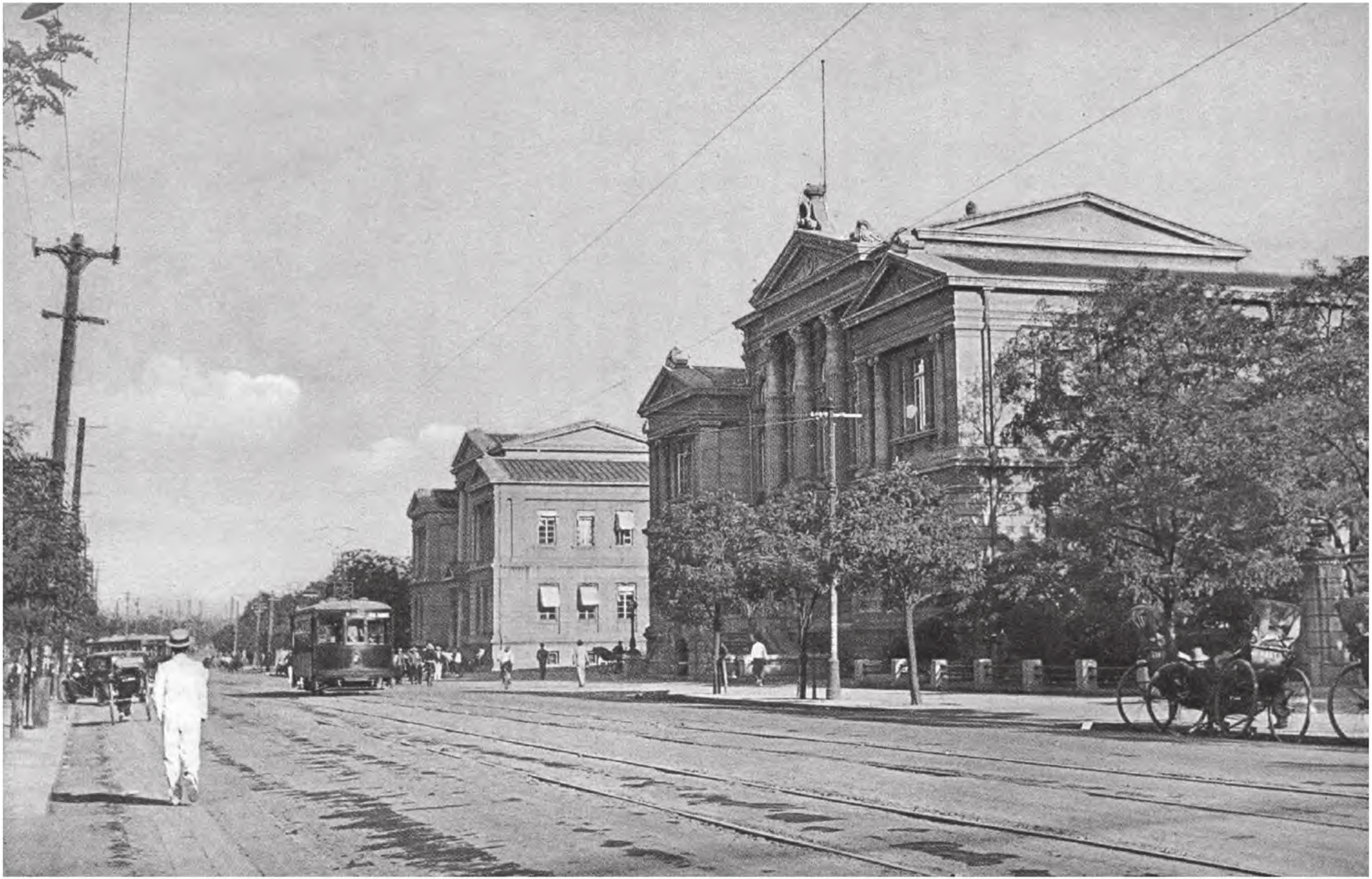
俄羅斯帝國在1899年至1905年之間，於滿洲南部租借地區設立「關東州」，將該地劃為半殖民地，而首任「關東州廳長官」正是俄羅斯帝國太平洋艦隊司令。1904年2月8日，日俄戰爭爆發。戰場遍及滿洲南部、黃海海域、朝鮮、庫頁島以及日本海海域。由於「東清鐵路」的全線通車，在戰爭期間，俄羅斯得以將來自聖彼得堡、西伯利亞的重兵與物資源源不絕往旅順、大連南送，致使日本在這場戰爭中倍感人力、物力的缺乏，進而付出重大的犧牲代價。在慘烈的戰爭中，大日本帝國以30萬兵力對抗俄羅斯帝國50萬大軍；其結果以日軍傷亡269,205人、俄軍傷亡188,660人告終。日本除贏得滿洲南部局部陸戰勝利之外，同時全殲了俄羅斯帝國太平洋艦隊以及「第二太平洋艦隊」。

日俄戰爭讓日本終於得以真正進入世界列強之林，之後還成為世界第三大海軍強國。臺灣第三任總督與第四任總督，乃木希典大將（1849～1912）及兒玉源太郎大將（1852～1906）也在此戰爭中一戰成名，成為國民英雄。

1905年9月5日，日俄雙方在美利堅合眾國的調停之下休戰，同時雙方簽下《樸資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該條約明訂：日俄雙方承認清國政府對滿洲地區除指定租借地之外的管轄權；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所有利益；俄國將旅順、大連租借地及其附屬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俄國將長春至旅順區段的「東清鐵路支線」，及其所屬的一切權利移讓給日本；日、俄兩國可在各自佔領的鐵路沿線駐軍；俄國宣佈取消在滿洲一切有違機會均等主義的權益；俄國將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庫頁島永遠割讓給日本。

由這個條約內容可以發現，雖然大多數的「利益產生地」與清帝國相關，但是清帝國卻完全被排除在談判桌之外，有關滿洲的各項特殊權利，只是由俄國手中落到日本手上。在10年之前用心計較策動「三國干涉還遼」，其後並投入大量的心血經營「關東州」、「大清東省鐵路」的俄羅斯帝國，如今只剩下東西橫貫線，而此項特殊利益假以時日也將岌岌可危。

圖中為俄羅斯「大清東省鐵路公司」的宣傳照，題名為〈火車向東而行！〉，1905年9月5日之後其中的「南滿洲支線」歸屬於大日本帝國所有。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誕生

大日本帝國依據《樸資茅斯條約》擁有「大清東省鐵路南滿洲支線」，從長春以南至旅順、大連的權利，也意謂滿洲長春以南被劃為日本勢力範圍。「大清東省鐵路」的重要性不僅是鐵路運輸本身，更重要的是鐵路沿線的相關經濟利益。為此，大日本帝國特別將在臺灣擔任總督時期治績有方的兒玉源太郎子爵調往南滿洲，擔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創立委員長」，該株式會社於1906年11月26日正式成立。經由兒玉子爵的推薦，與其共同在臺灣治理8年、實際掌管臺灣所有行政與規劃的後藤新平（1857～1929）民政長官，出任首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後藤新平上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後簡稱「南滿鐵」）總裁之後，立刻拔擢之前在臺灣總督府一同共事、擔任總務局長兼財務局長的中村是公（1867～1927）就任副總裁。其後，中村是公繼任後藤職位，於1908年12月19日升任「南滿鐵」第二任總裁。

《樸資茅斯條約》簽訂後長春以北的北滿洲經濟利益，依然歸屬俄羅斯帝國的勢力範圍。而大日本帝國在南滿租借地延續俄羅斯帝國的行政劃分設立「關東州」，但其背後的實際掌權者則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透過初期資本額2億日圓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及後藤新平總裁的初步規劃，延續在臺灣的治理經驗及人才對旅順、大連租借地做出長遠規劃，並且以此作為起點積極向北擴展。「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軍港旅順、商港大連為起點，在南滿佈下綿密的交通網，向東連結已經確立成為日本勢力範圍的朝鮮。為此，陸續增建了安奉支線（朝鮮邊境安東至奉天）、撫順支線（撫順至奉天）、牛莊支線（大石橋至營口）。

另外，在後藤與中村的規劃下，開始將大連、瀋陽、長春等都市實施現代化建設。由於後藤、中村等人沿用在臺灣總督府的行政、建設模式，南滿洲重要的都市開始擁有現代化建築物、自來水、下水道、現代化醫院、新式學校、圖書館、工廠、柏油道路、電力設施以及現代化港灣設計等相關周邊設施。而這些設施都是在俄羅斯半殖民時代所缺乏的。

為了要有一個穩定發展的南滿洲，日本的警察制度以及專職戍守南滿洲各鐵道支線的軍隊，也在後藤等人規劃下引進南滿。但是，當時的後藤等人萬萬沒想到，這支原本只是負責防衛「南滿洲鐵道附屬地」的鐵道守備部隊「關東軍」，未來竟然發展到凌駕於「南滿鐵」之上的跋扈地位。

圖中為位於大連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攝於1929年），該會社在極盛時期曾增資到14億日圓，擁有來自日本、滿洲、臺灣、朝鮮員工總數超過39萬人。



大清帝國的一夕瓦解

1911年10月10日，大清帝國「新軍」在武昌發動兵變，隨後於11日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以紅、黃、藍、白、黑的橫條「五色旗」為國旗。時任「新軍第21混成協」協統的黎元洪（1864～1928）被強推擔任都督兼司令部總長，直到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為止。

一時，大清帝國中有16個行政省響應革命獨立，但也因各獨立省大權掌握在軍人手中，中國從此陷入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1912年1月1日，孫文（1866～1925）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由各獨立省代表所組成的「臨時參議院」選舉出總統之前，以孫文暫代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位。1912年2月12日，大清帝國隆裕皇太后（即光緒帝孝定景皇后葉赫那拉・靜芬，1868～1913）代替年僅6歲的宣統皇帝溥儀發表《宣統帝退位詔書》，大清帝國於該日正式覆亡。

圖中為懸掛於北京紫禁城內太和門前的「五色旗」。1906年，經革命黨人「同盟會」討論，倡議以「五色旗」作為未來新共和國的國旗。「五色旗」中的紅、黃、藍、白、黑五色，分別代表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在1911年10月11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之後，即宣佈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1912年1月1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前身）在南京通過《國旗統一案》，確定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海軍軍旗。1921年4月7日，「中華民國非常國會」（非常時期國會）為打倒北方政治勢力，推選孫文為「非常大總統」（非常時期大總統）；為與「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有所區別，因此以孫文為首的南方政府公佈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而「五色旗」則直到1928年才被廢止。


Li Yuen Hung



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在中國共和革命之初，黎元洪（左圖）本為「新軍第21混成協」協統軍階（上校團長），為自保於革命之外免受波及，藏匿於友人家中。然而當時武漢地區革命黨高階人員均不在當地，因此黎元洪被強推而時勢造英雄地擔任了「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都督。其後，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1912年1月1日正式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臨時副總統」，並在1912年2月13日，隨孫文辭去該職。1913年10月7日，黎元洪被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為副總統。

而袁世凱（右圖，1859～1916）在共和革命爆發時，擔任大清內閣總理大臣備受朝廷信賴。1911年12月2日，各省代表在漢口召開會議，決議等待袁世凱「反正來歸」，並將選舉大總統一事暫緩，以便將此職位保留給袁世凱。

1911年12月29日，「同盟會」成員自行於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選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但此舉並不為國際所承認。於是，孫文只能致電袁世凱，聲稱「總統之職只是暫時擔任」。1912年2月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被首屆國會選舉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

由於民國創建之後各地紛擾不斷，中國南北幾近分裂，於是開始有人倡議君主立憲制度。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時，由全國選出的國民代表共計1,993位，就國體變更進行投票，結果全票通過君主立憲制。同年12月12日，大總統袁世凱宣佈變更國體為「中華帝國」，由其擔任皇帝。後因各方反對，「中華帝國」於1916年3月22日廢除，恢復共和國體制，袁世凱重新就任大總統。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逝，大總統職缺由黎元洪繼任。



民國初年的南北對抗

雖然當時表面上中華民國南北政府決定「議和」，但是南方的革命黨人其實不服讓袁世凱擔任「民國大總統」的承諾。1912年1月11日，「同盟會」人員以炸彈暗殺袁世凱未果就是一例；甚至孫文還打算以出讓中華民國利益的方式，獲得大日本帝國資助軍費（即《中日合辦漢冶萍借款合約》），以便與袁世凱對決。

但是在各國因顧慮中國內部動盪，影響其在華的各項既得利益而保持觀望態度下，孫文想奪回政權的期望無疾而終。1913年10月6日，中華民國首屆國會以全數贊成票，選舉袁世凱為正式的第一任大總統，並於10月10日就職，接受各國使節祝賀（如圖）。自此，由袁世凱所領導的、代表中國法統政權的北京中華民國政府，開始逐漸獲得世界各國承認。

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南北各地紛爭不斷，尤其是在1916年袁世凱過世之後，幾無寧日。袁世凱死後，北方政府群龍無首，分裂成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以及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

其實不只北方，長江以南也呈軍閥割據的局面，整個中國處於內戰狀態。正因如此，中國各地「恢復帝制」之聲再起。而世界各國直到1928年為止，依然承認「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權，而非南方孫文所領導的政權。

1917年5月，繼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針對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發生爭議。在實際掌握北京政府大權的「皖系」段祺瑞（1865～1936）被免去國務總理職務後，便策動各省督軍發動獨立。為此，黎元洪央請在「督軍團」中位高權重的張勳（1854～1923）前往北京調停。

1917年6月14日，張勳率兵進入北京，佔領車站與重要政府機關、結合復辟保皇黨人士解散國會、驅逐黎元洪。7月1日，張勳與康有為擁立溥儀復辟，「奉還大政」重建大清。在南方的孫文見機不可失，呼籲國會議員南下廣州，並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以便奪回政權。而真正具有軍權實力的段祺瑞，則組織「討逆軍」攻入北京。7月12日，大清帝國君主、時年11歲的溥儀二度宣佈退位。



末代皇帝的二度遜位

段祺瑞的「討逆軍」，對張勳部隊的攻擊毫不留情面，甚至在攻入紫禁城時還出動了北京南苑航空學校執行轟炸任務。圖中即為段祺瑞的「討逆軍」正準備攻入紫禁城場景。而「張勳復辟」的結局是，張勳逃至荷蘭公使館，其後轉至天津德國租界接受政治庇護，最終「復辟運動」相關人等獲得中華民國政府特赦免除其刑。

而溥儀在二度退位之後，由於各系軍閥與眾多現任中華民國重要官員都曾是大清官吏，因此對於遜帝還是延續袁世凱時代所給予的基本尊重，受到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禮遇與保護。

依據《清室優待條件》，溥儀在宮中依然使用宣統年號，以皇帝之尊自居。而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則對溥儀皇帝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禮遇對待；宮中年度相關支出四百萬兩由新政府撥付；原本大清帝國的先帝宗廟、靈寢由新政府派兵保護；之前宮中執事人員照常留用；遜帝之私有產業受到中華民國的特別保護；原有皇帝近衛軍雖編入新政府軍隊員額但人數、軍餉照舊。

在紫禁城中，效忠於大清的遺老依然對皇帝行跪拜大禮，並且宮內事務依然由「內務府」統管一切，另外設有「宗人府」（管理皇家宗室事務）和「慎刑司」（掌管宮內司法）。這樣「國中之國」的禮遇條件，原本讓新政府與舊政府之間保持相安無事，太平歲月一直持續到1924年因軍閥間的奪權大戰再度爆發而終止，迫使溥儀無處容身，進而出走離開紫禁城而淪為政治難民，最終促成了「大滿洲帝國」的建立。

《宣統帝退位詔書》

奉

旨朕欽奉

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
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
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
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
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
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
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
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
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
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
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
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
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
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
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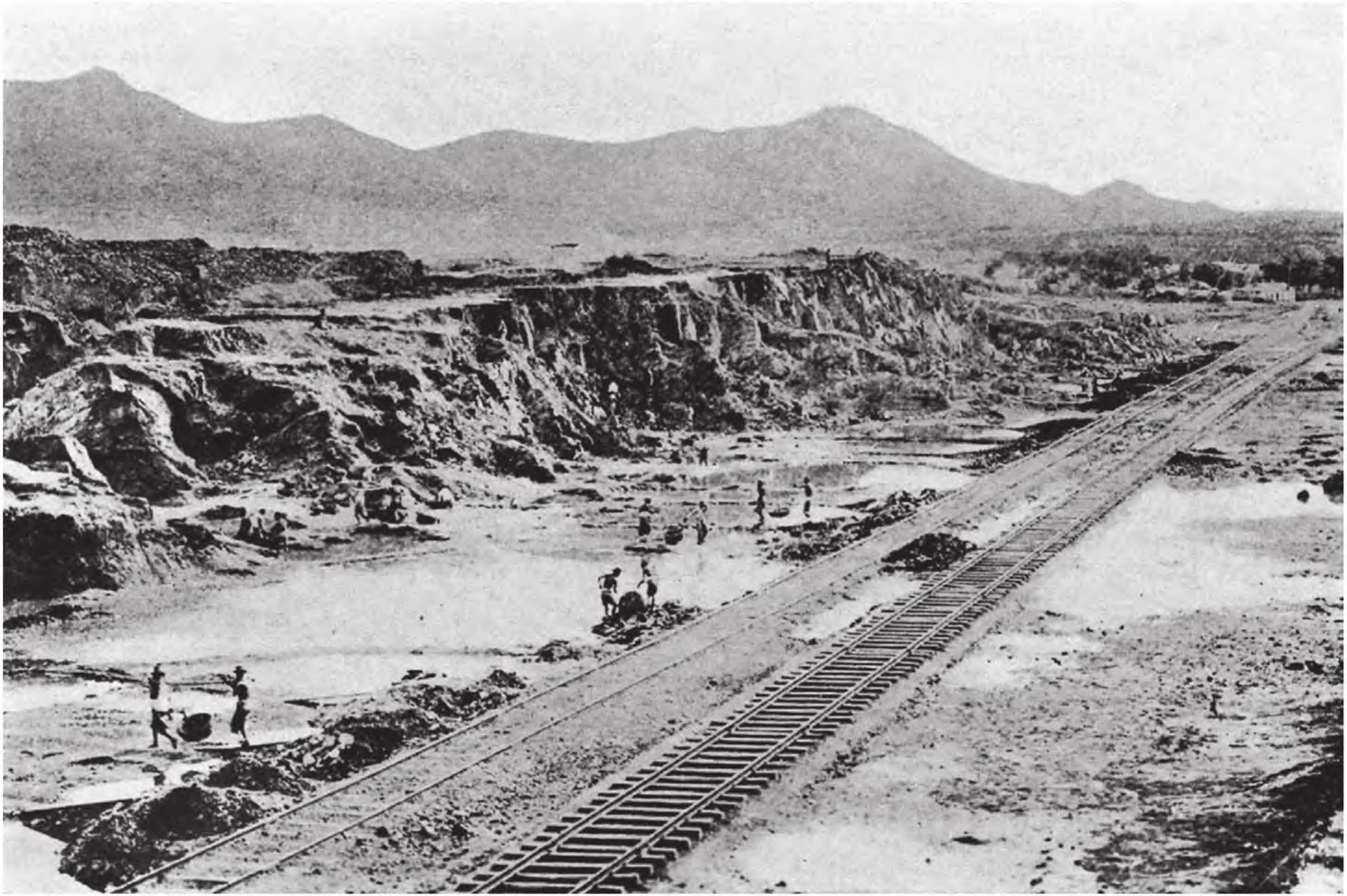
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兵變」之後，雖然陸續有軍隊響應共和，但是中華民國能否順利創建，全在「新軍之父」袁世凱的一人一念之間。同時世界各國對於發生在中國的共和革命，也是抱持觀望態度。為此，以孫文為首的革命黨人所成立的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提出條件，允諾袁世凱若能說服清帝遜位，同時支持共和，則推舉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於是袁世凱在1912年1月25日，率領各北洋將領公告全國響應共和；同年2月12日說服清帝發表《宣統帝退位詔書》（如圖）。同時袁世凱還說服南京臨時政府同意，讓遜帝以及大清皇室「**保持尊號永存不廢、享受歲費、民國待之以外國君主之禮**」的優渥條件。因此，大清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繼續居住在紫禁城中，享有國民稅收所提供每年400萬兩的供養。

2

滿洲來去

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

「臺灣經驗」的移植與關東州



旅順大連的現代化

在俄羅斯帝國取得旅順、大連之前，該地區只能用「一片荒蕪」來形容。

旅順雖然是一個天然軍港，但是對俄羅斯而言，該地的價值是在東方領土上獲得除海參崴之外的第二個天然不凍港。所有的建設目的不是在繁榮地方，而是在軍事用途之上。大連在1895年之前名為「青泥窪」，只是一個人口千餘人的小漁村，俄國租借之後改名為「達爾尼」（Dalniy，意為「遙遠的城市」）。因為該地腹地廣闊被規劃成為商港，同時也是「東清鐵路」於滿洲南方的終點站。在俄羅斯帝國統治時代的大連，藉由「東清鐵路」的修築，逐步呈現她的繁華與重要地位，實在讓人很難想像在鐵路完成之前的荒涼模樣（如圖）。

當日俄戰爭結束後，大日本帝國從俄羅斯手中承接這塊幅員遼闊的土地，根據之前俄國的基本規劃，積極迅速建設大連。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建設之下，將其逐步擴張成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都市。來自臺灣總督府的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以及諸多行政官員、建設人才，將其在臺灣統治、規劃的實際寶貴經驗，完全移植到這片經由數萬日本官兵犧牲才獲得的新領地上。

大連中央大廣場是仿造巴黎的都市設計，將整個空曠荒蕪的城市從中心圓環做放射狀配置。此一中央大廣場直徑213公尺，向四周放射的主要道路計有10條之多。居於廣場11點方向的建築是「橫濱正金銀行大連支店」、2點鐘方向為「大清銀行大連支店」（鄰有「臺灣銀行大連出張所」）、3點鐘方向為「東洋拓殖株式會社大連支店」預定地、4點鐘方向為「大連市役所」、5點鐘方向為「大連大和飯店」（參照40頁影像）、7點鐘方向為「英國駐大連領事館」、8點鐘方向為「大連民政（警察）署」、9點鐘方向為「朝鮮銀行大連支店」、10點鐘方向為「關東遞信局」（郵政電信局）。

旅順、大連大多數的主要道路、街町名稱都是來自明治時代軍人的姓氏，例如「臺灣銀行大連出張所」所在的「山縣通」（山縣有朋）、「大山通」（大山 巖）、「奧町」（奧 保鞏）、「西通」（西 寬二郎）、「兒玉町」（兒玉源太郎）、「乃木町」（乃木希典）等等；此外，也有以日俄戰爭時期軍艦艦名命名的街町名稱，例如：「敷島町」、「松島町」、「鎮遠町」、「薩摩町」、「扶桑町」、「秋津洲町」等等。日本在此地的建設與遠見，甚至超過對臺灣與朝鮮的佈局。雖然初步為的是能建設一個富強的半殖民地，但是其背後則具有「長治久安」的深遠用意。



大連大和大飯店

「大連大和大飯店」是大連的地標之一，完成於1914年4月。

「大和飯店集團」其實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關係企業。在南滿鐵路沿線大連、旅順、長春、瀋陽，以及大連郊外的「星浦渡假中心」（今星海廣場）、哈爾濱、阿爾山、牡丹江、海拉爾（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孫吳（今屬黑龍江黑河市）、東安（今黑龍江密山市），都建有大和飯店分店。其中最具指標性的就是擁有115間高級客房的「大連大和大飯店」。

「大和飯店集團」的設立，在「南滿鐵」初代總裁後藤新平時代就已展開，在他的思考當中，「南滿鐵」必須是一個兼具「文裝武備」（文武兼備）的大型集團。集團中除了交通、港口、採礦的硬體紮實事業之外，還必須有軟性的服務業、觀光業項目，而飯店事業就是「文裝」的開端。如此一來，才能利用「南滿鐵」招來日籍與外籍遊客，增加滿洲的觀光價值以及歲收。因此作為「南滿鐵」觀光業龍頭的大和飯店，外部建築及內部設備，與當時世界一級飯店相比都毫不遜色。

由於大連是「西伯利亞鐵路」延伸線「南滿洲鐵道」的尾端、連結滿洲與上海航線的起點，加上是日本統治下的「關東州」門面玄關，因此建築一座宏偉的飯店是必要的舉措。從1907年開始，「大連大和飯店」先是改裝俄羅斯所遺留下來只有13間客房的「達爾尼飯店」先行營業，其間歷經數次變動、擴張，最終在1914年於大連中央廣場（今中山廣場）全新建造這座地上四層、地下一層的文藝復興樣式建築。透過「大和飯店集團」的營運，除在滿洲各一級城市設有分店外，在滿洲二級城市也設有直營旅店數十家；此外周邊附屬事業還包括「滿鐵」車內餐飲服務、汽車交通租賃服務以及洗衣連鎖業務，等同是一個龐大的觀光事業集團。

在「大連大和飯店」的前方，豎立著大島義昌子爵陸軍大將（1850～1926）的銅像（如圖）。大島義昌參與過日清戰爭、日俄戰爭，自1905年起擔任南滿「關東州」的首任總督（1906年9月1日起改稱都督），而曾任日本第90、96～98任總理大臣的安倍晉三為其玄外孫。



完工於1920年12月的「朝鮮銀行大連支店」是大連中央大廣場同時代公共建築中最晚完成的。「朝鮮銀行」創立於1911年，其前身是1884年李氏朝鮮王朝委託作為託管韓國歲收的日本「第一銀行朝鮮總支店」。1902年，李氏朝鮮王朝改國名為「大韓帝國」之後，「朝鮮銀行」成為韓國的中央銀行代為發行流通紙幣。「朝鮮銀行」在大連設立支店之後，一度成為日本在「關東州」發行法幣的中央銀行。1932年滿洲國成立，於是「朝鮮銀行」在滿洲的中央銀行功能，轉讓給新成立的「滿洲中央銀行」。



設於大連的「關東州廳」。日本接收「關東州」租借地後，1905年設「關東總督府」於遼陽，1906年改稱「關東都督府」遷旅順。1919年廢都督府，軍政分離改置「關東軍」與「關東廳」。1934年整合駐滿機構設「關東局」於新京，廢「關東廳」改置「關東州廳」（1937年由旅順遷往大連，隸「關東局」）。「關東州廳」下轄：官房、內務部、警務部三大部門，管轄以大連為中心，含旅順、普蘭店在內之3,462平方公里土地，截至1935年轄區總人口約131萬人，其中83%為當地滿洲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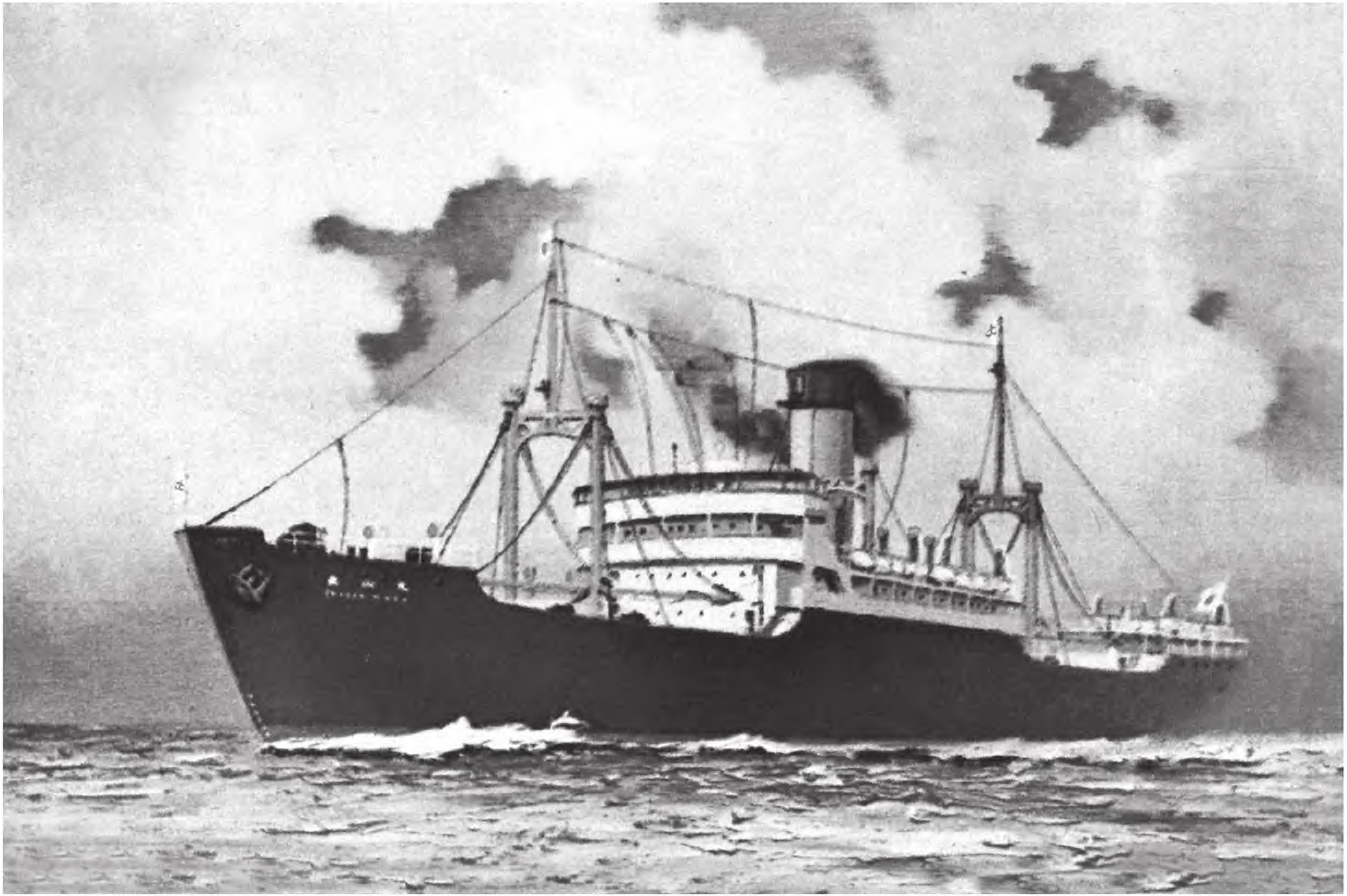
現代化思考的大連港與轉運碼頭

俄羅斯帝國、大日本帝國都欲奪之而後快的大連港，位於遼東半島南端，是滿洲地區的天然不凍港。港區（含水域）整體面積將近300平方公里，水位最深處達到17.5公尺，足以容納各大型商船入港。

1898年俄羅斯帝國租借旅順、大連時就開始初步港灣建設，隨著「大清東省鐵路」的通車，大連港正式於1902年開港，同時啟用第一與第二碼頭，因為鐵路可直達第二碼頭，人員、物資的輸運十分便捷。1905年，旅順、大連轉讓日本之後，日本「大阪商船」立刻在此開通定期航線。隨著「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成立，大連港的營運也歸屬該公司負責，同時「南滿鐵」也著手大連港的擴建工程，並於1920年完成第三碼頭。到了1923年，整建後的第二碼頭，已經可以讓數萬噸級的郵輪直接靠岸停泊。

影像中為1924年竣工的大連港「第二碼頭旅客轉運站」，這座兩層樓的龐大建築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負責規劃與建造，堪稱具有現代化思考的轉運站。由於大連港是眾多商船與旅客前往南滿洲的「玄關」，因此務必讓抵達大連的旅客留下深刻印象。在這棟半圓形建築的二樓，可以經由空橋直接銜接通往郵輪碼頭，旅客送往迎來皆在此完成，整體空間可同時容納5,000人以上。在「第二碼頭旅客轉運站」二樓當中配備有「大阪商船」的售票處、海關、遊客休息區、婦女專用休息室、圖書館、餐廳、「朝鮮銀行」外幣兌換處、商品販賣商店等等現代化設施，甚至連哺乳室都包括其中。

不僅如此，在「第二碼頭旅客轉運站」的一樓，旅客可以不用步出碼頭，直接搭乘直通於此的「南滿洲鐵道」或是各式車輛，前往滿洲地區各目的地。從1925年開始，在該轉運站的一樓，除原本的載運旅客工具外，又增加往大連市各主要道路的「路面電車」，進行市區內的旅客運輸。如此方便的轉運配置，不僅提高旅客的時間效率，同時更是將四通八達的「南滿洲鐵道」轉運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以當時大連港一年往來船隻高達3,500艘、貨物吞吐量達650萬噸、總貿易額高達6億日圓（約今日9千億元）的驚人數字而言，如此先進的規劃的確有其高瞻遠矚之處。



大連港的便利交通與臺灣航線

大連港的「第二碼頭旅客轉運站」，除了可以經由二樓「軌道移動式空橋」直接銜接通往郵輪，讓旅客得以免受小船接駁之苦之外，從1926年開始「第二碼頭旅客轉運站」的屋頂也開放給遊客使用，從此每當郵輪出發之際，船上旅客與位於轉運站屋頂的送行親友，相互投擲五顏六色彩帶熱鬧非凡。這樣的景緻，在當時的中國各地幾乎難以想像、前所未聞。

至此，大連已儼然成為中國地區繼上海之後的第二大國際性大都市，實難想像20年之前該地僅為一個小漁村的過往。1905年起，「大阪商船」率先以「舞鶴丸」作為首航大阪與大連之間的「日滿連絡船」（日本、滿洲間的定期商船）；之後「基隆丸」與「平安丸」也加入每週兩次的定期航班。到了1906年再加開「大義丸」、「大仁丸」、「鐵嶺丸」、「開城丸」四個航班。1907年，為運輸大量旅客「嘉義丸」、「天草丸」也加入營運。從1911年開始，原本往返基隆與神戶之間的「臺中丸」、「臺南丸」，也被抽調成為大連與大阪之間的定期商船。至於在「大滿洲帝國」建國之後，「日滿連絡船」的航班與船隻自然更加頻繁。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在1915年成立子公司「大連汽船株式會社」，負責大連對外的航運，其航線遍及朝鮮、中國、日本、臺灣、南洋地區各地。該公司在成立後短短幾年之間，即成為僅次於「日本郵船」、「大阪商船」的日本第三大船運公司。截至終戰為止，共計曾擁有115艘各型客、貨船隻。

自1896年起，臺灣與日本之間就有「內臺連絡船」（日本內地與臺灣定期航線），由「日本郵船」負責航運業務，這條由基隆到大阪的航線也稱為「命令航路」（臺灣總督府指定航線）。而其後因為日本、臺灣旅客往返日益頻繁，「大阪商船」以最新式、快速郵輪加入航運競爭。因此，當1905年「大阪商船」開始營運日滿航路後，臺灣基隆與大連之間可經由大阪作為轉乘站連結航路。

到了1931年，「南滿鐵」旗下的「大連汽船」開闢由大連至臺灣基隆、高雄之間的直航航線。「大連汽船」以3,235噸級、全新客貨兩用的「山東丸」以及「山西丸」作為該航線的定期船隻。每月定期往返三班，航程從大連至基隆約為3.5日左右。依照當時的船票顯示，頭等艙旅客票價約為53日圓（約今日7.9萬元）、三等艙旅客票價約為23日圓（約今日3.4萬元）。影像中為1935年加入直航大連—基隆—高雄之間的「大連汽船」客貨兩用輪「長山丸」，排水量近4,000噸。（圖：廖明睿）



大連陸橋與市街

在大連有許多「陸橋」，或是「高架道路橋」，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橋」與「常盤橋」。

「日本橋」位於大連車站附近，1899年為俄羅斯帝國所建，原名「露西亞橋」。橋的北側原本是俄羅斯統治時期的政府機關所在，但是在日俄戰爭中官方建築包含「露西亞橋」都遭俄軍毀壞。1907年，大日本帝國重新修築橋樑並命名為「日本橋」，該橋周邊還保有許多俄羅斯時代的民間建築。建造陸橋的目的是為了將交通動線立體化，例如「日本橋」一帶由於鐵路線交錯，因此需要架高路面讓火車於橋下行駛，而汽車、路面電車則通行於橋面之上。（如左頁圖）

另外位於大連市中心繁忙地帶的「常盤橋」，建造目的是為了將複雜交錯的汽車、路面電車交通做有效率的疏散與配置，該橋原本是一座清帝國時期修築的「青泥窪木橋」。在日本接收大連之後，為了規劃交織於當地的5條路面電車路線，因此改建成為一座現代化的陸橋。依據日本的規劃，該地區被劃定為大規模的商業區域，而此商業區最為繁華的道路則是「大正通」，沿途路面電車便捷、馬路寬廣、商店林立，其中「大連三越百貨」在1935年於此設分店。上述貫穿大連市的5條路面電車，是由「南滿鐵」旗下的子公司「大連電氣鐵道」負責經營，由此也可知「南滿鐵」事業體龐大，幾乎掌握「關東州」各項資源。

大連市整個市街面對東西寬達15公里的大連灣、背倚「南山」建築而成。而此市街的中心點，即為前述大連中央大廣場的圓環與放射狀道路。起初，在俄國人的規劃中，該城市的人口容量為4萬人。日本接手統治之後，將周邊地區納入都市計劃，除原本的「俄羅斯街」，再將「濱町」、「伏見台」、「聖德街」、「小崗子」、「沙河口」、「星浦」、「老虎灘」等地納入計畫，整合城郊區域以上百萬人得以生活、居住為目標。

而「星浦」地區是大連市郊的避暑、休閒重要地點。在此擁有現代化設備的海水浴場、遊艇船塢、網球場、「星浦大和度假飯店」、高爾夫球場以及著名的「星浦公園」等休閒娛樂設施，從大連市中心搭乘電車約30分鐘即可到達。恬靜宜人的「星浦公園」、由圓形小石構成的「星浦海水浴場」，是大連周邊居民以及旅居大連的外國僑民最心生嚮往的旅遊勝地。



大連在主要道路規劃上以路面寬度20～30公尺為基準，超越當時其他現代化都市的水準。在大連市區內，最為熱鬧的市街首推由老市街改建的「浪花町通」（如圖）。依照當時的敘述，「浪花町通」是名店匯集的不夜城；一到夜晚，數萬盞電力大紅燈籠高掛，景象極為壯觀；而街道上遊人如織，人力車、獸力車、計程車、公車往返不斷，形成有趣的新舊交錯交通景緻。在「浪花町通」周邊還有「伊勢町」也被稱為「大連銀座」，是舶來品、高級品、洋煙洋酒匯集之處，但是其價格只有日本內地的一半以下十分受到民眾歡迎。



由於大連被規劃成「貿易自由港」，因此在當時極為稀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商品，都可以獲得免稅優惠。遊客與居民可以透過搭乘「大連電氣鐵道」路面電車，往返各商業區以及各公共設施區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連路面電車自1909年開始營運以來至今仍在營運行駛，這些超過百年以上的路面電車車廂，繼續承載著百年來生活於此人們的悲歡離合。影像中為新開拓的大連「常盤橋通」寬闊的商業區，「大連三越百貨」則位於右方的第一棟高樓。



後藤新平與滿洲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首任總裁後藤新平，原本是具有醫學博士背景的文官，在沒有顯赫戰場功勞的狀況下，最終還能獲得伯爵爵位，可以想見後藤的確有其卓越之處。在卸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赴任滿洲之前，後藤顧慮「關東都督府」會對「南滿鐵」橫加指導，因此在要求「不得干涉南滿鐵」的「政經分離」原則下，才答應離開臺灣轉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職務。由於「關東都督府」專職行政工作，「南滿鐵」可以獨立專責於經濟建設，就其結果而言，實不得不佩服後藤新平的高瞻遠矚，才有今日的滿洲。

「南滿鐵」在極盛時期曾擁有超過80家子公司，事業內容含括礦業、冶鐵、港灣、電力、水道、瓦斯、醫療、農林畜牧、觀光旅遊，甚至航空事業。在後藤的規劃之下，「南滿鐵」成為滿洲地區的經濟、文化、衛生神經中樞，也藉由綿密的交通網形成血液動脈。為了能達成他的理想以及籌措建設基金，後藤甚至在倫敦公開發行「南滿鐵」公司債券，金額高達2億日圓。

身為醫學博士的後藤新平自然不會忽略醫療的重要性，尤其滿洲初期的衛生條件與日治初期的臺灣同樣亟待加強。滿洲最具規模的醫院首推「大連醫院」，是當時東亞地區規模第一的醫療、教學機構。該院設有581間病房，同時擁有當時屈指可數的傳染病隔離病房、緊急發電室、新式門診區域以及最現代化的手術設備與儀器。由臺灣前往滿洲發展的醫師，或是在「滿洲醫科大學」畢業的臺灣本島人，「大連醫院」是其就業的第一選擇。

「南滿鐵」第二任總裁中村是公依據後藤新平的構想，在1913年向日本政府提出於鞍山設置「製鐵所」的建議。1918年「鞍山製鐵所」正式開始營運，滿洲的製鐵事業於焉展開。1933年，「鞍山製鐵所」被「昭和製鋼所」合併。在1935年度，「昭和製鋼所」職員就超過2萬人，生鐵產量達471,725噸、鋼鐵產量達211,564噸。到了1937年，奉「關東局」之命，「南滿鐵」不得不讓出「昭和製鋼所」的經營權，被「滿洲重工業開發」合併，最終年度生產360萬噸鋼鐵，佔全滿洲鋼鐵生產量的一半。圖中為1928年，運用「鞍山製鐵所」所製造的鋼鐵，由「南滿鐵工廠」生產的煤炭動力火車頭組裝一景。



世界首屈一指的撫順工業區

一般認為大日本帝國於1905年從俄羅斯帝國手中獲得的僅只「旅順大連租借地」而已，其實在前述1896年疑雲重重的《李鴻章-羅拔諾甫協定》中，大清帝國所出讓的還包括「東清鐵路附屬地」的權利。因此，日本除「旅順大連租借地」之外，還從俄羅斯手中獲得「南滿洲鐵道附屬地」的權利。而所謂「附屬地」一詞只是大清自我安慰的用語，其真正的意義則是長春以南全由他國統治。一言以蔽之，即「鐵路所到之處，就是治權範圍所到之處」。由此可知，李鴻章的一紙協定帶給滿洲「龍興之地」多大的損失；無怪乎後世有人對辜顯榮問到對李鴻章的評價時，他不假思索回道：「大漢奸！」（延伸閱讀本社《辜顯榮翁傳》）

圖中的撫順礦區即是其中一例。撫順最著名的是其東西長17公里、南北寬4公里的「露天煤礦」，無須挖掘深埋於地下具危險性的礦坑，在地表上就能採集到煤、鋅、油頁岩、泥炭、金、銀、硫化鐵銅等礦產。據日本當時估計，僅煤礦一項就擁有百億噸以上的儲量，同時煤層最厚處高達120公尺，居全世界之冠。

撫順在大清之前是女真族聚集之地，1384年大明帝國在此建城。西元14世紀，高麗人就留下在此採拾煤礦的記錄；大清建國後，因此地為「龍興之地」，一律禁止外人前來採掘，直到1901年大清以政府公辦為主體，開始於此進行採礦。1896年以後，俄羅斯帝國將「東清鐵路」沿線一律劃成「附屬地」，在「附屬地」上俄國享有「治外法權」，亦即大清帝國只是名義上的土地擁有者，俄國實質上統治一切，並在撫順礦區進行大規模的開採。

1905年之後，大日本帝國在撫順車站周圍廣大土地開始建設，基於地利之便除了採礦之外，還設立許多煤炭、石油、天然氣、化工、冶金、機械等大型工廠，撫順一夕之間成為滿洲的重工業集中之地。為了滿足超過10萬勞工的生活起居所需，「南滿鐵」在此建立學校、醫院、公會堂、實驗室、上下水道、現代住宅、戲院、公園等設施。而1909年，首任「關東都督」大島義昌在旅順設立的「旅順工科學堂」，1922年升格為「旅順工科大學」，下設機械工程學、電氣工程學、礦業學、冶金學等四個學系，可以培養整個撫順工業區所需要的重工業技術人才。



煥然一新的營口市街

「南滿洲鐵道牛莊支線」是指由大石橋至營口的鐵路支線。營口與大石橋位於遼東灣東北部，大遼河在此出海。

大石橋地區擁有豐富的鎂礦，因此也被稱為「鎂都」。在1856年的大清與英法聯軍「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慘敗的大清於1858年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在該條約中，遼東半島的牛莊被劃定為對外通商口岸。後經英國勘察，發覺牛莊河道淤淺，大船無法進入，於是強行改定位於大遼河入海口、水深港闊的營口為通商口岸，但因條約已經簽訂內容無法更改，因此對外仍稱牛莊，再次見證大清官員「自我安慰」的心態。從此，營口對外貿易頻繁，是當時滿洲地區唯一的對外商港。

在大連成為商港之後，營口對外的商業機能依然持續。原本營口只能停泊一般帆船或小型船隻，在大日本帝國接管之後開始在營口興建現代化碼頭設施，因此輪船等大型船隻也可靠岸裝卸貨物，在商業上的重要性未曾改變。

隨著營口的現代化，煥然一新的營口新市街也開始出現。上下水道、電氣設施、學校、圖書館、公園，甚至動物園等公共建築的興建，讓原本即具備商業機能的營口更加繁榮發達。不僅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在營口設有支店，各國也相繼在此設立領事館，以利諸項商業進行，足見營口此地的關鍵地位。

雖然當時營口人口只有14萬人左右，但是為了支應營口的港灣貿易需求，在營口地區還設有「商業實習所」，讓有志從事商業、對外貿易的滿洲青年，有機會接觸到現代的商業法則與實務操作。營口港最大的特色是，可以經由遼河將貨物深入滿洲內陸；當冬季來臨，港口、遼河結冰，只能改由冰上行走，以雪橇作為交通工具進行貨物運輸。

影像為營口「南本街通」，右方為「營口商工會議所」以及「營口電信局」，是日本產業經濟的中心。1905年7月，日本將原本「營口電業局」所在之處的南北路作為界地，劃定交界地以西為舊市街，交界地以東為新市街。



名不符實的奉天統治權

奉天（瀋陽，滿語Simiyan）為大清發祥之地、建國之都。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運」之意，將原名「盛京」（滿語Mukden）的該地改名為「奉天」，並設有「奉天府」。在大清帝國時期，於奉天設有「盛京將軍」，統管奉天（遼寧）的行政、衛戍相關職責。大清覆亡之後，滿洲（東北）地區名義上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管轄。

1916年袁世凱身故，長江以北各地軍閥大分裂。其中「奉系軍閥」張作霖雖出身馬賊，但1902年為當時「盛京將軍」伊拉里・增祺（1851～1919）所招降收編，擔任「游擊馬隊管帶」，其後逐步晉升為「奉天巡防營前路統領」。而接收大清與中華民國在東北勢力的張作霖，就是以奉天為根據地。雖說「奉系軍閥」以滿洲奉天為根據地，但是依據《樸資茅斯條約》，大日本帝國擁有「南滿洲鐵道附屬地」，當中包括奉天的行政、司法、警察權在內。承續大清帝國法統的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將「南滿洲鐵道沿線附屬地」無償出租給日本，因而中華民國在南滿洲地區的管轄權實際上還是大日本帝國所有，必須依照日本的指示與政策行事。

總之，從1896年大清與俄羅斯的《李鴻章-羅拔諾甫協定》簽訂以來到中華民國建立，中國雖聲稱「有效統有東北」，實情則為只是「無割讓之名但具割讓之實」的自欺欺人說法。

影像中為奉天車站前一景。該車站是由日本大建築師辰野金吾（1854～1919）的弟子太田 毅以及吉田宗太郎所設計。辰野金吾的代表作之一，即為今日的東京車站。太田與吉田依據恩師的設計進行修改之後，在紅磚建築本體之上，中央及兩側安置著一大、兩小青銅圓頂，屬於「歷史主義型式」，同時以白色飾帶來作為紅磚建築的平衡調和。在臺灣，有許多「辰野式建築」，其中最著名的是由辰野金吾親手修改完成的「臺灣總督府」（今總統府）；其他辰野門生的作品還包括：「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今臺大醫院）、「八角堂市場」（今臺北西門紅樓）、「臺中州廳舍」（今臺中市政府）、「臺中驛」、「臺南州廳舍」（今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北州廳舍」（今監察院）等等。「奉天驛」於1910年10月1日落成，對當時人口總數只有30萬人的奉天而言，該車站具可提供年度超過50萬人次運量的前瞻性規劃。



奉天中央大廣場

奉天是南滿洲中心點的大都會，為南滿鐵路（北抵哈爾濱）、安奉支線（奉天至安東，可通往朝鮮）、奉山鐵路（奉天至山海關）以及撫順支線（即「奉海鐵路」，奉天至海龍）的交會點。因此可由此前往歐洲、俄羅斯、朝鮮、中國境內各地。

在車站周邊，「南滿鐵」規劃成新市區，並且以奉天車站為中心形成「浪速通」（今中山路）、「千代田通」（今中華路）、「平安通」（今民主路）等放射狀道路。從奉天車站通過「浪速通」的另一端即為「奉天中央大廣場」（1919年改稱「浪速廣場」）。沿途各大銀行、商場、醫院、「奉天醫科大學」、警察署、消防署、公會堂、「滿鐵奉天電力公司」、博物館等林立。圓環設計的奉天大廣場（如左頁圖），中央豎立著「日俄戰爭紀念碑」，而左前方建築即為「奉天大和大飯店」。

隨著新市街的建造完成，許多現代或是西洋式的新興商店也開始營運。對當時的奉天市民而言，在「奉天中央大廣場」周遭，品嚐咖啡、西式紅茶、啤酒、洋食餐點、蛋糕等商品，是當時最為時髦的新鮮事物。藉著西式生活的導入，這些商店、餐廳成為休閒娛樂以及社交場所。為了幫自家商店進行宣傳，各商號開始製作具有自我特色的火柴，因此蒐集各店家火柴也成為當時民間的新興嗜好。奉天新市街面積遼闊，在此廣大地區中，以「奉天中央大廣場」為中心分為「千代田通」與「浪速通」兩大區塊。「浪速通」上各大型公司行號聚集，因此也被稱為「奉天銀座」。這兩條大馬路上，來自日本、中國的百年老店、一流名品比肩而立，而來自臺灣的茗茶商店與藝品店也羅列其中。從某個角度而言，滿洲各都市的規劃其實就是「臺灣經驗」的放大版，圓環、綠地、公園、新舊市區的配置，處處可見其痕跡。

整個奉天城分成三大區塊，分別是「新市街區域」、「商埠區域」以及「城內區域」。「城內區域」屬舊市區，原為滿洲人聚集之處；在此區域中，除了是滿人生活圈之外，還有著後金時代的帝王陵墓以及奉天故宮；而素有「天下第一關」之稱的山海關至奉天的「奉山線」鐵路，也是以此作為最東端的起點。奉天「城內」的「四平街通」是傳統的滿人居住區域與商店街所在。由於電力引進「城內」是在1910年代，當時的電力設備對「城內」而言尚在啟蒙時期，許多從大清遺留下來的房屋尚未擁有全面電氣化設計，因此在初期階段只能先行由電線桿拉出電線到民宅用以供電。

1939年滿洲國版圖與行政區劃



滿洲來去

3

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

「王道樂土」幻影的誕生



溥儀的少年宮中歲月

大清帝國最後一任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首次即位時年不滿三歲，直到1912年首度遜位時也僅六歲。在「張勳復辟」恢復大清帝國短短的12天中，年方11歲的溥儀二度即位與遜位。在1912年之後，前清皇室依據中華民國《清室優待條件》，溥儀與皇室繼續在紫禁城中生活，而各王爵也持續居住在各自王爺府之內。然而，從康有為以下的各前清遺臣與王公貴族，沒有一天放棄「恢復大清」的志願，因此溥儀就成為眾人的唯一希望與指標。

溥儀在宮中並非無所事事，因為他是大清帝國最後一任皇帝，也是大清未來之所繫。因此，兩位「翰林學士」，陳寶琛（左圖右，1848～1935）以及朱益藩（左圖左，1861～1937）分別在1911年與1915年起擔任溥儀的漢學老師，對少年溥儀的人格養成有著重大的影響。

陳寶琛在光緒年間就以「直諫不諱」著稱，在1879年俄羅斯帝國出兵入侵新疆哈薩克伊犁地區時，就曾力陳主戰。同時在大清末年之際，強力主張變法圖強。除了在教育界素有清望之外，還曾在1905年擔任「福建鐵路總辦」，奉旨修築「漳廈鐵路」（廈門嵩嶼至漳州江東橋），該鐵路是福建地區的第一條鐵路。1909年重新回到北京宮中任職，最終成為「漢軍副都統」、「弼德院顧問大臣」（類似國務院）。從1911年起擔任溥儀老師，即使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依然堅持追隨幼帝。

而朱益藩則為南宋哲學大師朱熹後代，其書法之精湛享譽當代。1907年還曾出任北京「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總監督（校長），為人剛正不阿，同樣直言善諫。中華民國建立之後拒絕與新政府、革命黨人往來，1915年入宮擔任溥儀老師。

溥儀在上述兩位老師身上學到的不僅是紮實的漢學根基，其他諸如天文、歷史，甚至民國政情的發展，溥儀都透過兩人的傾囊相授獲益良多。陳寶琛與朱益藩把溥儀當成大清最後一根浮木，完全依照培育帝王的方式加以教導；而溥儀也是勤勉不休的學習，充分具備身為帝王的自覺。這一切都是為了有朝一日復辟做準備，特別是在中華民國初年的混亂局面，庶民百姓未受「共和之利」反而先受兵禍之苦的情勢下。在宮中的溥儀，絕非吳下阿蒙或是不問世事；相反的，他極具自我思考能力，時刻等待機會「復我大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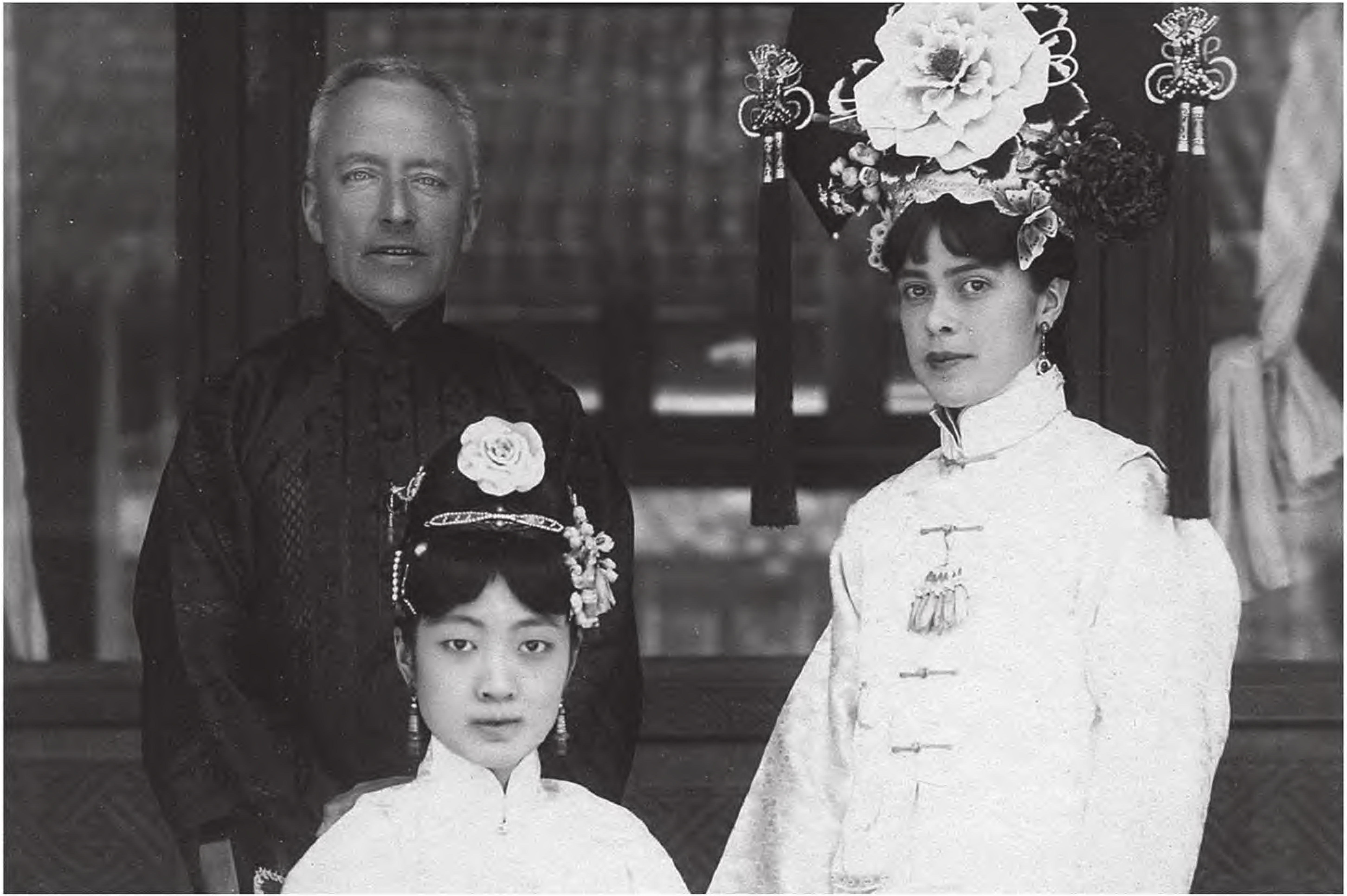
溥儀的國際觀

溥儀從6歲開始除了先後隨陳寶琛、朱益藩、徐世昌、袁勵準、梁鼎芬等大儒學習漢文之外，1919年，在曾經擔任大清「欽差出使英國大臣」的李經方（李鴻章之子，1855～1934）力薦之下，英國人莊士敦爵士（Sir Reginald Johnston，1874～1938）被延聘入宮，擔任溥儀的外籍教師。莊士敦爵士這名英國人從此破天荒成為大清皇帝首位外籍教師，直到1927年他被大英帝國任命為山東租借地「威海衛行政公署辦事大臣」為止。

莊士敦在溥儀13歲起為少年皇帝開啟了一扇通往現代世界巨大的窗。莊士敦得以入宮任教，與時任「攝政王」的溥儀生父愛新覺羅．載灃（1883～1951）有著極大的關係。載灃在身邊前朝遺老的建議下，認為大清覆亡與未能變法西化有密切關係，因此讓少年皇帝能熟知世界事務，不論是對「他日再起」或是作為一個「現代君主」，均有所助益。同時習悉世界各國時事與接受現代西式教育，對於溥儀的未來將會有進一步的提升。

莊士敦爵士為蘇格蘭人，先後就讀於愛丁堡大學以及牛津大學，從1898年起就被大英帝國外派至亞洲華人地區任職，對中國政情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莊士敦所教授的項目包括：英語、數學、世界歷史、世界地理，這些都是溥儀所未曾聽聞過的新事物，因此兩人相處極為融洽，而溥儀對於學習也非常熱衷。受到莊士敦的影響，溥儀開始穿起西服、騎著腳踏車與摩托車，甚至在1921年將象徵「大清統治」的辮子剪除。溥儀在莊士敦與曾擔任「湖南布政使」、負責官營「上海商務印書館」的鄭孝胥建議下，將宮中1,200名前朝遺留的宦官、宮女解除職務厚禮遣送返鄉，成為轟動京畿的重大事件。

透過莊士敦的教導，溥儀不僅習得流利的英語，同時對「現代化皇權」觀念有著深刻的影響與認知。因此，溥儀的國際觀不僅在此時獲得建立，同時對於「君主立憲」的現代皇權理論也由此萌芽。左圖左起莊士敦爵士、溥儀皇弟愛新覺羅．溥傑（1907～1994）、皇后婉容之弟郭布羅．潤麒（1912～2007）、溥儀於紫禁城御花園合影。右圖為三位皇子的宮中青少年歲月。



溥儀大婚立后

中華民國初年兩大政治集團南北較勁、各地軍閥交相征討，似乎全中國唯一平靜、安逸的地方反而是紫禁城宮中。

1922年12月1日，時年16歲的溥儀大婚，立郭布羅·婉容（1906～1946，左圖坐者）為皇后，封鄂爾德特·文繡（1909～1953）為淑妃。在此之前，中華民國各路軍閥人馬，爭先恐後亟欲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溥儀，以便更加鞏固自我政權的正當性，其中包括袁世凱、張作霖、張勳等政壇重量級人物。大清歷代皇后，除了乾隆的魏佳氏（1727～1775，在身故20年後才被追封為皇后）是漢人之外，其餘都是滿蒙族人，溥儀自然也遵循此傳統原則。在「攝政王」載灃及光緒皇帝的遺孀等諸太后、太妃的安排下，溥儀最終選擇與「滿洲正白旗」出身的婉容和「蒙古鑲黃旗」出身的文繡完婚。

郭布羅·婉容為前清「世襲一等輕車都尉」郭布羅·榮源（1884～1951）之女，婉容立后後，榮源被溥儀任命為「總管內務府大臣」。1913年，溥儀退位後榮源舉家移居天津，婉容曾進入教會學校學習；此外聘有美籍教師任薩姆女士（Isabel Ingram，左圖右）教導其英文、鋼琴、西方繪畫，可謂是十足的現代女性，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並以「伊麗莎白」（Elizabeth）英文名自稱。其後，婉容的長兄郭布羅·潤良（1904～1925）與溥儀大妹韞媖成婚、其弟郭布羅·潤麒（1912～2007）也與溥儀三妹韞穎成婚。受到莊士敦爵士（左圖左）英文薰陶的溥儀，與婉容之間在婚前婚後有許多書信往來相互均以英文書寫。

溥儀大喜之日，中華民國政府出動2,498人次的警衛隊負責維安工作，同時從國庫撥出10萬大洋作為賀禮（約今日3,000萬元左右）。而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黎元洪與前任總統徐世昌各致贈兩萬大洋、張作霖以及張勳則各致贈了1萬大洋作為賀禮；馮玉祥、吳佩孚也致贈高價的玉如意，象徵吉祥。由此可知，在當時中華民國上下官員，對於這個前清遜帝還是維持著相當的基本尊重，同時整個北京將前清皇帝娶親一事當成國家慶典辦理。該場婚禮各界來賓、外國使節總共1千多人到場，完婚之後在「乾清宮」設宴款待賓客。葡萄牙公使代表使節團致賀詞之後，溥儀以英文致謝詞回應各界，令在場人士刮目相看。



溥儀的皇親家族

溥儀為第二代「醇親王」愛新覺羅・載灃長子，而載灃之二兄愛新覺羅・載湉即為光緒皇帝。1908年，載灃（圖中坐者）擔任「軍機大臣」，同年10月間，因光緒皇帝駕崩且無子嗣，因此以載灃長子溥儀入嗣成為宣統皇帝。同時也因溥儀年僅兩歲，因此授載灃為「監國攝政王」，代理幼帝主持朝政。以當時載灃家勢之顯赫，在大清將亡之際位居要津、權傾一時，若非其主導交出政權，中華民國的成立是否順利或恐多有波折。

愛新覺羅・溥傑（後排右一）為載灃次子，1917年起入宮陪伴溥儀讀書，從此有親生血緣關係的兩人就形影不離，亦帝亦友、感情甚篤。在青少年時代，溥傑與溥儀同樣也受教於陳寶琛、朱益藩以及莊士敦，因此不但英語流利，書法造詣更是傳頌當代。1929年，溥傑與婉容皇后之弟潤麒前往日本受教育，在習得日文之後進入專為日本皇室貴族設置的「學習院」高等科就學。1933年於「學習院」高等科畢業，9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接受大學軍事教育，並於1935年7月畢業後續留該校擔任見習軍官。1924年，溥傑曾在北京結婚，但其後夫妻感情不睦，婚姻關係無疾而終。

圖中其餘人為載灃長女愛新覺羅・韞媖（後排左一，1908～1925，適婉容兄郭布羅・潤良）、次女愛新覺羅・韞龢（二排右一，1911～2001）、三女愛新覺羅・韞穎（前排左二，1913～1992，適婉容弟郭布羅・潤麒）、四女愛新覺羅・韞嫻（前排右一，1914～2003）、五女愛新覺羅・韞馨（前排左一，1917～1998）、四子愛新覺羅・溥任（前排左三，1918～2015）、六女愛新覺羅・韞娛（前排左四，1919～1982）、七女愛新覺羅・韞歡（前排右二，1921～2004）。

溥儀在進宮之後，一直與弟妹隔絕。直到1917年，其弟妹才得以入宮探望兄長。



中華民國早期之混亂政局

自1916年6月6日，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在任內病逝後，各路軍閥頓失龍首、互不相服，因而舉國大亂。從1916年至1927年之間，中華民國元首或政權代表者就更替了15位之多，此種亂象令舉世瞠目結舌！1916年6月7日，因袁世凱逝世，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總統之職。其後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因前述「是否加入協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造成總統與國務院分裂。後因張勳率兵入京發動政變，黎元洪於1917年7月1日出亡日本使館，並於7月14日通電辭職。

1917年7月6日，由時任副總統的「直系軍閥」馮國璋（1859～1919）代理總統職位。1918年9月4日，中華民國國會依據《大總統選舉法》進行第二任大總統選舉，結果曾為「帝師」的徐世昌（1855～1939）由「皖系」控制的國會選舉為總統，並於10月10日正式宣佈就職。1920年7月爆發「直皖戰爭」，段祺瑞的「皖系」雖然戰敗，但徐世昌第二任大總統一職仍得保留。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的「直系」獲勝後掌控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並指控徐世昌的大總統地位為非法，6月2日徐世昌辭職，由「交通系」官僚周自齊（1869～1923）為代理總理的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權。圖中為1918年11月28日，慶祝一戰勝利，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於太和殿舉行閱兵慶典，各國使節與會觀禮，並由時任大總統的徐世昌（中戴禮帽者）發表演說。

1922年6月11日，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獲勝的「直系軍閥」，為彰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合法性與延續性，因此把先前自動辭職的黎元洪再度請回「復任大總統」。在「直系」達到「獲取法統正當性」目的後，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再度辭職，次日，由「直系官僚」高凌霨（1870～1940）為代理總理的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權。黎元洪一生曾擔任一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兩任大總統，雖可視為其個人特殊際遇，但也顯示出中華民國建國後的政權動盪狀況。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其影響

前述的政局混亂情況，其實是由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人種下的遠因。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以來，該黨一直以「驅除韃虜，建立共和」為目標，奈何在「武昌兵變」之後，為避免共和革命功虧一簣，只能屈從袁世凱的勢力之下，以其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是站在孫文等人的立場，共和建國後怎能任由坐收漁翁之利的袁世凱取得政權？於是在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出第一任大總統之前，先行透過暫時的國會「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制定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該約法中明訂，中華民國政體為「責任內閣制」，此舉的根本目的在於讓袁世凱成為「有名無實」的虛位元首。

但美其名仿效法國共和政體的「責任內閣制」，其國務總理並非由民主選舉產生，因此總統與國務總理從中華民國創建以來，即不斷相互鬥爭造成政局混亂。而自袁世凱身故之後，孫文與南方八省軍閥，就不斷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違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由，於1917年發起「護法運動」，造成南北分裂，並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直接與北方對抗，企圖奪取政權。

其實在此分裂期間，孫文並未獲得歐美輿論的支持，國際上依然只承認由在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因為眾所周知，該《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並非正當法統下的產物，只是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1919年2月20日，北京與廣州政府於上海召開「南北議和會議」（如圖），「護法運動」因而暫時中止；最終因為南方實力不濟且自身內部各方勢力、軍閥亂鬥之下紛爭不斷，「護法運動」遂全面失敗。極具諷刺的是，1925年7月，當國民黨還在進行東征陳炯明之際，領導中心改組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由國民黨把持，最高領導人則改稱為「國民政府主席」。從此，對於虛位總統、責任內閣精神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便再也絕口不提。

這段期間溥儀雖深處宮中，但是透過恩師陳寶琛與朱益藩，讓他更加深信中國需要的是一位皇帝，而不是一個用兵權或是妥協換來的大總統。另外透過莊士敦的分析，也讓他清楚瞭解到國際間對中國「共和」的看法，在英美的報章雜誌中他也讀到海外對於孫文的批判。之前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曾讓「保皇派」失望，而張勳的復辟行動在其他軍閥的力阻之下又只是曇花一現；現在中華民國立國十餘年來的混亂政局，豈不是一再證明當初「推翻帝制」的荒謬？成長中的青少年遜帝，雖然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但「復國」的火苗卻是日益旺盛未曾稍減。





「北京政變」的動亂

1923年10月，中華民國舉行第三任大總統選舉。在此之前，由於「直系軍閥」曹錕（左圖，1862～1938）逼迫黎元洪於6月13日下台，引起許多國會議員不滿離開北京，拒絕在軍閥的脅迫之下行使職權。最後由於在北京的國會議員法定選舉人數不足，曹錕派系人馬四處奔走請求各省國會議員回京投票，但9月12日第一回投票還是因為人數不足流產。10月1日起，為促使國會議員參與10月5日的第二回投票，由眾議院發出一人5千元支票（約今日100萬元）作為鼓勵出席投票「車馬費」。結果在出席參、眾議員590人中，曹錕獲得480票當選，並於同年10月10日就職「中華民國第三任大總統」。

曹錕當選之後爭議不斷，特別是只獲得33票支持的「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孫文立刻通電反對並且下令「討伐」，但因當時孫文根本毫無實力可言，上述行動只是淪於「表態」的隔空交火而已；總之中國北方政府的一舉一動，位於南方「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的廣州革命政府必定加以反對。此與今日臺灣政壇狀況極為類似。此外，當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之後，原屬「直系軍閥」的馮玉祥（右圖，1882～1948）因收受「奉系軍閥」張作霖的賄賂，於戰中陣前倒戈，並以「曹錕賄選」之名率兵發動「北京政變」，意在一舉打倒「直系軍閥」曹錕與最具實力的吳佩孚。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部隊進入北京城，包圍總統府。為表示脫離「北洋軍閥」之列，馮玉祥改稱自己部隊為「國民軍」，並邀請孫文北上首都共商國是。在結合奉軍力量大敗吳佩孚部隊之後，馮玉祥於11月2日迫使曹錕辭去大總統一職，由文人官僚黃郛（1880～1936）為國務院總理並攝行大總統職務，直到11月24日為止。

馮玉祥的好景只維持了一個月的時間，在「皖系」、「奉系」的聯手之下，馮玉祥遭到排擠離開權力中心。1924年11月24日，由段祺瑞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同日，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之職。但是，就在這一個月的時間當中，爆發了影響溥儀一生的大事，也直接促成未來滿洲國的成立。



池魚之殃的《修正清室優待條件》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率兵回師北京，倒戈發動「北京政變」（或稱「首都革命」），包圍總統府、車站、電報局以及各政府機構，囚禁大總統曹錕，組建「國民軍」，企圖奪取中華民國政權。就在馮玉祥掌權的一個月中，大清皇室成為他的俎上肉。

越是不具正當性的，往往會使用激躁的手段來「立威」。低階行伍出身的馮玉祥，為了表現出前人所不敢的「氣魄」，以及北京由他「當家作主」的姿態，前清遜帝、皇族、遺老成為他「推翻舊世代」的象徵物。11月4日，馮玉祥要求攝行大總統職務的黃郛召開內閣會議，修改《清室優待條件》，決定在次日將溥儀及其所有周邊人等一律逐出紫禁城，並廢除帝號，不再待之以「外國君主之禮」。

自1912年溥儀遜位以來，中華民國政府即在紫禁城駐紮有「內城守衛隊」，隸屬於「步軍統領衙門」（至1924年10月5日方裁撤），用以維護前清皇室的安全以及監視動靜。1924年11月4日，馮玉祥的手下大將鹿鍾麟（1884～1966）率領「國民軍」將「內城守衛隊」1,200人繳械；次日上午9時開始，又將駐守在「神武門」的警察480人繳械，同時對以溥儀為首的皇室發出「即刻搬離紫禁城」的命令。當時皇宮中的「總管內務府大臣」馬佳・紹英（1861～1925），立刻傳令各大臣召開緊急御前會議商討對策。與此同時，馮玉祥的「國民軍」在離紫禁城不到500公尺的景山之上部署重砲，對準皇宮用以威脅溥儀等人必須在一小時之內限時離宮！

在馮玉祥主導下的《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中，溥儀、皇后、嬪妃、宮中各大臣都降為「一般國民」，同時對皇室的補助降為原先的1/4。中華民國政情紛亂如此，誰知道明日又將會有何巨變？紹英原本打算「以不變應萬變」，於是與鹿鍾麟展開談判。但談判一開始，鹿鍾麟即拿出兩顆手榴彈放在桌上，至此紹英深知「大局已定」，已經不是講道理的時候多說無益。但是任誰都知道，一小時內請溥儀出宮只是一個恐嚇手段，因此最終決定三小時內溥儀等人必須離開紫禁城。

當日下午兩點，無奈的溥儀在《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上簽字，帶領著入宮之後就未曾再出宮過的皇后婉容（中）、淑妃文繡（左），以及弟媳唐石霞（右）、紹英等人，乘坐中華民國政府事前備好的車子，由「京畿警衛司令」鹿鍾麟、「京師警察總監」張璧前導開路，一行人車隊駛出「神武門」永別紫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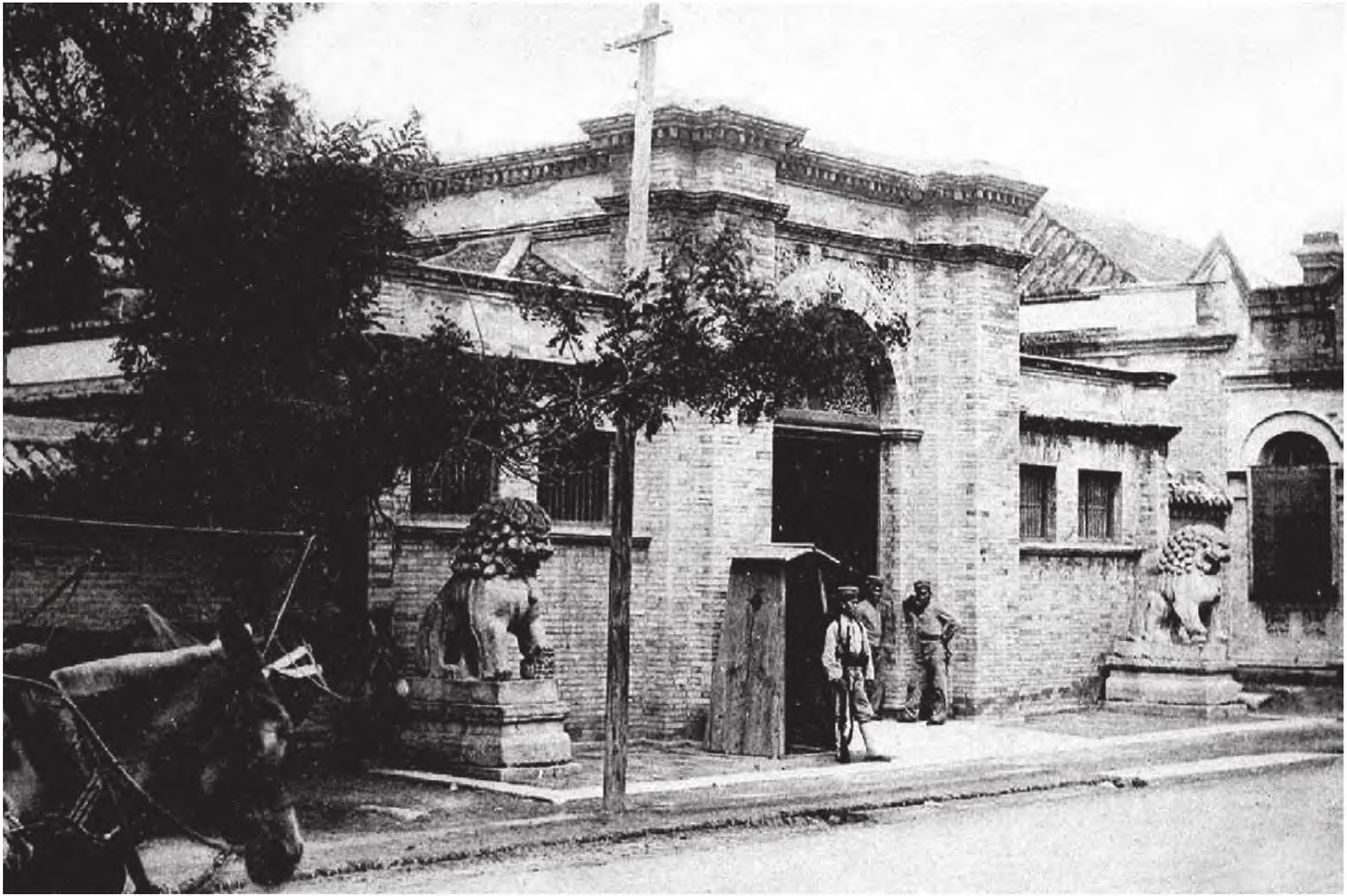
受奇辱溥儀黯然別紫禁

政變後馮玉祥雖然佔據北京城，但他沒能完全控制局面，遂在權謀下邀請孫文北上共商國是，並與「奉系軍閥」協議由段祺瑞入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儘管如此，馮玉祥在佔據北京期間，為彰顯其「至高無上的權力」超越之前歷任大總統，以前清皇室來「祭旗」，一時之間的確震懾全中國。孫文為此還特地致電馮玉祥，表示讚賞之意。一生倒戈近十次的「倒戈將軍」馮玉祥，之所以提出《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只是為了要突顯他的權力超越前人，但對於宮中含溥儀以下所有人員的安置卻完全缺乏配套措施。於是，相安無事13年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前清皇室之間，就此徹底決裂。

當被驅離的溥儀車隊離開紫禁城時，一行人甚至連目的地都不甚明瞭，往昔種種瞬間一一浮現在溥儀眼前，此生此世如同浮光掠影，居住了16年的棲身之所頓時化為海市蜃樓。依照馮玉祥修正過的條件，溥儀與其家人成為一介平民，歲入也從400萬元降為50萬元，而宮中的臣民更是生活無著。這十幾年來，溥儀在陳寶琛與朱益藩等帝師的苦心培育下，習得了滿洲祖先的文化並打下深厚的漢學基礎；而在莊士敦的影響下溥儀開拓了國際觀，也深入瞭解到現代君主的權利與義務。但是就在這一刻，一切都成為枉然。

在溥儀思緒紛亂之際，車隊在醇親王府前停住，溥儀被「刻意要求」自己打開車門，帶著女眷們下車。醇親王府外站滿了戒備森嚴的「國民軍」士兵，鹿鍾麟自前導車下來趨前與溥儀握手致意，同時意有所指問道：「溥儀先生，你今後還打算做皇帝呢？還是要當個中華民國的公民？」溥儀在一陣錯愕之餘，不愧諸位帝師們的長期教誨，冷靜而優雅的回答：「我既然接受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也廢除了帝號，當然從今天起就是一個公民。」

此時張璧也過來對溥儀說：「既然是公民，依照憲法你就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說不定，將來你還會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面對這個帶有諷刺性的窘境，當了16年皇帝的溥儀只是面帶笑容而不答。然而，此刻溥儀內心的衝擊狂潮無以復加，對「中華民國」的厭惡、「大總統」一詞的鄙夷排山倒海而來，這兩個名詞從此成為他一生中最嫌惡的字眼。但是作為大清帝國最後的血脈、帝王之尊，他不想逞口舌之快，懷著羞辱默默的帶著家眷、近臣走入生父載灃的醇親王府。而如影像中左起溥儀、貝子溥倫之女鐵哥、潤麒、韞穎、婉容、韞龢、韞媖等人在宮中御花園欽安殿前的留影，也從此成為絕響。



命懸一線的溥儀

雖然溥儀一行人住進醇親王府，但是任誰都知道此處絕非可以久留之地。民國之後整個中國忙於相互鬥爭，大總統、大元帥、執政、總司令等等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頭銜名稱，不過都是為了要「掌權」，民國成立12年來機無寧日。特別是為了要樹立自己的威信、刻意撕毀《清室優待條件》的馮玉祥還控制著京城，不按牌理出牌的他隨時有可能加害溥儀及其家人，又有誰知道名義上駐守於醇親王府「保護」的「國民軍」何時會衝進來殺害皇室成員？

溥儀住在醇親王府的時間並不長，因為前朝遺老，甚至連莊士敦都擔心馮玉祥會改變心意，如同蘇聯共產革命後，對俄國沙皇家人的趕盡殺絕。因此，從1924年11月5日開始，眾人不斷透過自己既有的關係，積極聯絡民國高官或各國政府駐外單位尋求生機。溥儀生父醇親王載灃與陳寶琛等人則主張皇室應該留在親王府內，靜觀情勢演變等待馮玉祥離京後，或許有機會恢復《清室優待條件》，返回紫禁城。然而，這種想法在今日看來的確過於一廂情願，既然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已成事實，怎麼還有主政者會將其請回宮中？

最終，溥儀在時任「總管內務府大臣」鄭孝胥與恩師莊士敦的建議下，決定擇機潛逃出醇親王府，尋求外國政府的政治庇護。在當時的世界局勢變化與列強權力鬥爭下，莊士敦等人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困境。莊士敦首先聯絡的自然是大英帝國，但是當時大英在亞洲的利益集中於東南亞，而在中國的利益則分佈於華南與長江流域，不需為區區溥儀得罪中華民國。而蘇聯方面，由於始於1917年的蘇維埃革命所造成的俄國內戰剛結束不久，再加上共產主義對於「皇室」的敵視心態，自然不可能接納溥儀。另外，美利堅合眾國雖然高唱民主主義，但在亞洲的利益集中於菲律賓，對中國政策是「各國利益均享」，溥儀對其毫無價值可言。至於法蘭西共和國，當時統有越南作為殖民地，在中國勢力範圍是廣東一帶，但接納溥儀不符該國利益。而德意志帝國一戰戰敗後，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全遭剝奪，戰後國內民生凋敝，自顧尚且不暇。於是影像中的「大日本帝國駐北京公使館」，便成為溥儀等人最後的一線希望。





鄭孝胥與芳澤謙吉

1924年11月29日，溥儀對外聲稱身體不適，由鄭孝胥與莊士敦陪同前往租界區內的德國醫院就診。到了醫院之後，莊士敦緊急聯絡大英帝國公使館，他認為以其長期擔任大英帝國駐外外交官的資歷，可以順利讓溥儀進入公使館避難，但是卻遭到婉拒。

鄭孝胥在陳寶琛引薦進入紫禁城之前，曾經擔任大清帝國駐日本大阪總領事。因此在四處遭拒之下，緊急聯絡當時的大日本帝國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芳澤謙吉1923年起出任駐中華民國公使，與溥儀有過一面之雅，在接獲鄭孝胥的請求之後，擔心溥儀會遭「國民軍」強行帶走，於是立刻派出外交車輛將溥儀等人接回日本公使館。從此鄭孝胥與芳澤謙吉成為影響溥儀命運的關鍵人物。

鄭孝胥（左圖左，1860～1938），福建人。在大清帝國時期，先後擔任過駐日外交官、廣西邊防大臣、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同時也是清末「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參與者之一，在當時屬於改革派人士。大清覆亡之後，鄭孝胥與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相同，以前朝遺老自居，後經同為福州同鄉的陳寶琛舉薦進入溥儀的小朝廷任職。1924年，鄭孝胥擔任「總管內務府大臣」，不久就面臨溥儀遭貶為公民的空前危機，幸而日本公使館願意及時出手解圍。但即使溥儀遭遇如此不堪，鄭孝胥忠誠依舊，繼續為復興大清奔走，甚至提出在滿洲復國的構想。1932年3月9日，滿洲國建國後鄭孝胥出任首任「國務院總理」，並兼任「文教部總長」。1934年3月1日，滿洲國更改國號為「大滿洲帝國」，鄭孝胥出任「國務總理大臣」兼「文教部大臣」。1935年由於與日本「關東軍」意見相左，鄭孝胥憤而離職，晚年極為鬱悶失意，1938年逝於「新京」長春。鄭孝胥漢學根基深厚，能詩能文，其書法造詣被譽為「北于南鄭」（北為陝西籍的于右任，南為福建籍的鄭孝胥）。

芳澤謙吉（左圖右，1874～1965），大日本帝國外交官、政治家。1923年5月31日派任北京特命全權公使，次年即面臨溥儀出逃救援的驚險行動。1925年芳澤謙吉代表大日本帝國與蘇聯簽訂《日蘇基本條約》，兩國正式建交。1929年芳澤卸任駐北京公使，次年調任駐法蘭西特命全權大使，隨後於1932年成為日本外務大臣。戰後的1952年8月25日，芳澤被派往臺北出任日本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芳澤謙吉的岳父是日本政治巨頭犬養 毅，曾任第29任內閣總理大臣，因為反對日本軍人干政於1932年遭到暗殺身亡。犬養 毅與中國素有淵源，曾任「神戶中華同文學校」、「橫濱山手中華學校」名譽校長。從1907年起數度援助流亡海外的孫文，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還特地遠渡中國提供必要支援。1927年蔣介石因國民黨「寧漢分裂」亡命日本時，犬養 毅也曾給予其庇護。



芳澤公使與溥儀

溥儀與莊士敦、鄭孝胥進入大日本帝國北京公使館時，芳澤謙吉公使在門口親自迎接。不僅如此，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出身的芳澤謙吉，使用英語與溥儀交談時言必稱「陛下」，以對待外國君主之禮行事，恭敬有禮程度出乎溥儀意料之外。在公使館中，芳澤謙吉開放會客廳讓溥儀專門使用，一時之間前清各重臣聞訊紛紛進入公使館面聖問安。芳澤謙吉對溥儀的禮遇極為周全，從溥儀進入公使館後，他立刻主動與「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展開交涉，要求接回還身困醇親王府的婉容皇后與文繡淑妃前來公使館團聚。當兩位后妃安然進入公使館後，芳澤謙吉騰出一整棟樓，供溥儀家族成員居住。

近代中國史學家在描述芳澤公使這段事蹟時，都認為其「別有用心」，刻意討好溥儀以便成立滿洲國，但這等同是對專業外交官的莫大污衊。其實，外交官出身的芳澤是基於國際政治庇護慣例，誠心以對待外國君主禮儀對待溥儀。況且，當時「滿洲國建國」議題尚未成型，甚至在多年之後日本討論「滿洲國建國」時，芳澤也曾大力加以反對，認為這個想法不切實際難以獲得國際認同。

1925年1月24日，農曆正月初一，芳澤謙吉將使館大宴會廳佈置妥當，讓溥儀坐在高位上，接受前清遺臣們的朝覲之禮；2月5日，溥儀壽誕，芳澤公使開放大宴會廳、鋪上紅地毯，讓溥儀接受眾遺臣、滿蒙王公與各國公使代表團祝賀，貴賓雲集幾近600人。三個月前被逐出紫禁城，因而心灰意冷的溥儀與鄭孝胥以及眾遺臣再度重燃信心，深覺復興大清只是時間問題。也因此，前清遺老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後續交涉態度變得強硬，並且拒絕參與清點紫禁城公私財物的「清室善後委員會」。與大清皇室素有淵源的蒙古王公們甚至公開質問段祺瑞，為何中華民國片面廢除《清室優待條件》。

在日本公使館借住中的溥儀，曾經在夜色掩護下，騎著自行車回到故宮「神武門」前，對著代表先祖光榮歷史的城門暗自於心中發誓：「朕必定重回此地。」影像中為1924年12月初，溥儀與日本公使館守備隊司令官竹本多吉大佐（右三）、夫人（左二）合影於北京東交民巷大日本帝國駐北京公使館，左一為溥儀恩師陳寶琛，右一為陳寶琛外甥劉驤業，左三為溥儀二妹韞龢、右二為三妹韞穎。



大日本帝國的禮遇與天津「張園」

多年來，人們總是對日本政府當時的禮遇抱持懷疑態度。甚至倒果為因說此舉是「意圖建立滿洲國的陰謀佈局」。

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芮氏規模7.9級的「關東大地震」，造成105,000人死亡、190萬人無家可歸。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傳出後，當時身在紫禁城內的溥儀以大清帝國宣統皇帝名義，緊急捐出賑災款以及宮中寶物一批給日本政府，同時諭知時任日本駐北京公使的芳澤謙吉，「可將寶物變賣為現款，作為賑災之用」。但是日本皇室不忍出售這批寶物，最終由日本皇室提撥等同寶物價值的現款，以大清宣統皇帝之名捐贈作為賑災之用，並將寶物留在宮內省珍藏。大日本帝國與芳澤謙吉對溥儀的義舉一直心存感激並俟機圖報，沒想到隔年溥儀就蒙受驅逐之辱，對日本政府而言這是回報的最好時機。當時的日本大正天皇甚至直接指示外務省，務必妥善從優照顧溥儀家人，這正是所謂「德不孤必有鄰」的最佳寫照。如同臺灣在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後，臺灣各界對日捐款超過200億日圓道理一般，日本政府與民間至今仍心存感念，進而於2021年6月4日對臺灣義贈124萬劑「武漢肺炎」疫苗作為回報道理一樣。

1925年2月，北京《京報》刊登數篇文章，以小人之心評述日本公使館收留前清遜帝溥儀動機不單純，讓溥儀與芳澤謙吉都深感困擾。原本溥儀有遠赴日本久居之意，但是陳寶琛與鄭孝胥等人都極力反對，因為如此一來豈不是離復國之日更形遙遠。同時，時任大日本帝國駐天津總領事的吉田 茂（1878～1967，戰後數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也深覺不妥而加以勸阻，吉田 茂認為溥儀倘若離開中國赴日，將更加坐實中國對於「溥儀遭日本綁架」的無稽指控。但是溥儀等人也不可能長期借住在公使館裡。因此，1925年2月23日夜晚，溥儀在日本公使館人員、日警與隨侍一行人護衛下全部喬裝成商人，趁著夜色來到北京車站，搭乘火車前往天津日本租界區。抵達天津車站時受到如影像中效忠前朝民眾的熱烈歡迎，而其中身著軍服者即為張勳著名的「辮子軍」，堅持維持前朝裝束。在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的安排下，溥儀入住位於「宮島街」之前大清「新軍第八鎮」統制張彪的故宅「張園」。

溥儀離開北京一事，大日本帝國北京公使館於1925年2月24日正式知會「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段祺瑞政府對此不以為意，但是當時報紙輿論立即展開「此事有極大黑幕」的污衊論點。但是在溥儀抵達天津、入住「張園」之後，這樣的負面評論日漸消失。溥儀住在「張園」這段時間，張彪非但無償提供園邸給溥儀使用，而且依舊對溥儀行君臣之禮，溥儀在此生活到1929年才搬離。由於溥儀的皇室背景與得體的舉止，加上能夠使用流利的英語與他人溝通，一時之間成為天津外國社交圈炙手可熱的人物，連英國皇室喬治王子（Prince George, Duke of Kent，1902～1942）也曾登門拜訪。但是溥儀接觸對象最為頻繁的，還是日本外交官、政治家以及高階將領。原因不外乎，日本政府是溥儀在危難之際，唯一願意伸出援手的國家。



中華民國政府對清室的重大羞辱

對當時20歲之齡在天津過著現代時尚生活的溥儀而言，非但自由自在甚至經常自己開車，帶著皇后與弟妹上球場打高爾夫球或網球。雖然他也曾思考過遠離紛紛擾擾的政治圈，但是其後發生的一件大事，讓溥儀深惡痛絕，從此視中華民國為仇敵，決心復辟建國恢復大清。

1928年6月，「奉系軍閥」孫殿英（1889～1947）向「北伐戰爭」勝利者蔣介石投降，之後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12軍」軍長，駐紮在河北省遵化縣「東陵」附近。原本孫殿英的部隊就是一個流氓之旅，所到之處對百姓無不燒殺擄掠。蔣介石為了擴充勢力，在「北伐」期間對投降部隊，不論風評、軍紀一律照單全收，同時給予確保原部隊編制、各主官加官進爵以及賄賂豐厚財物作為「投誠」交換條件。

1928年7月，孫殿英的流氓部隊就地利之便開始在「東陵」盜墓，對象是乾隆皇帝與慈禧太后的陵寢。孫殿英驅趕原先中華民國政府派任的守墓人員，其後用炸藥炸開陵墓入口，最後盡情劫奪如入無人之境。最令大清子孫痛心欲絕的是，孫殿英為取出慈禧口中「夜明珠」，竟毀其遺骸；最後還將慈禧裹屍之綾羅綢緞全數褪去劫走，面部朝下棄置於泥水當中！8月13日，此事經《中央日報》披露後，舉國譁然，然而「東陵大盜」孫殿英，最終竟為蔣介石縱容不加追究而逍遙法外！無怪乎事後，「孫殿英將『夜明珠』獻給宋美齡以求脫罪」之說，不脛而走。

對於在天津過著與世無爭生活的溥儀而言，這不啻一記當頭棒喝。他深刻想起陳寶琛與鄭孝胥等遺老，不斷告誡他「民國者，敵是也」的忠言，復仇的烈火在青年皇帝的心中再度熊熊燃起。溥儀在「張園」中設置起靈堂，每日率眾遺老上香祭拜三回，直到陵寢修復之日為止。同時，溥儀與遺老們共同上書蔣介石與「京津衛戍總司令」閻錫山，期盼能嚴懲盜匪孫殿英。然而，最終盜墓之事還是不了了之，無人遭到定罪受罰，而溥儀眾人只能自行募款重修祖陵。影像中即為修復過後的「東陵」，歷代列祖已重新入殮。對滿洲人而言，固然歷代皇帝后妃陵墓遭匪人盜掘時有所聞，但是中華民國政府的軍隊公然盜墓，實為天下奇聞。溥儀與滿人至此對中華民國與新任統治者蔣介石也徹底失望，同時讓逐漸淡出政治圈的溥儀態度一轉。

之後，溥儀除了不斷積極與歐美領事、達官政要保持聯繫之外，還數度派遣鄭孝胥前往日本，對日本多任內閣總理大臣、皇族、文武高官等進行遊說，希望能獲得日本支持。1928年11月10日，大日本帝國裕仁天皇登基大典時，溥儀主動以大清帝國宣統皇帝名義致電祝賀，以延續大正天皇以來的雙方友好關係。1929年3月，溥儀甚至派遣皇弟溥傑與皇后婉容之弟潤麒前往日本軍校學習，以為復辟之準備。「九一八事變」之後，鄭孝胥特地建議溥儀撰寫親筆信函給當時的日本陸軍大臣南 次郎，盼其能全力襄助清室恢復帝制並共同防堵蘇聯南下赤化。



滿洲國建國主義的濫觴

1929年溥儀與家眷、近臣遷入前清「資政院」議員陸宗輿（1876～1941）的宅邸「乾園」，並將其改稱為「靜園」。在這段期間，溥儀更加積極與外國政府保持關係，期待獲得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其復國計畫。溥儀等人深知，如欲恢復大清帝制，以當時情勢非得到外國援助支持不可，而其中勢力日益強大的大日本帝國更是經營重點。同時溥儀仍然持續履行著作為一個皇帝的職責，當世襲制度的蒙古、滿洲王公過世後，繼承爵位者仍需呈遞奏摺，經溥儀同意蓋上玉璽才算正式承襲爵位。

然而這段時期中國與國際局勢都有著極大變化。從列強各國看來，中華民國成立後一方面宣稱繼承大清帝國法統並要求列強加以承認政權地位，但另一方面卻又不願承認前朝與各國之前所簽訂各項條約的存續性；亦即既要求繼承前人資產，但卻又不願承擔負債的作為，讓列強極為不解。這種不守信用、出爾反爾的情況，不僅反映在對內與溥儀之間的《清室優待條件》上，對外的國際條約也是採取拖延、片面廢棄的方式，這種特殊的民族性持續到今日依然不斷發生。

1915年，日本向中華民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最終兩國簽訂《中日民四條約》，等於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益不變。1919年，中國藉由「五四運動」開始全面性的反日行動。1921年，無法再獲得日本金援的孫文「軍政府」，轉而投向蘇聯懷抱爭取支持，並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1883～1942）三次會談後，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中國國民黨。而蘇聯當時正值內戰結束站穩腳跟，於是大力向世界各國推行共產主義，一時間共產主義成為「顯學」，在中國也成立共產支部。1924年，從爆發「武昌兵變」開始就不承認中華民國治權的蒙古，在蘇聯的保護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雖然形式上抗議，但是歷任領導人都選擇默認該國從中國獨立而出的事實避免得罪蘇聯。

今日大多數人都認為「滿洲建國」是由大日本「關東軍」所提出的構想，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從1925年起，鄭孝胥就不斷對溥儀諫言：「藉由日本在滿洲的勢力先行建立政權，其後經由列強共管，讓建立國家成為既成事實。」由於有上述由蘇聯扶植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例；同時在日本國內對於混亂的中國局勢感到不耐、深恐蘇聯輸出共產赤化中國的學者，如大川周明（1886～1957）等人提出「亞細亞主義」，並強調滿洲獨立的必要性作為相互呼應。至此，歷史的演變，讓一切成為「必然」，溥儀與滿洲的命運將進行到下一階段。影像中為1921年「蒙古革命軍」攻入庫倫（今烏蘭巴托）一景，1924年11月26日對外宣佈「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東北王」張作霖皇姑屯爆炸事件

人稱「東北王」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一向採取親日的立場，因為日本投入巨大資本建設南滿鐵路沿線，被帶動的整體滿洲繁榮正好成為其養兵的資本。其實，從中華民國建立以來，實際行政、立法、執法權並未及於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而馬賊出身、進而成為自衛性質「鄉土保衛隊」首領、日漸擁有龐大軍權成為軍閥的張作霖，讓滿洲地區長期處於實際獨立狀態。

袁世凱過世後，中華民國內部軍閥各據一方混戰，而背後有日本「關東軍」作為後盾的張作霖，並不滿足於留在區區滿洲，從1920年起其勢力開始進入關內，最終在1926年大敗馮玉祥之後全面控制中華民國北京政府，並於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治權範圍抵達長江北岸。

1928年，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行動即將抵達北京，張作霖擔心蔣介石一旦統一成功會失去自己在華北地區原有利益下，竟然轉向歐美尋求各國勢力的援助。儘管如此，張作霖依然敗北在蔣介石手中，6月3日，張作霖在日本的勸說下，搭乘火車準備由北京撤回奉天（瀋陽），次日清晨張作霖座車在皇姑屯遭到炸彈攻擊（如圖），受重傷的張作霖被送回奉天之後不治身亡。盛怒之下的張作霖長子張學良（1901～2001）在事隔半年之後的12月29日下令「東北易幟」，廢「五色旗」改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接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節制，形式上滿洲從此不再獨立於中國中央政府之外。

「皇姑屯爆炸事件」雖然近世亦有「蘇聯特務」陰謀說，一般還是認為應該是由「關東軍」所策劃，但是其中存在不少矛盾。立場一向親日、由「南滿鐵」獲得經濟利益、從「關東軍」獲得軍備的張作霖，對大日本帝國而言不僅是相安無事的近鄰、更是安定滿洲不可或缺的伙伴；而且，即使暗殺張作霖成功，「奉軍」在滿洲11萬精銳、10萬附屬部隊的統領權只會由其子張學良繼承，既不會瓦解也不可能轉而聽命於「關東軍」。此事件源自關東軍少壯派軍人「斷定張作霖背棄日本」轉投向歐美懷抱，同時張作霖打算自行建造與「南滿鐵」平行的鐵道與日本爭奪利益有關；因此「關東軍」在未經過日本政府同意之下造成這場「大爆走」，事後又想隱蔽事件對外使用「滿洲某重大事件」稱呼。「關東軍」此舉對自身利益百害無一利令人不解，而日本軍人干涉政治的粗暴由此揭開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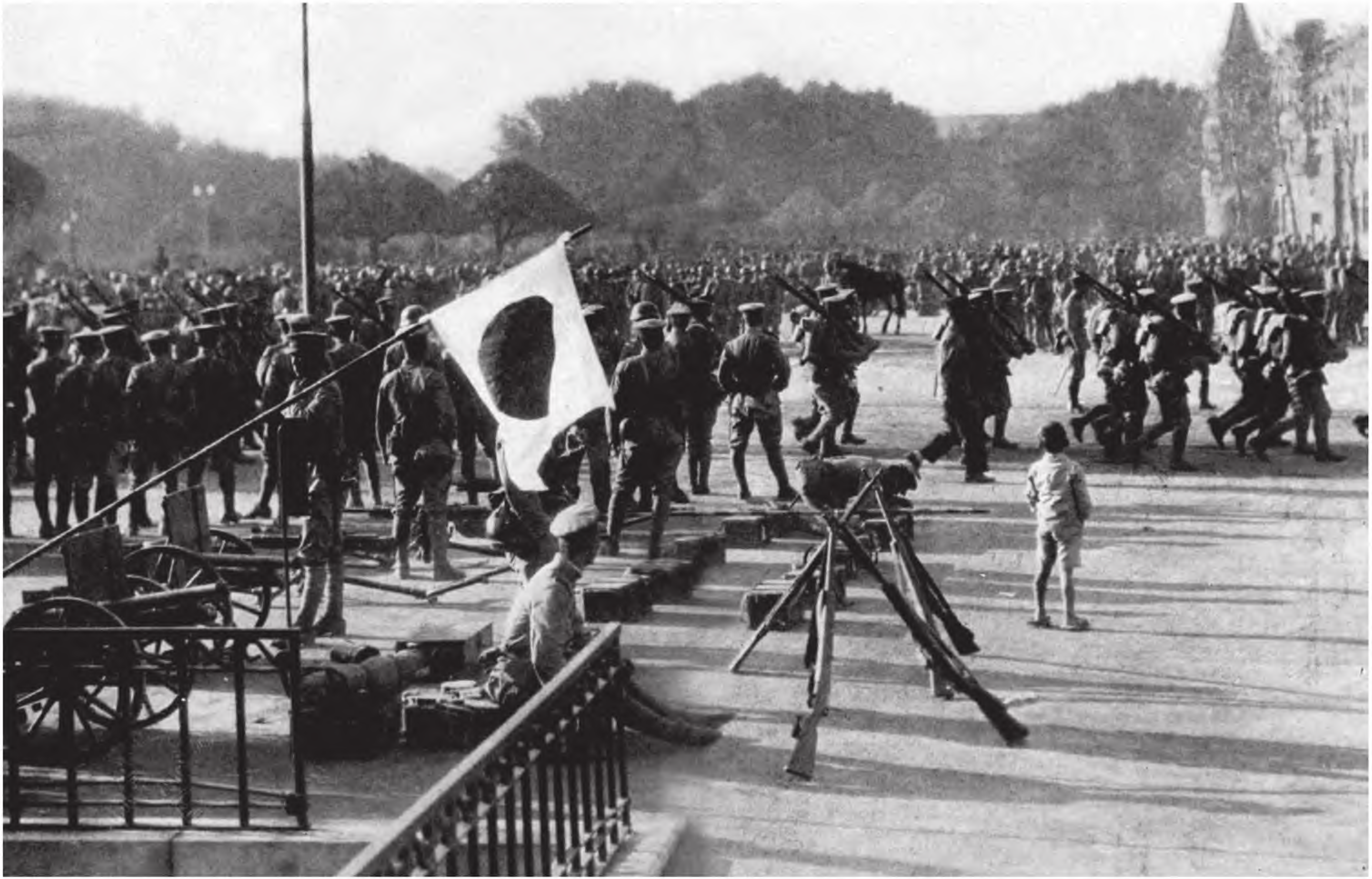
張學良的反蘇、反日計畫

1928年以「東北易幟」換取蔣介石國民政府「對滿洲事務不加干涉」、「形式統一、實質獨立」的張學良，開始空前大規模建設蘇聯「東清鐵路及其附屬地」、日本「南滿鐵路及其附屬地」以外的滿洲地區，以期能自給自足並且鞏固勢力基礎。1929年，28歲年輕氣盛的張學良「東北軍」為了要收回長春以北「東清鐵路」的權利，與蘇聯爆發「中東路事件」戰爭，結果10萬正規「東北軍」以陣亡3,500人、被俘超過18,000人慘敗告終，而蘇聯的利益絲毫未變回到原點。但是對全中國而言，他敢挑戰外國勢力展現了「膽識」而獲得聲望，儼然成為蔣介石以下的中國第二號人物。

雖然張學良表面上平安無事繼續與「關東軍」維持關係，但是從1929年開始就利用「反日運動」逐漸對日本施壓，希望能讓日本退出滿洲。但就日本的立場而言，在國際法上大日本帝國擁有「南滿鐵路及其附屬地」的絕對權利，大清滅亡之後日本也與繼承政權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中日民四條約》，再度確認了日本在南滿洲的權利。更何況，如本書第二章所述，從1905年開始日本將「南滿鐵」當成一家控股公司，全面在南滿洲地區投資建設各項事業，並且已經投入上百億資金，怎可能將南滿洲拱手相讓？

張學良除了在滿洲大力推動反日運動外，更直接出動警察攻擊與封鎖日本人經營的工廠、在南滿鐵路日本「附屬地」設置柵欄與關哨、禁止本地人出租或出售土地給日本人、破壞採礦設備與坑道。日本對這些狀況起初抱持「息事寧人」的態度，除了口頭對張學良抗議外，負責保護南滿鐵路的「關東軍」並未有積極的軍事反擊。最後，張學良準備執行其父的計畫在南滿鐵路路線旁，另外修築一條與其平行的鐵路，打算以更便宜的運費直接與「南滿鐵」競爭。

此舉，已經徹底踩踏「南滿鐵」的底線，「關東軍」也確定與張學良無法避免一戰，於是積極部署、調度部隊，戰事一觸即發。影像中為，攝於北京順成王府的直系、奉系軍閥合影，左五起：張作霖、張宗昌、吳佩孚、張學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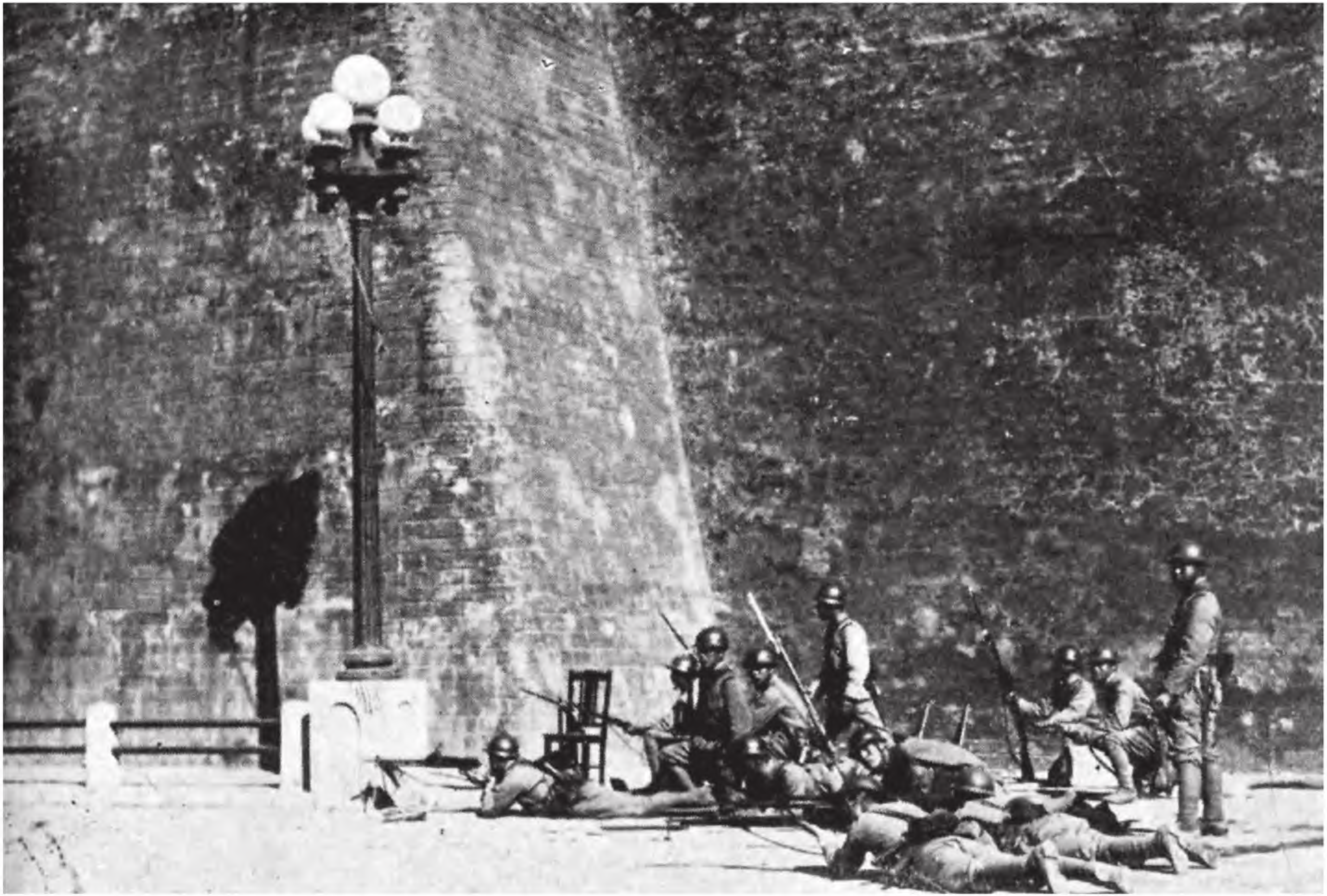
事變前的滿洲情勢

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為對國民有所交代，極力逐步對外廢除前清所留下來的不平等條約。這也是當時中華民國於1917年派出14萬苦力百姓，「以工代兵」遠赴歐洲參加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陣營的原因。在1918年，中華民國成為一戰戰勝國，而屬於戰敗國的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之前在中國擁有的利益，也因此全部被取消。

1922年，蘇聯成立後，積極在中國成立共產國際支部，為了要順利推銷共產主義，針對具有「指標性」的「東清鐵路」北段所有權，有了重大變化。1924年，蘇聯與「奉系軍閥」張作霖簽訂合約，放棄「東清鐵路」北段及其附屬地的宗主權，改由雙方共同出資的純商業型態。藉此，「東清鐵路」長春以北的主權大致回歸到「奉系」手中。也因此，1929年張學良與蘇聯「中東路事件」開戰，欲奪取共同經營的「東清鐵路」北段、清除蘇聯剩餘利益，實為違反先前合約協議之舉。

在1928年12月，「奉系」張學良加入中華民國陣營之後，蔣介石的「北伐」名義上完成，全中國歸於「統一」。但是，在「北伐」過程中，蔣介石讓願意歸順國民黨的軍閥，保留其部隊與原駐地加入國民黨，其結果造成國民政府連稅收都無法徵收，整個中國連同南方各省反而陷入「名義統一，實則獨立」的荒謬狀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只剩下與國際締約、交涉的功能，「北伐完成」完全只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1930年5月，全中國再次陷入如民國初年的分裂狀態，形成國民政府軍與各省軍閥混戰的「中原大戰」。此時張學良選擇加入蔣介石陣營，將「東北軍」精銳部隊11萬調入關內，協助國民政府作戰。

在滿洲的大日本帝國「關東軍」於1928年就開始縝密計畫，準備將與之不睦的張學良「東北軍」逐出滿洲。1931年，「關東軍」與「東北軍」留守部隊在滿洲小型衝突不斷，但身在北京的張學良奉蔣介石之命「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放棄抵抗以求息事寧人。「關東軍」深知佔領全滿洲只是時間問題，於是以「東北軍」炸毀奉天附近南滿鐵道事件為理由，開始進行全面性的戰爭。日本「關東軍」或許在軍事上擁有強大的力量，但是對於國際政治與國際現實委實無知，又不肯委由國內專業外交官員妥善處理。依國際法與在南滿的長期投資事實，日本未必理虧應可確保本國利益，但貿然出兵的結果為未來的「國際聯盟」仲裁不利種下惡因。影像中為1931年在長春車站前集結，準備調往吉林的「關東軍」地面部隊。



九一八「滿洲事變」

1931年9月18日，大日本帝國「關東軍」以初期1萬兵力，對10餘萬張學良留守在滿洲的「東北軍」展開閃電作戰。當時張學良率領11萬「東北軍」主力在關內，同時一再發出命令給滿洲「東北軍」留守部隊無須積極抵抗，自身也「順從」蔣介石指示未曾回師滿洲，此舉令「關東軍」深感意外。深究其原因乃在於，此時剿共戰爭方殷，蔣介石不願在此時與日本開戰，避免腹背受敵的自私想法。而張學良深知「關東軍」的強大實力，若是執意率部回防滿洲，其結果將等於以卵擊石全軍覆沒，這在兩年前「中東路事件」的慘敗經驗中已經獲得教訓，因此還不如繼續保持部隊實力在中華民國各軍閥間稱雄為上。這種「保存兵力，坐領軍餉」的軍閥基本想法有如「幫派」一般，直到中日戰爭、國共內戰期間依然存在，無怪乎中華民國軍隊作戰時經常無法堅持而潰敗。

「關東軍」於9月18日夜晚率先進攻「東北軍」駐紮兵營「北大營」與奉天舊城內，同時也開始砲擊「北大營」與奉天機場。整個奉天地區在19日清晨6點即全數遭日軍攻佔完畢（如左圖）。同日，營口、安東亦被「關東軍」攻佔，並開始進攻長春。此時，南滿鐵路開始發揮它「養兵千日」的作用，大批部隊經由鐵路運輸源源不絕直達目的地。20日，「關東軍」完全佔領長春；21日，吉林省城遭到攻佔；同日，吉林省代理主席愛新覺羅．熙洽（1884～1950）率部隊投降並協助「關東軍」進擊殘餘「東北軍」，不久吉林全省宣告陷落。

在21日當天，回到南京的蔣介石，對「關東軍」開戰一事，僅做出以下三點「基本外交原則」聲明：

1、堅決抱定保護我國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

2、維持東方平和而達到維持世界的和平。

3、尊重一切國際公約，尤注重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

由以上聲明，特別是第二點，不難看出蔣介石對於東北無關緊要的態度。而第三點聲明，則是刻意針對美國向來主張所做的附和，希望能藉此繼續得到美國的支持，以打倒國內各「反蔣」勢力並阻止共產主義的蔓延。美國的「門戶開放」聞之似乎講求自由、公平，但是背後則是滿洲經濟利益的瓜分本質，因此蔣介石的「聲明」就某個角度而言還是置滿洲人民、主權於不顧。

而「滿洲事變」主角之一的「關東軍」，在1905年時不過只是後藤新平設計作為「南滿鐵」維護鐵道沿線安全的「守備隊」；1919年昇格為「關東軍」以防禦俄國共產主義的威脅，但是仍需要接受「關東都督府」管轄。然而「關東軍」一路擴張如同脫韁野馬，不僅在1928年蒙蔽天皇聖意暗殺張作霖，進而在「滿洲事變」期間不顧內閣的反對先行發動戰爭，甚至直接造成反對「滿洲事變」擴大的若槻禮次郎（1866～1949）內閣瓦解倒台。從此之後，鐵道看守部隊出身的「關東軍」勢力已經凌駕「關東都督府」甚至內閣，所有的軍事、政治行動與決定只是一味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追認」而已。



「關東軍」攻陷滿洲全境

九一八「滿洲事變」是「關東軍」繼暗殺張作霖之後的第二次大爆走，以自導自演的「柳條溝事件」為藉口，對南滿地區展開攻擊，而這個作戰計畫居然只出自於板垣征四郎大佐（最終為大將，1885～1948）與石原莞爾陸軍中佐（最終為中將，1889～1949）兩名高級參謀的密謀。事先完全沒有經過日本內閣同意的肆意作為，讓「關東軍」無異於當時中國的軍閥！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開始機械化閃電進擊，到了21日已經完全佔領遼寧省與吉林省。由於「關東軍」初期只派遣1萬多名官兵參戰，必須等待援軍部隊到達駐守已佔領地區後，方能全面進攻黑龍江省。在「關東軍」的「邀請」並允諾「負擔軍費」之下，「朝鮮軍」林銑十郎司令官（最終任第33任內閣總理大臣，1876～1943）居然越過天皇職權，派兵渡過鴨綠江國界增援，因而最終「關東軍」總兵力達到3萬人。10月13日「關東軍」以友軍張海鵬（1867～1949）麾下部隊為先鋒發動攻擊，在黑龍江遭到「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馬占山（1885～1950）率領13,000名部隊的激烈反擊，雙方漸漸形成拉鋸戰。馬占山早年與張作霖相同是馬賊出身，後來歸降大清帝國之後一直以北滿洲作為根據地。「關東軍」與「東北邊防軍」在齊齊哈爾、龍江一帶鏖戰將近一個月，最後在11月19日，黑龍江省全面陷落。

「關東軍」雖然佔領東北三省，但是礙於國際壓力，甚至當時新成立的犬養 毅（1855～1932）內閣也反對「關東軍」長期持續佔領滿洲。12月，「關東軍」準備往遼寧西部地區進軍，「東北軍」殘軍駐守的錦州成為下一個軍事目標，就在此關鍵時刻中華民國政情再度出現重大變化。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鬥爭之下，被迫宣佈辭去一切職務，此刻張學良在錦州的守軍頓失依靠。雖然日本派出代表，提出與張學良「直接交涉談判」的要求，但此刻張學良雖有撤兵之念，卻無私下決定撤兵之權；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孫科（1891～1973）又一再堅持要張學良部隊死守錦州，但國民政府諸軍閥卻不願出兵支援。此情此景，讓張學良進退維谷，當初「易幟」的決定究竟是對是錯？「關東軍」最後撤軍通牒期限一到，12月25日對錦州展開攻擊，1932年1月2日，錦州宣告失守（如圖）。

1931年9月22日，九一八「滿洲事變」後第四天，有「關東軍大腦」之稱的石原莞爾陸軍中佐率先具體提出，在佔領滿洲全境之後應該建立一個「獨立的親日國家」主張，同時建議由溥儀擔任元首。石原莞爾的提議，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大膽的主張，一時之間「關東軍」內部、甚至日本陸軍省內部都意見紛歧。早在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就在蘇聯扶植下獨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共產國家，雖然成立之初全球只獲得蘇聯承認，但最終還是獲得聲稱擁有外蒙古主權的中華民國在1946年予以承認。對石原莞爾而言，該國的建國過程與體制就是未來「滿洲國」這個新國家的最佳模版。


奉天行省公署

「東北行政委員會」

在尚未獲得日本內閣與陸軍省的同意之前，1931年11月「關東軍」派出「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1883～1948，最終為大將）親自前往天津，嘗試說服溥儀出任新建立的共和國元首。其實在九一八「滿洲事變」之前，滿洲內部已經出現迎溥儀回滿洲的言論。如今，「關東軍」親自前來天津遊說，其實溥儀心中早有定見，畢竟這就是多年來他心中最大的期盼。藉助大日本帝國在滿洲的勢力，讓溥儀能夠在「龍興之地」復辟；比其遙遙無期的自力復國，這對他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更何況，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前例，就算暫時需受制於他國勢力成為附庸國，但長久下來或許有朝一日可以「假戲真作」，讓滿洲真正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在21世紀的今日，回顧百年前建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歷史發展，也不難理解當時溥儀與身邊近臣的思考邏輯。

1931年11月10日夜晚，溥儀按照事前多次演練，並且依照土肥原的提醒，在連對婉容皇后都再三保密的狀況下，趁著夜色在深受溥儀信任的工藤鐵三郎（1882～1965）與土肥原賢二親自護送下，經營口輾轉抵達旅順。工藤鐵三郎其後被溥儀賜名「工藤 忠」，是一名「亞細亞主義」者，在大滿洲帝國時代擔任侍衛處長、宮內府顧問。溥儀對其完全信賴，同時也認為工藤是唯一會站在其立場著想的日本人。工藤 忠晚年曾長期定居於臺灣，從事蝶類研究，一生以曾擔任溥儀侍從為榮。

溥儀抵達滿洲的消息，瞬間就傳了開來，但是「關東軍」基於日本內閣尚未做出決議以及還在觀察國際輿論，遲遲未讓溥儀在滿洲有重大公開行程。此時的「關東軍」深知，不可能用「長期佔領」的方式擁有滿洲，於是成立一個親日政權勢在必行，但是由誰出任這個新政權的元首，「關東軍」內部有種種方案所以還舉棋不定。

1932年2月19日，當時滿洲四大勢力，張景惠、愛新覺羅・熙洽、臧式毅、馬占山齊聚奉天，召開「東北行政委員會」。在會議中，四巨頭決定對世界發表滿洲建國的主張，公告「**脫離與黨國政府關係，東北省區完全獨立**」，同時會中決議由溥儀出任新國家元首。

時任「關東軍第二課長」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帶著「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決議案，前來對溥儀呈報。但是，令溥儀一時無法釋懷的是，板垣征四郎提出的「關東軍」方案是，要建立「共和國」而非「帝國」、元首是「執政」之稱而非「皇帝」。正因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溥儀對「共和國」、「總統」、「執政」這些名詞深惡痛絕，這部分讓溥儀開始有些猶豫。但不論是板垣或鄭孝胥都表示，這是一項「權宜之計」，目前「關東軍」剛佔領滿洲全境，世界各國對此議論紛紛反對日本獨佔滿洲利益，應該先出面穩定情勢接著等待國際承認之後，改為帝制將有如水到渠成。就算溥儀當時有些失望，但是他也沒有更好的選擇，畢竟無論名稱為何他還是成為一國之君。

其後，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1871～1949）、「內蒙古盟長」齊默特色木丕勒（1874～1942）、「呼倫貝爾地區代表」莫日登　凌陞（1886～1936），也加入「東北行政委員會」，並且同意將自己的統治區域劃入滿洲國版圖，脫離國民黨專政下的中華民國尋求獨立。影像中為當時的「奉天行省公署」。



「東北行政委員會」四巨頭

愛新覺羅・熙洽（左一，1884～1950），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中華民國成立後擔任「東北陸軍講武堂」教育長。熙洽是張學良的老師，同時也是一個復興大清運動的積極支持者。九一八「滿洲事變」期間，熙洽採取親日立場，讓日本兵不血刃進入吉林，其後擔任「吉林省長官公署」長官並宣佈從中華民國獨立。滿洲國成立後，熙洽歷任滿洲國吉林省省長、財政部大臣、宮內府大臣。戰後被蘇聯押送至西伯利亞，1950年被轉送回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病死於哈爾濱獄中。

張景惠（左二，1871～1959），是張作霖的老戰友，亦為「奉系軍閥」之一。在「皇姑屯爆炸事件」中，張景惠與張作霖同坐一個車廂，身受重傷但倖存。在九一八「滿洲事變」後，擔任黑龍江省省長。滿洲國時期，張景惠先被任命為「參議府議長」兼「北滿特別區行政長官」，最終出任大滿洲帝國總理大臣。戰後，先被蘇聯押送至伯力戰俘營，1950年被轉送回中華人民共和國遭受監禁，1959年因動脈硬化死於獄中。

臧式毅（右二，1884～1956），「奉系」軍人。臧式毅早年公費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24年，繼張學良之後擔任「東北陸軍整理處」參謀長。1928年6月4日，「皇姑屯爆炸事件」中張作霖被炸身亡，臧式毅決定密不發喪，同時派人暗中通知張學良，使其有時間可以穩定接掌「東北軍」軍權。臧式毅一向被認為是張學良的心腹，因其為人剛直極受張學良信賴，於1930年出任遼寧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滿洲事變」爆發，臧式毅不斷電告張學良，盼其能儘速從北京回師奉天，或是派遣部隊前來營救。但是，張學良深知「關東軍」實力強大，不願貿然投入折損兵力，影響他在國民政府軍中的分量，因此對臧式毅的敦促充耳不聞。臧式毅在數度遭拒，甚至到後來張學良連電話也不願接聽的情況下，因為孤臣無力心灰意冷只能投降。1931年12月15日，臧式毅被「關東軍」任命為奉天省省長。滿洲國建立後，出任「民政部總長」兼奉天省長，其後歷任民政大臣、參議府議長。戰後，被蘇聯押送至遠東監獄，1950年被轉送回中華人民共和國後，1956年病逝於撫順戰犯管理所。

馬占山（右一，1885～1950），與張作霖同為馬賊出身，「奉系軍閥」。九一八「滿洲事變」爆發後，奉張學良之命擔任黑龍江省政府主席，在齊齊哈爾周邊地區與「關東軍」數度發生激戰，但最後不敵而撤退。在關東軍的勸說下，擁有2萬兵力的馬占山參與滿洲國的建國計畫，其後並擔任黑龍江省省長兼滿洲國軍政部總長。1932年4月1日，詐降成功的馬占山由齊齊哈爾出逃黑河，隨後於12月逃往蘇聯。1933年6月，馬占山輾轉由歐洲回中國後向蔣介石呼籲「全面抗戰」，但遭忙於剿滅共產黨軍隊的蔣介石冷眼以對。1936年馬占山參與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1937年擔任「東北挺進軍」總司令。1950年，病逝於北京。



《滿洲國建國宣言》

1932年2月18日，「東北行政委員會」張景惠、愛新覺羅．熙洽、臧式毅、馬占山，以及湯玉麟、齊默特色木丕勒、莫日登．凌陞共同具名發表了原文為滿文的《滿蒙新國家獨立宣言》。向世人昭告：「著即與黨國政府脫離一切關係，東北省區完全獨立。更以獨立之精神，力圖行政改善。」

同年3月1日，進一步正式發表《滿洲國建國宣言》，並明確指出：「乃自辛亥革命，共和民國成立以來，東省軍閥，乘中原變亂之機，攫取政權，據三省為己有，秕貔相繼，竟將二十年，狼厲貪婪，驕奢淫佚，罔顧民生之休戚，一唯私利之是圖。……以我滿蒙三千萬之民眾，託命於此殘暴無法區域之內，待死而已，何能自脫？……惟視內顧中原，自改革已還，初則群雄角逐，爭戰頻年，近則一黨專橫，把持國政，何曰民生？實置之死；何曰民權？惟利是專；何曰民族？但知有黨！既曰天下為公，又曰以黨治國，矛盾乖謬，自欺欺人，種種偽詐，不勝空語。……滿蒙舊時，本另為一國，今以時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謀樹立應即以三千萬民眾之意向，即日宣告與中華民國脫離關係，創立滿洲國，……凡在我國家領土之內住者，皆無種族之歧視，尊卑之分別，除原有之漢族、滿族、蒙族及日本朝鮮各族外，即其他國人，願長久居留者，亦得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應得之權利，不使其有絲毫之侵損。並竭力鏟除往日黑暗之政治，求法律之改良，勵行地方自治，廣收人才，登用賢俊，獎勵實業，統一金融，開闢富源，維持生計，調練警兵，肅清匪禍。更進而言，教育之普及，則當惟禮教之是崇，實行王道主義，必使境內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臺，保東亞永久之光榮，為世界政治之模型。其對外政策則尊重信義，力求親睦，凡國際間舊有之通例，無不敬謹遵守。其中華民國以前與各國所定條約、債務，屬於滿蒙新國領土以內者，皆照國際慣例繼續承認。其有自願投資於我新國境內創興商業，開拓利源，無論何國，一律歡迎，以達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實際。」於此宣言中，業已道盡滿洲國成立之經緯以及未來民族政策。從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紛擾不斷，被中國、俄國、日本等「外來政權」侵佔的滿洲，滿洲人的聲音始終被排除在外，現在至少「形式上」回到滿洲人手中。

在《滿洲國建國宣言》宣告的同時，也發佈了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幾項要素：正式國名為「滿洲國」；體制為「共和」；溥儀為「執政」；年號定為「大同」；國旗為「五族協和旗」（滿族、大和族、漢族、蒙古族和朝鮮族）；以「蘭花」為國花與國徽；首都定為「新京」（長春）；領土範圍包括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全境（不含日本租界「關東州」）以及內蒙古東部與承德；以「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為建國方針。

從大清帝國覆亡以來，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的滿洲人，因為擔心會遭受漢人報復，大都隱姓埋名偽裝成漢人。滿洲決定建國以後，對滿人而言有如大旱之望雲霓，舉家遷回滿洲者始不絕於道。圖為1933年3月1日，滿洲國全境舉辦「慶祝承認滿洲國週年」慶典。



溥儀擔任滿洲國執政

在1932年召開的四巨頭「東北行政委員會」當中，對於未來滿洲國的國家體制，內部分為臧式毅力主的「共和制」與熙洽主張的「君主制」兩派不同主張。在臧式毅的堅持下，同時「關東軍」也認為「君主制」在當時很難被國際所接受，因此最後定案為民本主義「共和制」。溥儀雖然對滿洲國的「共和制」感到失望，最終還是在眾人的勸說下勉強同意。因為在溥儀的心中，1924年蘇聯所扶植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先例，似乎是「共和制」最強而有力的具體說服。

1932年3月6日，溥儀離開旅順大和飯店住所，被恭迎前往新京。3月8日下午3時溥儀抵達新京車站時，在月台上立刻奏起軍樂，站前廣場也站滿了歡迎的群眾，對溥儀而言無疑一掃之前的種種疑慮，他確信此時自已真的成為這個新國家的元首。特別是歡迎的群眾紛紛手執代表大清的「黃龍旗」與「太陽旗」，這些上千名歡迎他的滿人讓溥儀心中熱血沸騰，畢竟在忍辱20年之後，他真正回到了自己祖先的「龍興之地」。特別是當溥儀親眼見到民眾用「跪迎」的方式迎接他，並聽見民眾高呼「萬歲，萬萬歲」，此情此景讓他熱淚盈眶，「執政」也好，「皇帝」也罷，一切都比不上實質重要。

3月9日下午2時，溥儀於「吉長道尹公署」（原為前清於1908年所設之「吉林西路兵備道」，1914年改稱現名）舉行就職典禮，正式定年號為「大同」。由於溥儀的正式宮殿尚未開始建造，因此先住進剛修繕一新完工的原「吉黑榷運局官署」，這裡也被稱為暫時性的「假宮」，等同是溥儀的臨時「帝宮」。

由於滿洲國建國是由「關東軍」所獨斷主導、策劃，因此當時的大日本帝國犬養 毅內閣堅決不予承認。1932年5月15日，在由一群海軍尉級軍官所發動的日本國內「五・一五政變」中，犬養 毅總理大臣居然遭到暗殺身亡。繼任的齋藤 實內閣對承認滿洲國新政權問題，起初深怕國際負面輿論觀感不佳因此抱持猶豫態度；但是一切「先斬後奏」之後才要內閣追認的「關東軍」此時更是進退維谷，於是透過「參謀本部」不斷對新內閣施壓，日本內閣終於在9月15日承認滿洲國政權，成為全世界第一個與滿洲國建交的國家，此時距離滿洲國宣佈建國已經超過半年。「關東軍」在滿洲的第三次大暴走，不僅讓日本就此走向戰爭的命運，同時自認為可以改變政情走向的軍人干政結果注定讓國家面臨覆亡。

影像中為溥儀就任執政後與典禮代表合影：溥儀（中坐者）其右手邊起關東軍司令官本庄 繁、滿鐵總裁內田康哉、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後排）、獨立守備隊司令森 連中將、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長官駒井德三（左一）。溥儀左手邊起執政府侍從武官處武官長張海鵬（後排著軍服者）、國務院總理鄭孝胥、參議府議長張景惠、執政府內務處長愛新覺羅・寶熙、財政部總長兼吉林省長愛新覺羅・熙洽、軍政部總長馬占山（後排）、民政部總長兼奉天省長臧式毅、興安局局長齊默特色木丕勒。



李頓調查團以及報告書

1931年9月19日，中華民國政府訓令駐「國際聯盟」代表施肇基（1877～1958），要求國聯對日本佔領滿洲「正當性」一事進行仲裁。「國際聯盟」是一戰末期由美國發起，以一戰戰勝國為主組成的國際組織，因此中途退出協約國陣營的蘇聯不在其中。該聯盟主要目的是處理一戰之後的歐洲紛爭，而大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在一戰中均為戰勝國，所以也入列「國際聯盟」成員，然而作為發起國的美國卻反而缺席，所以主要權力由大英帝國把持。

雖然「國際聯盟」日本代表芳澤謙吉提出與中華民國「直接交涉」以解決滿洲紛爭，但是蔣介石堅持由無實質管轄能力的「國際聯盟」進行仲裁，企圖將內政問題國際化。而獨斷橫行的「關東軍」深知如果長期佔領滿洲，必將引發國際輿論撻伐，於是在九一八「滿洲事變」之後的1932年，迅速促成滿洲國獨立建國，之後反倒要日本內閣追認並把闖禍的結果丟給職業外交官解決。因此滿洲國建國是否出自於「民族自決」的「合理性」也是「國際聯盟」調查重點之一。

1931年12月，「國際聯盟」派出以英國李頓伯爵（Victor Bulwer-Lytton，右三）為團長，以及法國克勞德中將（Henri Edouard Claudel，右四）、德國舒奈博士（Heinrich Albert Schnee，右五）、美國麥考威少將（Frank Ross McCoy，右二）、義大利王國馬烈斯科第伯爵（Luigi Aldrovandi Marescotti，右一）五人組成「李頓調查團」，前往日本、滿洲、中國進行實地調查直到1932年6月結束；10月2日，該調查團提出《李頓報告書》將結果公諸於世。

《李頓報告書》直接否定日本出兵「南滿鐵路及其附屬地」以外地區的正當性，同時認為滿洲國的建國雖然並非出自於主動性的「民族自決」，但是居然提出讓日本與中華民國都感到憤怒的仲裁建議方案：該方案建議在滿洲成立「自治政府」，同時由「國際聯盟」各國派員行使行政權；同時將滿洲劃為非軍事區，由「國際聯盟」派兵組成維安部隊駐守。簡而言之，「國際聯盟」要求紛爭兩造雙方均放棄權利，滿洲可成為自治區由仲裁者漁翁得利、各國勢力均可自由進入滿洲。

調查團也曾直接覲見訪問溥儀，但正如同溥儀事後所言：調查團只關心未來是否持續開放通商、是否持續確保各國在滿洲利益，對滿洲國建國經過毫不關心。畢竟，「國際聯盟」還是由西方列強組成，對其而言，滿洲繼續「門戶開放」讓列強「利益均享」才是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同時由各國派兵「駐軍維安」，共同抵禦可能南下的蘇聯勢力，才是符合「國際聯盟」的戰略需求。至於日、中兩國間的紛爭仲裁，反而不在其利益考量之中。正因如此，日本於1933年3月27日宣佈退出「國際聯盟」。



滿洲國執政府

溥儀所居住的皇宮由於正式的新宮殿尚未建設完成，因此也被稱為臨時性的「假宮」。而在「假宮」中設有「執政府」的辦公廳舍（溥儀稱帝後改稱「宮內府」），專門處理宮內相關事務。而「假宮」在溥儀入住之前，滿洲國總理府與「關東軍」已經先進行過大規模的改裝。

「假宮」的正門入口是「萊薰門」，在鐵閘門上巨大的金色「蘭花國徽」十分引人注目（如圖），此門為溥儀、皇室與一級官員以及「關東軍」司令官進出專用。進門後即是溥儀的起居樓，名為「緝熙樓」，取自於《詩經》中「於緝熙敬止」，代表光明之意。「緝熙樓」為二層青磚外觀建築，東半側兩層為皇后婉容起居室與臥室。西半側一樓原為溥儀私人起居室，1937年冊封「祥貴人」譚玉齡（他他拉・玉齡，1920～1942）之後，成為「祥貴人」的起居室；而西側二樓則為溥儀寢宮。同時在「緝熙樓」的南、北、東邊蓋有平房數幢，這些建築為溥儀近身衛士、乳母以及御醫的住所。

「緝熙樓」西側擁有兩座花園、網球場、馬場，同時溥儀弟妹的住所也在此一區域。過「緝熙樓」再朝北邊方向進「中和門」之後，為溥儀日常辦公場所，名為「勤民樓」取其勤政愛民之意。「勤民樓」一樓為溥儀接見外賓場所；而溥儀的辦公室則位於二樓，名為「健行齋」，取《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

從滿洲國「假宮」的諸多設施、安排來看，在配置上對於溥儀與其家人給予極為細膩的設想。在此同時，「關東軍」與滿洲國政府所提出的《國都建設規劃》中，將於新京南郊修建正式皇宮並定於1938年9月正式奠基動工，佔地為原紫禁城的七成大小，共約51.2公頃。但是該正式皇宮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尚未完工。

執政府第一任「府中令」（職務類似大清「總管內務府大臣」、臺灣「總統府祕書長」）為曾任奧匈帝國公使的外交官沈瑞麟（1874～1945）。1921年，沈瑞麟任「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1925年2月，沈瑞麟出任段祺瑞臨時執政的外交總長。1929年，沈瑞麟任職中蘇共管「東清鐵路」理事。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東清鐵路」改由滿蘇共管，沈瑞麟擔任「北滿鐵路」首席理事。1933年，沈瑞麟調任滿洲國執政府「府中令」一職。1934年3月1日改為帝制後，「府中令」改名為大滿洲帝國「宮內府大臣」；1935年該職務改由愛新覺羅・熙洽擔任。



進軍熱河與併入滿洲國

溥儀日後在獄中被迫寫下的回憶錄裡，多次表述他受到「關東軍」的威脅與逼迫，由於是他人代筆其史實度如何已不可考。但至少發生在1933年2月21日的「熱河討伐作戰」，是出自於溥儀執政的堅持，要求「關東軍」派兵偕同滿洲國軍共同作戰。在滿洲的固有疆域認知中，熱河省原本就屬於「滿洲四省」，因此從康熙皇帝開始就在承德設有「避暑山莊」行宮；此外在大清「滿蒙一家」的思考下，熱河地區的蒙古族與滿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雖然在1932年的《滿洲國建國宣言》中，代表熱河的軍閥湯玉麟也曾落款署名，但實質上熱河省一直未曾服從滿洲國的政令。湯玉麟早年為東北土匪，其後加入張作霖麾下，曾兩度解救張作霖於危難，因此結為兄弟之交。1916年，湯玉麟被任命為奉天省城密探隊司令，結果其部隊在奉天開設賭場、偷搶拐騙、淫人妻女，甚至還槍決前來執法的兩名憲兵，因此遭張作霖免職。後經張景惠向張作霖說情，終於讓湯玉麟回到部隊，1926年起成為「熱河都統」，實際統治熱河。九一八「滿洲事變」後，如前所述，蔣介石為了「名義上的統一」，對所有降將不分優劣照單全收，因此參與張學良「易幟」的湯玉麟被改敘為「熱河省政府主席」。而盜取、破壞大清乾隆、慈禧陵墓的「東陵大盜」孫殿英，正是湯玉麟麾下駐守於熱河的重要將領。

基於上述理由，不難想像溥儀執政為何堅持要收復熱河。同時在1932年簽訂的《滿日議定書》中明訂滿日兩國有相互防衛的義務，因此「關東軍」在「滿日軍事共同防禦」的前提下必須積極配合。於是，1933年2月21日，滿洲國軍由張海鵬、于芷山率領；而「關東軍」則由武藤信義大將指揮。滿日聯軍兵分三路，以機械化部隊的閃電戰方式朝熱河承德進軍。

滿日聯軍對上湯玉麟的2萬餘名土匪部隊，攻勢凌厲進展神速。張學良因為坐視東北三省的失守未曾出兵，在中華民國內部遭到輿論的強烈指責，因此在「熱河作戰」爆發時得到蔣介石的認可，將旗下軍隊抽調五個旅進入熱河支援。湯玉麟除了張學良的支援部隊之外，因為顧慮其他派系部隊進入熱河「搶地盤」則一概拒絕。像湯玉麟這種「請神容易送神難」的「地盤心態」，當然結果是兵敗如山倒。

2月21日當天，滿日聯軍僅耗費200人兵力就順利佔領遼寧、熱河邊境城市劉龍台。24日，滿日聯軍攻下北票。25日，聯軍推進到朝陽，國民政府守軍不戰而逃，聯軍入城受到居民夾道歡迎。（如左頁圖，朱家煌提供）戰事爆發以來滿日聯軍一路暢行無阻，而湯玉麟的國民政府部隊不是潰散、就是成批投降。3月3日，湯玉麟率領1千人部隊棄承德而逃，途中因確認日軍尚未抵達才又回師承德。3月4日上午7時，湯玉麟再度棄部隊於不顧，逃至天津；當日下午1時，128名「關東軍」騎兵前鋒部隊抵達承德城外，守軍孫殿英部隊不敵區區128名騎兵，致使日軍順利進入承德。從2月21日起，僅耗費10餘日，熱河地區全被滿日聯軍攻陷，「熱河作戰」結束，從此納入滿洲國版圖。



從滿洲國到大滿洲帝國

從1931年成立滿洲國之後，出自於溥儀個人與前清近臣的意願，希望進而在滿洲這塊女真人固有疆域上成立一個帝國，況且日本已經退出「國際聯盟」，對國際壓力已然充耳不聞，對「關東軍」而言協助溥儀達成夢想至此已無懸念。

溥儀也曾諭令心腹工藤 忠前往日本，在國會、內閣間四處探聽、遊說恢復帝制的可行性。而工藤 忠從日本歸來，帶回日本方面認為「未嘗不可」的信息。1933年7月27日，在「熱河作戰」順利達成使命的「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因急性黃疸病故於新京，職務由曾擔任「臺灣軍」司令官的菱刈 隆（1871～1952）接任。10月，菱刈司令官對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表示，已獲得日本政府同意，溥儀執政成為皇帝的時機已到。

溥儀能夠復辟帝位，大日本帝國的助推力量自不待言，而從《康德帝即位詔書》中也可看出溥儀對日本充滿了感激之忱：「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我國肇基，國號滿洲，於茲二年，原夫天意之愛民，賴友邦之仗義，其始兇殘肆虐，安忍阻兵，無辜籲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國，冒群疑而不避，犯眾咎而弗辭，事等解懸，功同援溺，朕以藐躬，乃承，天眷，假我尺柄，授我丘民，流亡漸集，興其謳歌，兵氣潛銷，化為日月，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而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籲請正位，詢謀僉同，敢不敬承，天命其以大同三年三月一日，即皇帝位，改為康德元年，仍用滿洲國號，世難未艾，何敢苟安，所有守國之遠圖，經邦之長策，當與日本帝國，協力同心，以期永固，凡統治綱要，成立約章，一如其舊，國中人民，種族各異，從此推心置腹，利害與共，無渝此言，有如皦日，無替朕命，咸使聞知。」

在溥儀「登極大典」之前，執政府組織召開了「登極大典委員會」，由溥儀親自主持。該委員會主要成員來自國務院，同時由熱情擁護帝制的財政部總長愛新覺羅．熙洽，以及立法院憲法制度調查委員會委員袁金鎧（1870～1947）共同領軍。會中合議「登極大典」一切形式必須按照大清法統行事，其中包括遵循大清禮法祭天、祭祖等等繁瑣事宜。於是在「登極大典委員會」的運籌下，積極招募民工在新京西南城郊杏花村，搭建祭天、祭祖用的「天壇」。此一祭天用的「天壇」，畫方三百二十尺，坡高一百二十尺，上頂七尺，直徑二十七尺。在祭祀的台子周圍，都用代表皇帝的黃色綢緞加以覆蓋。「關東軍」建議溥儀為符合國際觀瞻，在祭天、祭祖活動時穿著大清龍袍無妨；但是在「登極大典」此一國際正式場合，還是穿著「滿洲國陸海空軍元帥服」比較妥當。最終決定龍袍只在祭祀時穿著，其餘場合還是穿著西式服裝，以符合「登極大典」正式國際性場合禮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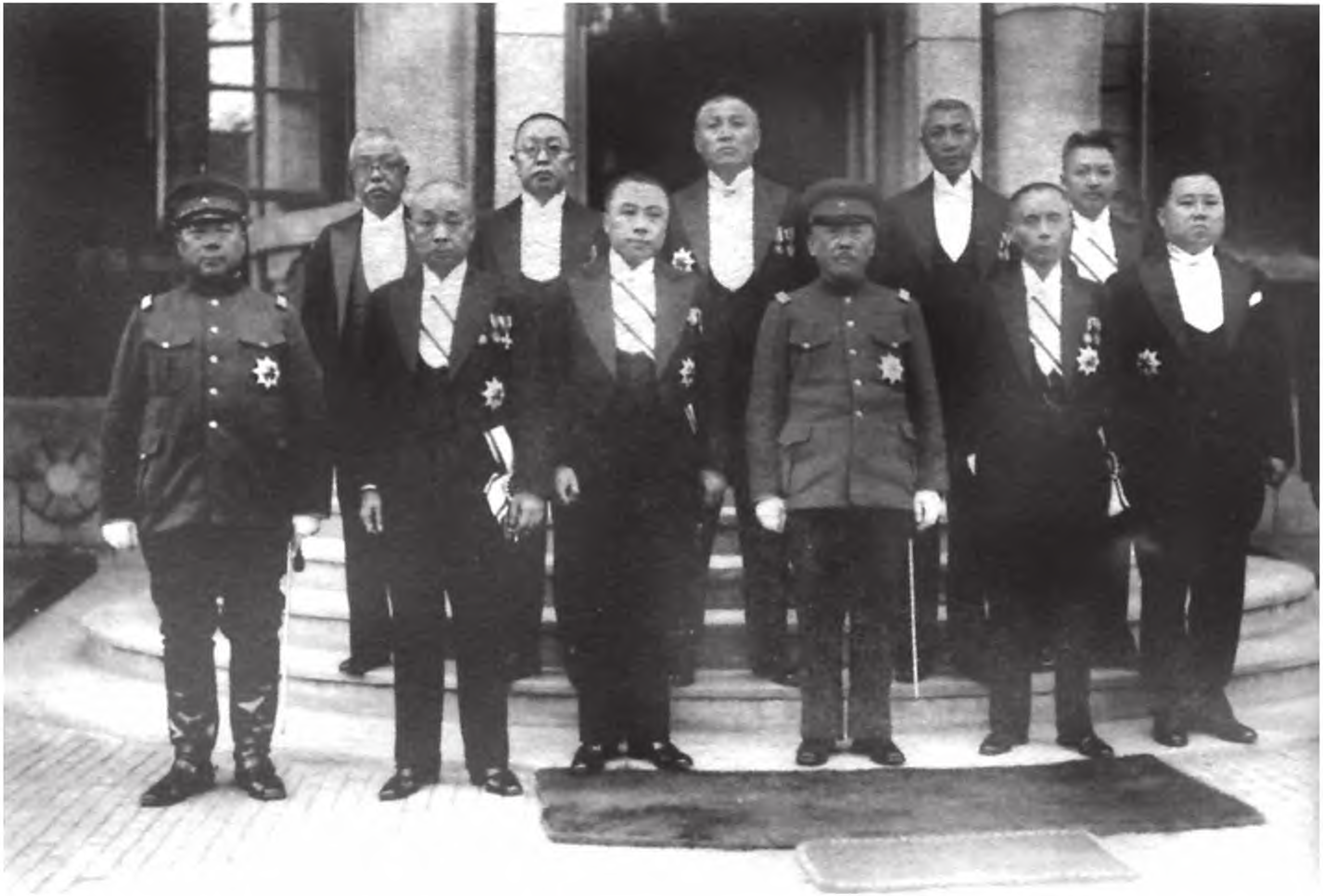
大滿洲帝國與「康德元年」

1934年3月1日，大滿洲帝國正式成立。溥儀皇帝的車隊，在7點30分從「緝熙樓」出發來到新京西南的杏花村。在「天壇」舉行過祭天儀式之後，溥儀皇帝進入祭祖儀式用的正殿，接著舉行祭祖儀式並接受朝臣行跪覲大禮，然後換上大滿洲帝國元帥禮服，步出正殿。當天的儀式警戒、維安工作，全交由「民政部警務司長」長尾吉五郎負責。接著溥儀在前導車開道下，回到皇宮內的「勤民殿」（由「勤民樓」升格），站在寶座前接受以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為首的文武百官朝賀，然後接受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洲國大使」菱刈 隆呈遞的國書。最後，接受專程由北京前來的滿洲宗室成員及內務府人員的三跪九叩大禮。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隨後用廣播方式，對滿洲全境以及亞洲各地發表宣告，從此改國號為「大滿洲帝國」，年號則由「大同」改為緬懷康熙皇帝之「康德」。

「登極大典」不僅是溥儀與滿清宗室、遺臣的大事，對滿洲民眾而言也是一件驚天動地的變革。在大典當天，新京民眾以及來自滿洲各界所推派的祝賀團，頂著寒風一早就在溥儀車隊所經過路線上引頸相候。有些以遺老自居的民眾，甚至在溥儀經過時行跪拜禮，特別是在國務院前廣場上更是擠滿數萬群眾。雖然滿洲國民對這個國家是由「關東軍」扶植的事實心知肚明，但比起之前的軍閥盤據，一個嶄新的未來還是值得期待。

「關東軍」對於大滿洲帝國皇帝「登極大典」的態度，十分積極與謹慎處理。在大典的行程安排上，「關東軍」並不過問溥儀祭天與祭祖的細節，對「關東軍」而言這是溥儀的「私人行程」。但是在祭天行程結束、回到「勤民殿」即位，以及後續的慶祝遊行活動、國宴之類的細節，「關東軍」幾乎錙銖必較。因為海內外記者與世界各國都在關心此事，甚至包含中華民國在內。因此，整個溥儀皇帝的公開行程，必須合乎國際禮儀，讓大滿洲帝國及其皇帝在世人眼前是一個現代國家與君主的姿態。從少年時期即接受英籍恩師莊士敦爵士教育的溥儀，對此自然無需反對且欣然接受。

為了「登極大典」順利以及妥善維護海內外來賓的安全，僅憑新京當地的警力實不足以應付。因此，「民政部警務司長」長尾吉五郎從全滿洲各大都市調派警力前來組成「登極大典警衛隊」，共同執法用以保證大典各項活動的順利進行。這支特別任務編組的「大典警衛隊」人數高達2,850人，在順利完成任務之後，於3月4日正式解散各自歸隊。慶典活動還包括，5月10日溥儀以大滿洲帝國皇帝兼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身分，在國務院旁校閱場舉行了「大典觀兵式」。這場空前的閱兵式，有近萬名滿洲國軍以及「關東軍」聯合接受校閱。



大滿洲帝國的國家體制

溥儀即位後的「大滿洲帝國」，雖然對許多政府組織進行更名或改造，且直到二戰結束都尚未公佈正式憲法，但該國基本上維持仿自大日本帝國的「君主立憲」精神。因此，大滿洲帝國皇帝的職權為：法律執行權、敕令發佈權、文武官任免權、滿洲國軍隊統帥權、宣戰媾和條約制訂權、榮典授與權以及特赦權。

在政府體制上，大滿洲帝國採取「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四權分立架構。而行政權最高行使機關是「國務院」，設有「總理」一職，其下包含「治安部」、「軍事部」、「文教部」、「外交部」、「司法部」、「產業部」、「興農部」、「交通部」、「經濟部」、「厚生部」、「國民勤勞部」、「新京特別市公署」、「首都警察廳」以及各省公署，各部最高長官為「大臣」。

此外立法機構為「立法院」，院長為最高首長。因為尚未公佈憲法，因此針對單項不同領域訂定專門法條。最高司法審判機關為「最高法院」，最高檢察機關則為「最高檢察廳」。行政監察機關為「監察院」，但於1937年起廢除；因此大滿洲帝國最終成為現代化的三權分立國家。另外，溥儀還有諮詢國政的直屬「參議府」，最高首長為議長。

在1932年滿洲國建國時期，鄭孝胥就深知「關東軍」成立滿洲國的目的是一種障眼法。因此一開始在《滿日議定書》的附屬條文當中就已明訂，各部最高首長必須由滿洲人出任，同時在各機關的日本人（含臺灣人、朝鮮人）不得超過該機關人員總數的一半。大致上，「關東軍」直到大滿洲帝國滅亡，依然遵守該項原則。但是由於各機關的「次長」階層大多由日本國籍者擔任，因此真正的「執行權」還是由「關東軍」所掌控。1920年代之後的「關東軍」，已經不再是「南滿鐵」後藤新平總裁時代的「鐵道保護者」或是安全巡邏隊，其獨斷的行為與權力甚至已經超越日本國會與內閣。如果連日本天皇都是「關東軍」所利用的對象，那滿洲皇帝成為「關東軍」的一顆棋子就更不讓人意外了。

圖中為「大滿洲帝國」張景惠內閣時期的政府要員，前排左起：軍政部大臣于芷山（1882～1951）、駐日特命全權大使謝介石（1878～1954）、宮內府大臣愛新覺羅．熙洽、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參議府議長臧式毅、民政部大臣呂榮寰（1890～1946）。後排左起：參議府參議沈瑞麟（1874～1945）、交通部大臣李紹庚（1896～1949）、財政部大臣孫其昌（1885～1954）、文教部大臣阮振鐸（1893～1973）、外交部大臣張燕卿（1898～1951）。



「滿洲國協和會」

「滿洲國協和會」的前身，是由主張「滿洲必須獨立於中華民國」的倡導者、前「奉系」政治家于沖漢（1871～1932，滿洲國第一任監察院長）在「滿洲事變」之後，為建國理想而成立的「滿洲國自治指導部」，其後隨滿洲國成立，該組織自然消失。最終，整合在滿洲的「大雄峰會」、「滿洲青年聯盟」等政治團體，成立「滿洲國協和黨」。但是由於溥儀對「黨」字的不悅，因此改名為「滿洲國協和會」，從此成為滿洲國唯一的「類政黨」民意團體。創立之初由溥儀出任名譽總裁、「關東軍」司令官本庄 繁擔任名譽顧問、國務院總理鄭孝胥擔任會長、外交總長謝介石出任事務局長。由上述人事可知，「滿洲國協和會」是一個國家與政黨合為一體的政治組織；換言之，滿洲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在1940年，日本為了「國家總動員體制」的需求，仿造德國、義大利成立一黨專政的「大政翼贊會」政治結社（在臺灣則稱為「皇民奉公會」），而滿洲國的一黨政治架構則足足比日本內地早了8年。這也顯示出「關東軍」的智囊如石原莞爾等人的思想鑿痕，以及對黨、政、軍合為一體的理念。

「滿洲國協和會」在滿洲各地區設立分會，並由各分會推舉出代表組成議會，以代行從未開議的「滿洲國立法院」職責。但隨著1934年10月，滿洲國立法院停止運作機能，第一任立法院長趙欣伯（1890～1951）離開職務，「滿洲國協和會」同時喪失立法功能，僅留通過、追認法案的機能。

雖然石原莞爾等「關東軍」高級參謀致力於將滿洲國與「滿洲國協和會」創建成「有別於日本」的新國家與新菁英政黨，甚至構想有朝一日「滿洲國協和會」能取代「關東軍」成為滿洲國統治機關，但是終究「關東軍」與滿洲國均無法獨立於日本之外。隨著日本、臺灣、朝鮮進入「國家總動員體制」，禁止一切結社政黨活動，「滿洲國協和會」於1937年開始產生質變，菁英代議士功能逐漸由滿洲各省行政長官與官僚取代，形成政府行政與議會完全一體化的政體。其後，與日本國內單一政黨「大政翼贊會」相同，在「滿洲國協和會」之下設有「協和義勇奉公隊」、「協和青少年團」、「婦人會」等次級組織。1940年開始，在日本本土與臺灣實施的「鄰組」民間戰時互助組織，也劃入「滿洲國協和會」的管轄並積極於滿洲全境推動。最終，「滿洲國協和會」與日本「大政翼贊會」無異，成為「國家社會主義」導向的黨國一體政黨。



在「關東軍」的「思想理論大師」石原莞爾的支持下，「滿洲國協和會」成為該國唯一政黨。石原莞爾在帝國陸軍中是一個怪傑，一生不煙不酒，同時醉心於「亞細亞主義」；不論是帝國陸軍或是「關東軍」，甚至是帝國政府都是達成他「理想國家」的工具而已，而「滿洲國」即是他的「理想國」。與其說石原莞爾是一個軍國主義者，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石原仇視大資本家、白人帝國主義，並深信東方的王道與西方的霸道終需一戰。此外，石原篤信佛教並崇尚「日蓮主義」，認為國家必須「政教一體」由菁英領導，而非如同日本國內由政客與資本家把持。在石原的構想裡，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滿洲國，就是實現他全民富強、建立一個足以匹敵歐美的前所未有的國家雛形，因此必須由一個「菁英主義」政黨來為全民謀求福祉，而非讓資本家來影響國政。

4

滿洲來去

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

滿洲國中謎樣的臺灣人脈



《日滿議定書》與對日關係

1932年9月15日，大日本帝國與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該議定書主要內容為：日本承認滿洲國獨立建國、日本得以承續在滿洲國境內的既有利益；以及日滿兩國為「共同防禦同盟」，滿洲國同意「關東軍」在該國屯駐協防。在議定書之外的附屬條款中則明載：滿洲國國防委由「關東軍」負責，其中產生的經費由該國負擔。同時「關東軍」基於防務上的需要，既有的鐵道、港灣、水路與航空運輸之管理與新設工程，需委由日本或日本指定的機構承攬。此外，滿洲國在各地方或中央的日本籍行政官員的錄用上，可由「關東軍」司令官加以推薦，其解職亦需經由司令官同意。

在此之前，為了這紙《日滿議定書》，在日本國內的軍方與內閣多次爭論不休。在同年的3月1日，滿洲國已經對外宣佈成立，但是日本內閣政府遲遲不願意承認滿洲國這個新興國家；同時由於日本是立憲政府，對外締約必須經內閣同意方能生效，這使得獨斷暴走的「關東軍」形成急如熱鍋螞蟻的尷尬狀態。一方面是，亟欲在滿洲成立親日政權，來合理化佔有事實的軍部；對上另一方面從明治維新以來，亟欲向國際間證明「日本是一個法治文明國家」的內閣政府，在此事上意見相左僵持不下，甚至傳出「關東軍」內部少壯派軍人被逼急後提出「乾脆加入滿洲國從日本獨立出來」的瘋狂言論。最終日本內閣不敵激進派軍人、右翼分子的壓力，在歷經三任內閣、距離滿洲國建國半年多之後的9月15日，在「齋藤內閣」的承認滿洲國建國的前提之下，日滿雙方終於簽訂《日滿議定書》。

《日滿議定書》議定書一旦簽訂，著實讓滿洲國當局與「關東軍」鬆了一口氣。對「滿洲國」而言，得到世界第一個國家的承認，同時可以預期後續日本的盟邦也會加入承認的行列，如此一來與溥儀、鄭孝胥朝原先預期的「由假成真」理想跨進一大步。對「關東軍」而言，不斷的在滿洲暴走之下眼見難以收拾。雖然在他們眼中蔑視日本內閣，但如果不妥善處理得到日本政府追認，除了恐將釀成國際事件之外，更極有可能觸怒天皇陛下，而「欺君之罪」不是「關東軍」所能承擔的後果。

影像中為《日滿議定書》簽署當日，右方簽字者為「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左方為代表日本政府簽字的「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其他現場觀禮見證的滿日官員包含影像中後排左起：「滿洲國國務院總理祕書」鄭垂（鄭孝胥長子，1887～1933）、「滿洲國外交部次長」大橋忠一（1893～1975），「滿洲國外交總長」謝介石（1878～1954）、「滿洲國總務廳長官」駒井德三（1885～1961）、鄭孝胥背後的「日本駐滿洲國大使館書記官」米澤菊二（1894～1983）以及在鄭孝胥左側低頭注視的「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1880～1950）。


侍衛官處

頭角崢嶸的謝介石

1932年9月斗大的《日滿議定書》簽約照躍上媒體版面，讓臺灣人極為驚訝的是影像中的「滿洲國外交總長」謝介石，以及印在各大報紙上的大名。若要論及滿洲國與臺灣之間關係密切的人物，當然第一位是在檯面上閃閃發光的謝介石；而另一位則是鮮為人知，默默在檯面下積極運作協調的許丙（1891～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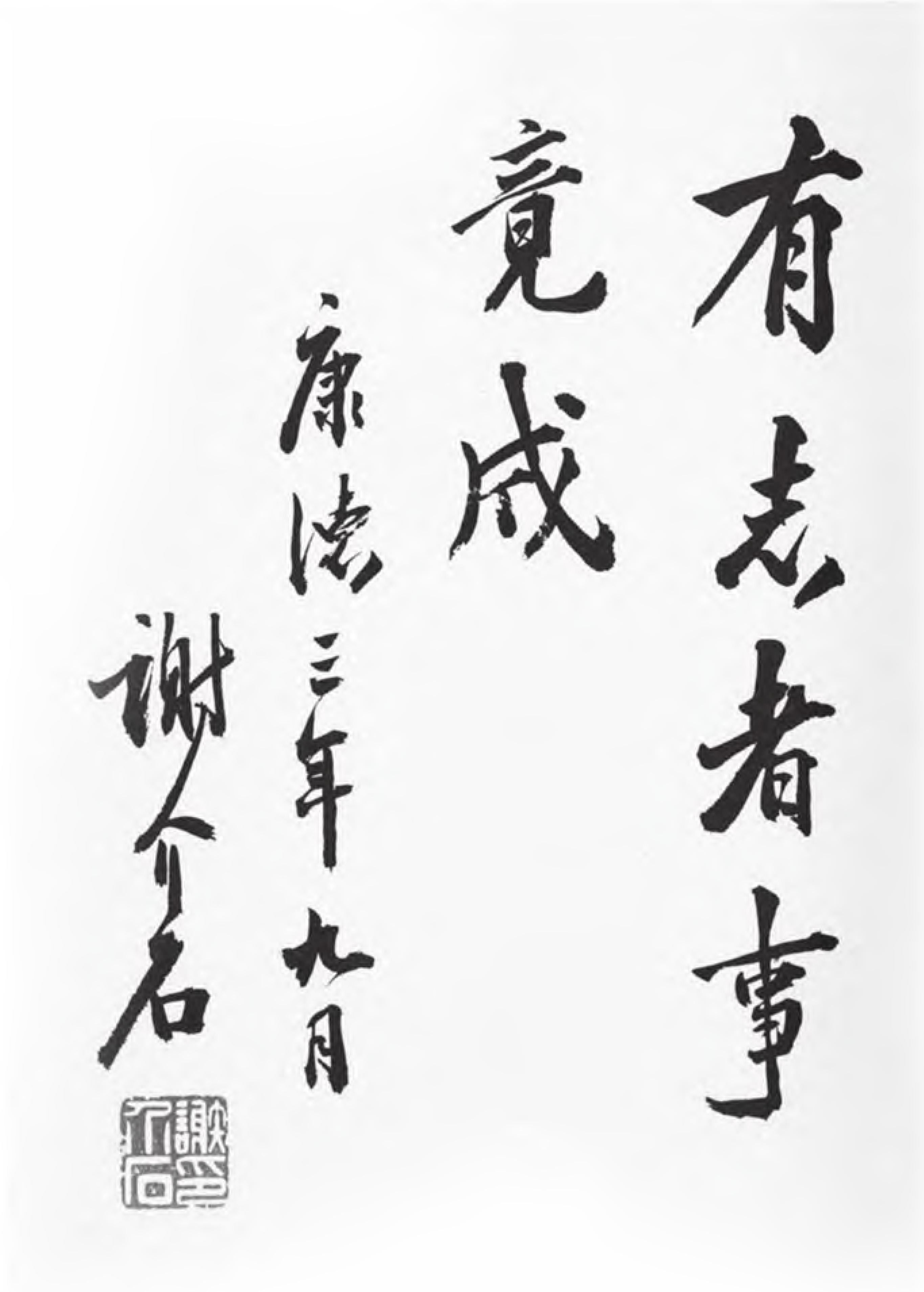
謝介石出生於1878年大清帝國時期的臺灣新竹，幼時曾受漢文私塾教育，1895年其家族決定留在臺灣，時年17歲的謝介石因此順理成為日本籍臣民。1896年，「臺灣總督府」在新竹開設「國語傳習所」，教授臺灣「本島人」（臺灣河洛籍、客籍之總稱）日語，謝介石進入該校就讀成為第一代傳習所學生。謝介石在「國語傳習所」畢業之後於新竹擔任公學校國語教師、法院通譯等職務，同時也在「新竹公學校」繼續研讀取得正式學歷。謝介石父親在清治時期於新竹經營鴉片館，雖擁有財富但社會地位不高。因此，胸懷大志的謝介石決定遠渡日本內地進修，1902年進入「明治法律學校」（1903年改稱「明治大學」法學部）攻讀，並與大清重臣張勳的公子結成同窗好友。因為與張勳的這條人脈關係，讓謝介石與當時的大清官員結下不解之緣。

在謝介石就讀「明治法律學校」期間，由於其日籍臺灣本島人的身分與語言背景，經由賞識他的當時新竹廳長里見義正介紹，1904年被延攬進入「臺灣協會專門學校」（原「臺灣協會學校」，1918年最終改名為「拓殖大學」），擔任福建語（河洛語）講師。「臺灣協會學校」是臺灣第二任總督桂 太郎（1848～1913）回到日本之後所創辦並擔任初代校長，目的在於培養「開拓臺灣所需人才」的高等學校。桂 太郎在臺擔任總督時間雖然僅短短四個多月，但是返回日本之後依然未能忘情臺灣。不僅在1898年延攬與臺灣相關的日本重要政經人士創立「臺灣協會」，同時進一步在1900年設立「臺灣協會學校」，以便在日本內地培育將來治理臺灣的人才。而該校學生在修業三年期間除了專業科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研習臺灣的「福建語」以及「廣東語」（客家語），這也是謝介石會在該校擔任教席的原因。

其後隨著日本版圖的擴大，「臺灣協會」在1907年改稱「東洋協會」，而學校也改名為「東洋協會專門學校」，援用先前對臺灣的經營模式在朝鮮漢城（今首爾）設立「京城分校」、於滿洲設立「東洋協會旅順語學校」、「大連商業學校」；而1917年則於臺北設立「臺灣商工學校」，並於1935年增設「開南高等商業學校」與「開南高等工業學校」，專事在臺灣培育本島、內地青年有志於前往華南、南洋開拓的人才。

影像中為1934年溥儀對該國重要文官頒授「龍光勳章」後留影。左起：尚書府大臣郭宗熙（1878～1934）、財政部大臣愛新覺羅・熙洽、監察院長羅振玉（1866～1940）、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參議府參議袁金鎧、外交部大臣謝介石、司法部大臣馮涵清（1892～？）。大滿洲帝國的勳章依等級分為：蘭花大綬章、龍光勳章、景雲勳章以及柱國勳章，各勳章之下再以等級區分。




有志者事竟成
康德三年九月
謝介石

來自臺灣的風雲人物

1906年，已經從「明治大學」畢業的謝介石結束於「臺灣協會專門學校」的任教工作，接著應聘前往福建的法律講習所擔任總教席，之後也在張勳的引薦下成為「閩浙總督」佟佳・松壽（1849～1911）的法律顧問。時年28歲的謝介石，雖然以日本籍臺灣人的身分前往中國，但是頂著明治大學法科的學歷以及多年的教師經驗，加上精通河洛語、日語與北京官話的語言專長，這段時間雖然過的平淡但仍然可以發揮他的才能。1909年人在福建但關心家鄉事的謝介石，透過報紙文章結識原本大稻埕「永樂座」知名藝旦王香禪（1886～1970？）。色藝雙全的王香禪不僅鼎鼎大名同時也是詩人連橫（1878～1936）的女弟子，1907年曾下嫁臺南仕紳文人羅秀惠（1865～1943），但婚後不合被迫於兩年後離婚，因而在《臺灣日日新報》屢屢投稿詩作以抒發怨情。

本身極富文采的謝介石開始以詩文與王香禪對吟並密切書信往返，不久之後其在福建穩定的工作因為「辛亥革命」一夕變天，賞識謝介石的佟佳・松壽總督也因大清遭到推翻因而自盡殉國。逢此政治巨變下，謝介石索性在1912年返臺，經由王香禪的大稻埕「劍樓書塾」老師趙一山（1856～1927）從中撮合，兩人結為連理並聯袂前往上海發展。此刻的中國動亂不堪，謝介石固定工作未見著落，王香禪甚至拿出多年從事藝旦工作的積蓄，一方面維持日常生活所需，一方面配合中國官場文化為夫君出資買通層層政商關係。不久好消息傳來，張勳再度推薦謝介石前往「吉林法政學堂」擔任教職，同時因為他熟悉日本事務因此身兼「吉林都督」陳昭常（1867～1914）政治顧問，在新任「關東都督」福島安正中將（1852～1919）造訪吉林的歡迎會上他也曾出席作陪。（延伸閱讀：《淡水新政記》）

1914年在時任「直隸都督」朱家寶（1860～1923）的延攬下，謝介石前往擔任涉外事務的「直隸巡按使署」會辦。此時的張勳被袁世凱任命為「定武上將軍」，謝介石眼見中華民國當時的內亂不斷，他深深贊同張勳復辟清帝的主張，在「保皇派」康有為、張勳等人的左右他日漸嶄露頭角。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與大日本帝國諸多外交事務的交涉均涉及法律層面，對袁世凱政府而言，像謝介石一般具有法律背景，同時又熟知北京官話、漢文、日文者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謝介石礙於日本國籍的身分，在中華民國政府任職會遭人非議，於是毅然放棄日本國籍改隸中華民國國籍。逐漸地，謝介石被中華民國當局認為是「日本通」，而日本政府則認為他是一名「中國通」。在大時代的背景下，謝介石遊走於中華民國與日本的外交界，藉由法律與語文長才如魚得水。

影像中左圖為1935年12月5日謝介石返臺期間夜宿舊友陳天來（前左）之子陳清波（後中）位於臺北「三橋町」宅前。（圖：劉宜俊）右圖為謝介石墨寶，其人一生正如其書「有志者事竟成」。



「時代寵兒」謝介石

加入中華民國籍之後的謝介石，從此更加積極襄助張勳進行「清室復辟運動」。1917年謝介石擔任張勳復辟內閣的「外務部右丞」，在「張勳復辟」失敗之後他與家人逃至天津躲避搜捕，繼續遊走於支持滿蒙獨立運動的「保皇派」人士之中。1925年謝介石藉由大儒羅振玉（1866～1940）的介紹得以結識鄭孝胥，兩人在某層意義上都具有「福建」背景人不親土親，而且均擅長詩文相互青睞；加上深受日本法制教育的謝介石篤信「君主立憲」制度，這無異與鄭孝胥的理念不謀而合。同年溥儀因馮玉祥片面撕毀《清室優待條件》避居天津，1927年謝介石在鄭孝胥的引見之下再度得以瞻仰溥儀龍顏。

其實在溥儀尚未被除出紫禁城之前，謝介石就曾隨前清重臣多羅特．升允（1858～1931）進入宮中謁見溥儀，只不過當時的溥儀復國之志尚未成熟，自然後續也不了了之。然而，1927年謝介石與溥儀兩人異地重逢，又有身邊親信鄭孝胥的鼎力推薦，於是在1928年溥儀命其擔任「外務部右丞兼天津行在御前顧問」重要職務，負責籌辦與「東三省」相關的軍務事宜。「滿洲事變」之後，謝介石奉溥儀之命前往宣佈獨立的吉林，轉任「滿洲主義者」吉林省長愛新覺羅．熙洽的「吉林交涉署」署長。這就是在1932年滿洲建國之後，長年耕耘於外交專務領域的謝介石能成為滿洲國「外交總長」的經緯過程。

1932年3月1日滿洲國成立時，離開臺灣整整20年、早已被家鄉父老遺忘的謝介石被新國家任命為「外交總長」。此時，滿洲國建國的相關新聞充斥在臺灣的媒體版面，同時一張張傳回故鄉的新聞照當中謝介石熟悉的身影與姓名也不斷出現在臺灣父老的面前。人們重新回憶起「謝介石」這個名字，而臺灣的媒體標題則稱其為「時代風雲兒」（「時代寵兒」），一時之間真的讓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同時為因應新國家成立，成為滿洲國第一任外交總長的謝介石，藉此將國籍改為「滿洲國籍」。

影像中為1934年元日，滿洲國「執政」溥儀（前排中央）與該國主要官員合影。由照片中可知政府體系中滿人、蒙古、漢人組成的「滿洲籍」官員佔絕大多數；同時謝介石位於緊鄰鄭孝胥旁的重要位置。前排左起：吉林地區警備司令官吳元敏、奉天地區警備司令官于芷山、黑龍江省省長韓雲階、參議府參議諾棍岱．貴福、國務院祕書官鄭禹（二排）、參議府參議博爾津．增韞（蓄白鬍者）、興安總署總長齊默特色木丕勒（二排）、實業部總長張燕卿（四排黑短鬚者）、新京國都建設局長阮振鐸（三排）、外交部總長謝介石、民政部總長兼奉天省長臧式毅（二排）、國務總理鄭孝胥、參議府議長張景惠（二排）、司法部總長馮涵清（三排戴眼鏡者）、滿洲國執政溥儀、立法院院長趙欣伯（二排）、民政部警務司長長尾吉五郎（三排著警察服者）、侍從武官處武官長張海鵬（二排著軍服者）、參議府參議筑紫熊七、執政府內務處長寶熙（二排白鬍者）、總務廳長官遠藤柳作（三排黑短鬚者）、參議府參議田邊治通、執政府祕書長胡嗣瑗（著長衫馬褂者）、執政府祕書兼內務官商衍瀛（二排）、執政府警衛處長佟濟煦（著警察服者）、執政府大禮官許寶蘅、執政府最高法院院長林棨（二排光頂者）、參議府參議袁金鎧（著長衫馬褂者）、文教部次長許汝棻（二排白鬍者）。



在國際法中，「公使」是國家的代表，而「大使」則是代表國家元首，因此到任時需有呈遞「到任國書」之禮，在外交上大使的位階與代表性要高於公使。影像中即為謝介石抵達東京就任時留影，右起駐日大使館參事官川崎寅雄、駐日大使館一等祕書官葉堯公、謝介石、駐日大使館一等祕書官田中正一。背後的禮儀馬車是在各國大使行「呈遞就任國書之儀」的正式禮節座車，車廂上有代表日本皇室的「十六瓣菊」徽章。直至今日，日本仍使用這種源自於大英帝國的傳統外交禮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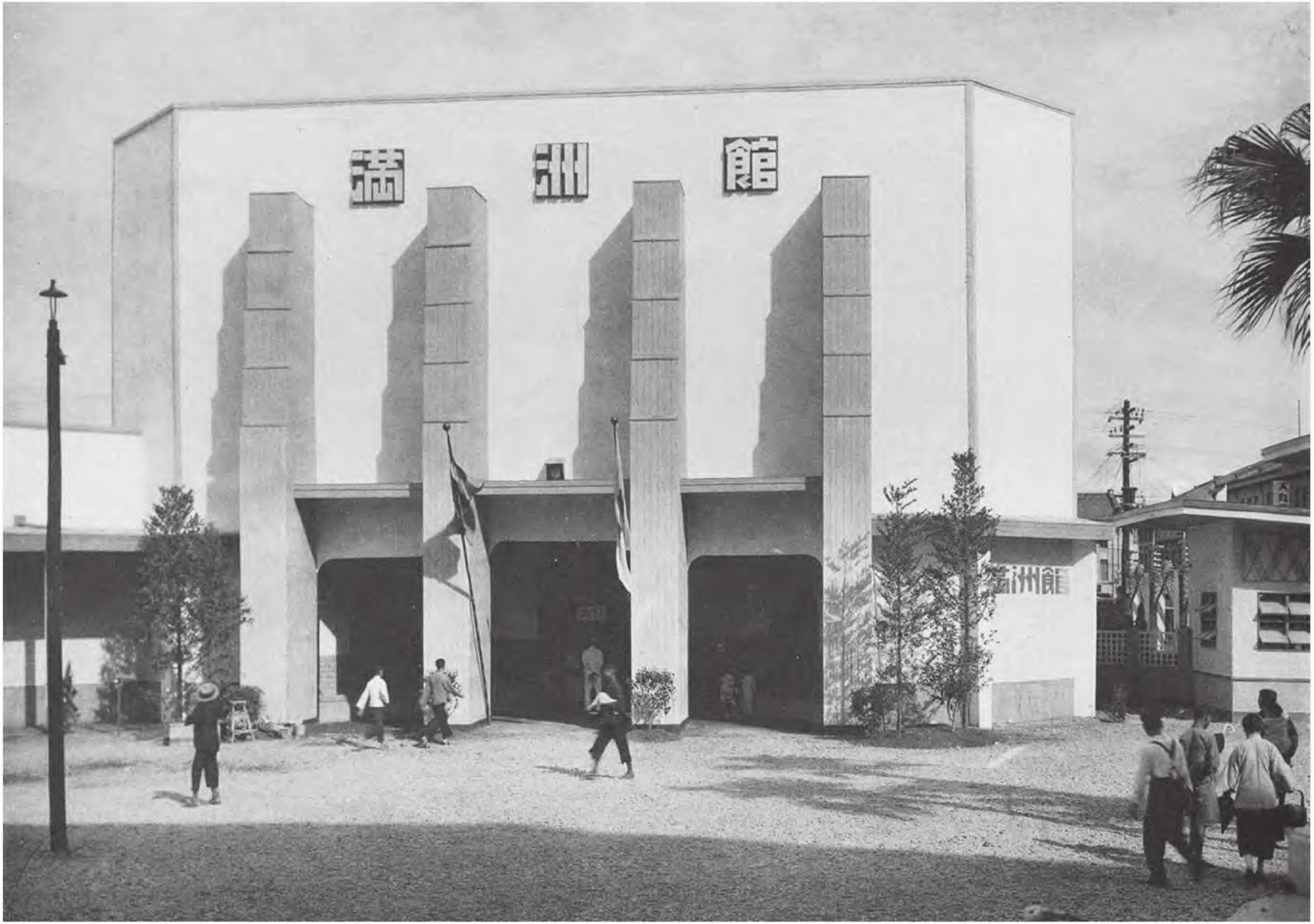
活躍於外交上的謝介石

謝介石雖然在1935年3月1日加入「滿洲國籍」，但嚴格說來直到終戰為止大滿洲帝國並未頒佈《國籍法》，只有在1940年為了徵兵所需頒佈過《暫行民籍法》。簡單說來，這是一種在「戶籍」上「被視為滿洲人民」的行政措施，並不代表有明確的國籍登記。而針對不包括日本國籍、中華民國籍的「外國人」，則在1941年頒佈《外國人入國取締規則》，作為出入境滿洲國的法源依據。滿洲在建國14年時間中未曾頒佈《國籍法》的主要原因有三：日本實施「單一國籍」，如果滿洲國頒佈《國籍法》，移民滿洲的日本國民就面臨必須放棄日本國籍的窘境，恐將影響前往滿洲開拓的意願；同上，臺灣、朝鮮的「內地人」、「本島人」、「半島人」也會面臨國籍選擇的問題；1918年「俄國大革命」之後流亡滿洲的「白俄人」如果因為滿洲國《國籍法》的頒佈，將會出現「國籍歸化」的問題，徒增日蘇兩國的外交困擾。總之，這種無國籍的狀況在戰後，造成無法界定「滿洲國國民」的嚴重後果。

謝介石在擔任滿洲國「外交總長」前後，為促使大日本帝國盡早承認滿洲國，曾多次前往日本奔走，最終促成兩國在1932年9月15日簽訂《日滿議定書》。在議定書當中日本也釋出善意，主動放棄一些原本在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從俄國手中承接的利益。這個結果的背後，檯面上的功臣當然是謝介石，而檯面下積極運用與關東軍、日本政壇關係的人物則是留待後述的臺灣人許丙。

此外，謝介石在「外交總長」任內，安排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與財政部大臣愛新覺羅・熙洽於1934年3月26日前往日本遞交大滿洲帝國國書，也順利安排昭和天皇皇弟「秩父宮」雍仁親王於同年6月5日以天皇代表身分訪問滿洲國。此外，也斡旋溥儀皇帝於1935年前往日本進行官式訪問，當時溥儀所到之處備受禮遇，為大滿洲帝國外交史上一大創舉。不論在滿洲國內溥儀與其政府受到多少「關東軍」的掣肘，但是當時在日本政府與人民都是以「重要盟邦的外國君主來訪」態度，對待滿洲國的皇帝與官員。

對滿洲國而言，日本原本就是最重要的盟邦，不僅是在政治與國防上而已，更重要的是需要大日本帝國的資金援助用來建設這個新興國家。1935年5月23日，原滿洲國駐日本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基於日滿兩國關係的重要性，謝介石卸下「外交總長」職位，6月19日由溥儀親自任命其為「大滿洲帝國駐大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並於28日攜家眷與屬下、僕從抵達東京就任。（如左頁影像）


滿洲館
滿洲館

謝介石衣錦榮歸故里

由於謝介石特殊的多變國籍出身背景，其身分可由對象各自解讀，而在日本人眼中對這位曾擁有日本國籍的全權大使自然是感覺格外親切。在滿洲國人眼中，謝介石則是長期投入復興皇室運動的「保皇派」，雖然一度加入中華民國籍但也是出自無奈，無人懷疑過他的忠君思想與支持滿洲皇室的態度。然而，離開臺灣勇闖中國已屆二十餘載的謝介石，在他自己的心中依然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臺灣人。這也是當時周遊於日本、臺灣、滿洲國、中國之間的臺灣本島人心態寫照。

1935年，「臺灣總督府」治臺已屆40年，在10月份擴大舉辦「始政四十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在該盛況空前的博覽會中設有「滿洲館」（如圖），展出滿洲文物與各項物產。而從1932年起就經常於報紙見諸大名、照片的謝介石，為代表溥儀皇帝主持「臺灣博覽會滿洲館」的揭幕式，在9月27日搭乘「大和丸」郵輪抵達基隆衣錦還鄉。與謝介石同行的有夫人王香禪、公子、千金諸多家眷，還有駐日大使館官員、僕從等共計20人。在此之前臺灣媒體早已發佈此一訊息，在郵輪離開橫濱港之後更是連日追蹤報導，在南方的臺灣同鄉引領期盼相關新聞，成為茶於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

臺灣總督府對於這位「大滿洲帝國駐大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更是不敢怠慢，郵輪靠港之際進入「大和丸」船艙恭迎的就有總督府外事課長坂本龍起、水產課長劉明朝、通譯官越村長次、祕書係長羽鳥又男、臺北州警務部長石川定俊、基隆市尹桑原政夫、基隆稅關長川副龍雄以及「基隆要塞」參謀。而在基隆碼頭迎接的則有來自新竹的新竹州會議員桑原佐一郎、鄭神寶、鄭肇基、李濟臣、太田重助等同鄉；來自臺北的臺北市協議員安田勝次郎、郭廷俊、竹藤峰治、陳清波、辜斌甫、黃淵源與魏清德；從臺中遠道而來者包括林階堂與蔡惠如的遺孀，外加基隆各界上千民眾夾道在車站前爭睹謝介石風采。

謝介石一行搭乘掛著滿洲國與日本國旗的專行列車於10時45分抵臺北驛，立刻受到臺灣軍司令官寺內壽一、臺北帝大總長幣原坦、總督府各局局長、臺北市尹松岡一衛等官方代表，與臺灣電力社長松木幹一郎、臺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 徹、總督府評議會員三好德三郎、土地開發實業家木村泰治等民間人士，以及舊識好友陳天來、蔡彬淮、黃金生等人在月臺盛大歡迎，場面浩大達到數千民眾。在「鐵道旅館」略事梳洗後，一行直接往「臺灣神社」進行參拜儀式。11時45分驅車前往總督府拜會中川健藏總督與平塚廣義總務長官，各局長部長率員迎接，隨後至寺內壽一司令官私宅拜會。12時30分一行返抵「鐵道旅館」休息並準備當晚的返臺重頭戲。



〈敬告臺灣父老兄弟〉

1935年9月27日晚間6時，透過「臺北放送局JFAK」（如圖）的廣播電波，謝介石以臺灣語（河洛語）發表〈敬告臺灣父老兄弟〉直播演說，而其畢業於明治大學、擔任滿洲國外交部祕書官的公子謝喆甡則在旁以國語（日本語）翻譯放送。謝介石的這段廣播演說內容，震驚了當時500萬本島人同胞：

「我是駐劄日本帝國滿洲帝國特命全權大使謝介石。我本來是新竹州的人，生在新竹。二十四、五歲時往日本東京留學，卒業後，就去中國。與臺灣離別，現在有三十八年。余此次歸來臺灣，得此機會，對父老兄弟講話，這是我一生第一歡喜、第一光榮，並且是感謝不盡的事。我此次歸來臺灣，有幾項事件。第一是要向總督府道謝，並且向父老兄弟道謝。因為我生長在新竹，在灣之時，亦曾在學校學業、亦曾在官廳奉職、亦曾在地方上辦公事。受臺灣政府的恩惠，及父老兄弟的顧愛是說不盡的，今日有此地位，全是臺灣政府栽培我的。對此以前的恩情。是應該來道謝的。第二乘此機會。要修理祖先的墳墓。第三是為兒子定婚。因為我去臺灣三十八年，余現在做滿洲國的大臣，自然而然與臺灣的關係，愈去愈遠。所以我欲我的兒子與臺灣的婦人結婚。有此關係，就可以永久免與臺灣斷路，這亦是我不敢忘本的意思。

尚有一項甚有趣味的事，講與諸位聽聽：二十四年前大清國鼎革的時，我回來臺灣新竹一次。彼時我看革命黨所做的事情，全然不合東洋的道德，一定是不能維持東洋的平和。所以我要再去，誠心誠意去新竹城隍廟，對城隍神禱告，說我要扶宣統皇帝重興清朝，不知天命如何，求一籤詩看看。新竹城隍實在是真靈感，籤詩內二句是：『莫嘆年來不如意，喜逢新運稱心田。』此二句是講若逢著『新運』二字我就可滿足，在當時亦泛泛置之；及至三年前宣統皇帝來滿洲建國之時，將國都定名為新京，而宣統皇帝的皇宮是在興運路，皇帝的宮門亦號做『興運門』，而我也做第一代外交總長。在二十餘年前城隍神的籤詩，就將宣統皇帝來新京興運路建都做皇帝的事，就說的明明白白，城隍神實在是真靈應。亦可見宣統皇帝來滿洲做皇帝，本來是天命有定的。我有一日，將此等的事情奏明皇帝，皇帝有聖旨云：城隍神真有靈感。應該賜『正直聰明』的匾額，命我來臺灣之時，到城隍廟挂匾答謝神明。這也是回來臺灣一項的事。

現在我要請父老兄弟，原諒我一件事。因為我出生在臺灣、長成在臺灣，及至能做事業的時候，就一直去中國及滿洲。自己是臺灣人，對臺灣的事情全然放棄，不在臺灣盡絲毫的義務，實在是對不起。不過我向來所做的事情，都是與我日本國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要求東洋的和平，一定須將中國及滿洲的事情辦好，與日本聯絡一氣，纔不受外國的欺侮。所以我在中國的時候，所做的是日支親善的事情；現在在滿洲國做官，所做的也是日滿親善的事情。這樣看來，我雖然無在臺灣辦事，亦親像在臺灣辦事一樣。而況且滿洲國與日本國，是有日、滿不可分的關係。滿洲國的皇帝登極詔書『所有建國之遠圖，經邦之長策，當與日本帝國協力同心，以奠永固』。所以我想現在國際的情形，與其我在臺灣做事，不如在滿洲國做事，在東洋和平上的貢献，更是較有意味。這一層是要請父老兄弟諸位原諒的。」（圖：廖明睿）

敬告臺灣父老兄弟

廿七夜謝大使放送原文

(上)

我是駐劄日本帝國滿洲帝國特命全權大使謝介石。我本來是新竹州的人。生在新竹。二十四五歲時往日本東京留學。卒業後。就去中國。與臺灣離別。現在有三十八年。餘此次歸來臺灣。得此機會。對父老兄弟講話。這是我一生第一歡喜第一光榮。並且是感謝不盡的事。

我此次歸來臺灣。有幾項事件。第一是要向總督府道謝。並且向父老兄弟道謝。因爲我生長在新竹。在臺灣之時。亦曾在學校學業。亦曾在官廳奉職。亦曾在地方上辦公事。受臺灣政府的恩惠。及父老兄弟的顧愛。是說不盡的今日有此地位。全是臺灣政府栽培我的。對此以前的恩情。是應該來消謝的第二乘此機會。要修理祖先的墳墓。第三是爲兒子定婚。因爲我去臺灣三十八年。餘現在做滿洲國的大臣。自然而然與臺灣的關係。愈去愈遠。所以我欲我的兒子與臺灣的婦人結婚。有此關係。就可以永久免與臺灣斷路。這亦是我不敢忘本的意思。

尙有一項甚有趣味的事。講與諸位聽聽。二十四年前大清國鼎革的時。我回來臺灣新竹一次。彼時我看革命黨所做的事情。全然不合東洋的道德。一定是不能維持東洋的平和。所以我要再去。誠心誠意去新竹城隍廟。對城隍神禱告。說我要扶宣統皇帝重興清朝。不知天命如何求一籤詩看々。新竹城隍實在是眞靈感。籤詩內二句。是「莫嘆年來不如意。喜逢新運稱心田」。此二句是講若逢著新運二字我就可滿足。在當時亦泛々置之。及至三年前宣統皇帝來滿洲建國之時。將國都定名爲新京。而宣統皇帝的皇宮是在興運路。皇帝的宮門亦號做興運門而我也做第一代外交總長在二十餘年前城隍神的籤詩。就將宣統皇帝來新京興運路。建都做皇帝的事。就說的明々白々。城隍神實在是眞靈應。亦可見宣統皇帝來滿洲做皇帝本來是天命有定的。我有一日將此等的事情。奏明皇帝。皇帝有聖旨云。城隍神眞有靈感。應該賜「正直聰明」的匾額。命我來臺灣之時。到城隍廟拄匾答謝神明。這也是回來臺灣一項的事。(未完)

敬告臺灣父老兄弟

廿七夜謝大使放送原文

(下)

現在我要請父老兄弟。原諒我一件事。因爲我出生在臺灣。長成在臺灣。及至能做事業的時候。就一直在中國及滿洲。自已是臺灣人。對臺灣的事情。全然放棄。不在臺灣盡絲毫的義務。實在是對不起不過我向來所做的事情。都是與我日本國有密切的關係。因爲要求東洋的和平。一定須將中國及滿洲的事情辦好。與日本聯絡一氣。絕不受外國的欺侮所以我在中國的時候。所做的是日支親善的事情。現在在滿洲國做官。所做的也是日滿親善的事情。這樣看來。我雖然無在臺灣辦事。亦親像在臺灣辦事一樣。而況且滿洲國與日本國。是有日滿不可分的關係。滿洲國的皇帝登極詔書「所有建國之遠圖。經邦之長策。當與日本帝國協力同心。以奠永固」所以我想現在國際的情形。與其我在臺灣做事。不如在滿洲國做事。在東洋和平上的貢獻。更是較有意味。這一層是要請父老兄弟諸位原諒的。

借這個機會。尙有一句話要對父老兄弟言之。我在中國及滿洲多年的經驗。每々見我們臺灣人。一到中國或是滿洲。就不講伊是臺灣人。甚至亦有改變自已的名字。這是甚麼道理。我實在不懂。揣伊等的心事。大概以爲臺灣是歸了日本國。臺灣人算是亡國奴。這等話。在中國不懂道理的人。亦往々有罵臺灣人的。其實大謬不然。我們臺灣人絕對不是亡國奴。臺灣版圖。所以歸日本帝國。是因爲馬關條約。大清國將臺灣讓與日本。我們臺灣人做日本國的臣民。是奉大清國皇帝的聖旨。對日本國。當然要忠實的。因此一換。我們臺灣人。反轉得了十分的幸福。變做世界一等國民。試思領臺至今四十年。臺灣當局苦心經營。增進臺灣人的幸福。開發臺灣的產業。保持臺灣的治安。啓發臺灣的文明智識。再看中國彼邊。二十餘年的革命。年年打戰。民不聊生。土匪白日橫行。對人民收租稅有預徵至五十年以後的稅金。這樣人民。是何等艱苦。假如臺灣不歸日本。今日臺灣。不知何景象。現在我臺灣人文明智識的程度。比中國無論那一處。都是有較高的。做一等國國民。到處是受人歡迎的所以我們臺灣人須明白自已高貴的地位。高等的人格。更進一層。要使世界的人。認識我們臺灣人的地位。這是極要緊的。我離臺灣三十餘年。未嘗一次說我不是臺灣人。就是現在我做外交總長。外交部大臣。參議府參議。特命全權大使。此等顯官。我仍然說我是臺灣人。我對我國皇帝。我亦是說我本來是臺灣人。所以我此次特意回來臺灣。要向臺灣政府。及父老子弟道謝。謹在此機會。對臺灣政府及父老子弟。表示最高的敬意。並祝諸位的健康。(完)



〈敬告臺灣父老兄弟〉（續）

「借這個機會，尚有一句話要對父老兄弟言之。我在中國及滿洲多年的經驗，每每見我們臺灣人，一到中國或是滿洲就不講伊是臺灣人，甚至亦有改變自己的名字。這是甚麼道理？我實在不懂。揣伊等的心事，大概以為臺灣是歸了日本國，臺灣人算是亡國奴。這等話，在中國不懂道理的人，亦往往人有罵臺灣人的，其實大謬不然。我們臺灣人絕對不是亡國奴！臺灣版圖所以歸日本帝國，是因為《馬關條約》。大清國將臺灣讓與日本，我們臺灣人做日本國的臣民，是奉大清國皇帝的聖旨。對日本國，當然要忠實的。

因此一換，我們臺灣人，反轉得了十分的幸福，變做世界一等國民。試思領臺至今四十年，臺灣當局苦心經營，增進臺灣人的幸福、開發臺灣的產業、保持臺灣的治安、啟發臺灣的文明智識。再看中國彼邊，二十餘年的革命，年年打戰、民不聊生、土匪白日橫行。對人民收租稅有預徵至五十年以後的稅金，這樣人民，是何等艱苦？假如臺灣不歸日本，今日臺灣，不知何景象？現在我臺灣人文明智識的程度，比中國無論那一處。都是有較高的。做一等國國民，到處是受人歡迎的，所以我們臺灣人須明白自己高貴的地位、高等的人格。

更進一層，要使世界的人，認識我們臺灣人的地位，這是極要緊的。我離臺灣三十餘年，未嘗一次說我不是臺灣人。就是現在我做外交總長、外交部大臣、參議府參議、特命全權大使此等顯官，我仍然說我是臺灣人！我對我國皇帝，我亦是說我本來是臺灣人！所以我此次特意回來臺灣，要向臺灣政府，及父老子弟道謝。謹在此機會，對臺灣政府及父老子弟表示最高的敬意，並祝諸位的健康。」

謝介石不亢不卑的演說，傳入臺灣本島人的耳中，尤其是數度「我是臺灣人」的凜然態度，深深打動聽眾的心。因為他自身經歷的現身說法，一段短短十五分鐘臺灣語的直播演說，比起「臺灣文化協會」左傾分子花了十餘年時間紙上談兵的書空咄咄，更能激起「臺灣民族自覺」的雄心。綜觀謝介石的演說不外乎感謝臺灣這塊土地，與總督府的現代化治理，讓臺灣能免于身陷猶如當時中國一般的烽火遍野；同時更重要的是勉勵臺灣子弟要以身為臺灣人為榮，善用臺灣人語言、人脈上的優勢，奮發圖強成為文明、人格上一等一的民族。即使如同謝介石般毫無家世背景的臺灣人，只要「有志者事竟成」，終有一日也能在東亞、世界舞台發光發熱。這樣的演說內容被當時的「文協左派」、日後黨國御用學者刻意曲解成「我官做到這樣大」，然後再被後世學者不斷加以引用，真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謝介石在臺灣的相關活動

謝介石在臺灣停留的81天當中，幾乎行程滿滿。在臺北停留的五天期間拜會了「臺北州廳」、「臺北市役所」、「臺灣電力」、「臺灣日日新報」、「臺北帝大」、「專賣局」、「中央研究所」，到「臺北第三高女」參訪時還參觀了女學生們所表演的《滿洲國國歌》及「日滿親善舞蹈」；此外謝介石還前往舊友辜顯榮、陳天來位於大稻埕的宅邸拜訪。至於每晚的宴席除了臺灣軍司令官、臺北州知事分別款待之外；在9月30日臺灣總督府於「鐵道飯店」舉行盛大的歡迎會，平塚廣義總務長官親自主持，臺北市內官民代表出席者300餘人，顏欽賢、范寶勳、黃純青、黃淵源等人也從外縣市趕來參加。

10月2日謝介石一行由臺北出發榮歸新竹。在新竹驛，新竹州知事增田秀吉以下州市幹部、在鄉軍人會役員、消防組長、保甲聯合會長、各級議會協議會員、愛國婦人會員，以及謝大使居住於新竹的令妹謝笑與親友、地方人士擠滿月臺；而車站外則是民眾萬頭攢動夾道歡迎。謝介石在返臺之前，已請託蔡惠如遺孀前往新竹豪門鄭肇基家中提親並議妥兒女婚事，因此謝介石夫人王香禪當晚即親往鄭宅，與其千金鄭蓁蓁進行婆媳首度會晤。

為了參加「臺灣博覽會」10月10日的開幕式，謝介石一行於10月9日再度回臺北，當晚夜宿於好友陳清波「三橋町」自宅。10日先參加位於「臺北公會堂」的博覽會開幕典禮後，轉赴位於公會堂旁的「滿洲館」進行揭幕典禮，並代表溥儀皇帝宣讀祝詞；當日現場總督府、臺北州官員、民間要人冠蓋雲集齊聲到場祝賀。謝介石除了代表皇帝與滿洲國政府致謝答禮之外，並呼籲臺灣各界前往滿洲旅行、就學、投資，成為滿洲國這個新興國家的最佳品牌代言人。最後眾人在總督府水產課長劉明朝引導之下，巡覽「滿洲館」內部（如圖）與「臺灣博覽會」整個會場。

10月21日正午吉時，由新竹名仕李濟臣（1875～1936）擔任「仲人」（介紹人）正式赴鄭肇基家下聘禮，共計72件大禮、16,000餘圓（超過今日2,000萬元）。謝介石長男謝喆甡與鄭肇基千金鄭蓁蓁的婚禮，則在11月14日於新竹「淨業院」隆重舉行，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夫婦、臺灣軍司令官代理荻洲 立兵參謀長、專賣局長田端幸三郎、交通局遞信部長藤田・治郎、新竹州知事增田秀吉、臺北市尹松岡一衛夫婦、外事課長坂本龍起、臺灣銀行頭取保田 次夫婦，以及全島其他知名人士參與婚宴共計嘉賓500人。此外從當天起，連續開辦三天的流水席宴客，夜晚並有「上海鳳儀京班」演出京劇助興。謝介石返臺的第二項任務就此順利達成。



「正直聰明」與新竹城隍廟

10月23日，謝介石返臺的第三項、同時也是代表大滿洲帝國皇帝行使的重要任務在早上10時展開。如前所述，謝介石在1912年回臺要再度往中國發展前，躊躇之餘曾往新竹城隍廟求神問籤。結果求得上吉「**君今百事且隨緣，水到渠成聽自然。莫嘆年來不如意，喜逢新運稱心田。**」日後將此事稟報溥儀皇帝，獲得下賜「正直聰明」匾額。謝介石先於10月3日前往新竹城隍廟（如圖）與廟方會勘、商定掛匾位置，之後再於23日正式進行揭匾儀式。該儀式由謝介石代表滿洲國皇帝主祭，新竹州知事增田秀吉、警務部長高原逸人以及新竹州下官民重要代表五十餘名列席。溥儀的墨寶於今日新竹城隍廟內雖尚可得見，但原匾額已經在戰後佚失不知去向，僅留下後世藉由拓印所留下的復刻品。

1935年10月10日開幕的「臺灣博覽會」展出期間長達50日，因為謝介石特命全權大使親身在臺，因此特別將10月27日訂為「滿洲日」，由謝介石擔任大會主持人。在當天上午總督府先與謝大使與在臺灣的滿洲相關人士舉行「日滿交驩會」，由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帶領殖產局長、警務局長、內務局長，與「臺灣守備隊」司令官福田袈裟雄、「臺灣軍」參謀長、憲兵隊長以及臺北帝大校長與民間要人與會。如同其他的重要公開場合，謝介石不厭其煩的對在場媒體記者呼籲臺灣人應前往滿洲從商、從政、就學，滿洲國竭誠歡迎擁有各項專長的臺灣本島人前去一同建設新國家，同時表示會竭力協助、安置有志於此的臺灣父老子弟。

謝介石在臺的足跡除了頻繁往來臺北、新竹之間外，11月23日開始南下參訪臺南州、高雄州行程，最遠抵達位於屏東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以及鵝鑾鼻。11月30日回程時在「臺中公會堂」接受臺中州知事日下辰太、臺中市尹藤田淳教、林烈堂、林獻堂、林階堂、陳炘、蔡蓮舫、楊肇嘉等120餘名官方、地方代表的熱烈歡迎晚宴。12月1日，謝介石一行應霧峰林家之邀前往參訪，當晚並夜宿於霧峰。林烈堂、林獻堂、林階堂作東邀集霧峰林家「頂厝」、「下厝」代表30餘人在霧峰宅邸設宴；酒過三巡之後臺中州知事日下辰太於料亭「富貴亭」舉行「二次會」，謝介石、安藤元節通譯、林獻堂、林階堂、蔡蓮舫等人前往與會把酒言歡、欣賞藝伎歌舞，至當晚十一時方散會返回霧峰林家。

由上述記載亦可得知，當時的「臺灣文化協會正統派」、「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主要人物亦竭誠歡迎謝介石的到來，除一同家宴款待之外，欲罷不能還共赴「二次會」續攤，絕非後世黨國學者、近代儒士所言「林獻堂與謝介石因議會設置理念不合而心生嫌隙」。況且，總督府已於該年4月公布11月地方選舉相關法令，與謝介石返臺時間前後錯置，應妥善考證為宜。（圖：廖明睿）



「來去滿洲！」

12月9日下午6時，臺灣總督中川健藏趕在謝介石展開最後幾天私人行程之前，於在總督官邸（如圖）設正式「總督府官宴」為其送行。東道主為中川總督、總督府祕書課長枡山保一、文書課長代理山本真平；在場作陪的官方人士包括內務局長小濱淨鑛、文教局長深川繁治、警務局長石垣倉治、財務局長嶺田丘造、專賣局長田端幸三郎、交通局遞信部長藤田倶治郎、臺北州知事野口敏治、臺北市市尹松岡一衛與「臺灣守備隊」司令官福田袈裟雄中將、「臺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少將；民間的陪賓有臺灣銀行頭取保田次郎、河村徹、三好德三郎、辜顯榮、郭廷俊、陳天等多人以及駐臺灣的各國領事館代表。謝介石一行在12月16日由新竹驛出發直赴基隆，16時30分搭乘「蓬萊丸」離開臺灣返回滿洲國，在碼頭送行者包括總督府祕書官枡山保一、臺北州知事野口敏治、基隆市尹桑原政夫以及友人小松吉久、陳天來、鄭肇基、李濟臣等多人。

在謝介石返臺81天中，類似前文的行程、拜會、接見報導充斥各大媒體版面，連左派的媒體《臺灣民報》也是連日刊載。同時與謝介石往來、餐宴的臺灣官員、軍方、民間人士姓名也一一羅列，在這三個月當中對臺灣本島人造成極大的震撼。不僅如此，在臺灣各地送迎謝介石一行的過程，包括車站周邊的官方儀式、軍警禮賓車隊、平日望之儼然的高官均以恭謹態度應對，連總督本身都需對謝介石行禮致意。甚至在11月24日「臺南步兵第二聯隊」的「軍旗祭」典禮中，還受到官兵們的分列式軍禮致敬，這對臺灣本島人而言是一種前所未有特殊經驗。至今在臺南的「南鯤鯓代天府」，還高懸署名「滿洲帝國特命全權大使勳一位謝介石」的「靈光赫濯」匾額，近來被重新安置懸掛於殿內。

雖然以保留臺灣語言、文化為出發點的各地「詩社」，在1920年代之後轉為「臺灣文化協會」這樣的民間社團積極倡導臺灣民族的特殊性，但是畢竟百聞不如一見。在謝介石的返臺旋風中，民眾親眼目睹「臺灣人能成為滿洲皇帝的代表」、「臺灣人能成為總督的座上賓」；再加上親身耳聞謝介石那篇傳頌一時的〈敬告臺灣父老兄弟〉廣播稿，其中「**所以我們臺灣人須明白自己高貴的地位、高等的人格**」的懇切叮嚀，毫無疑問不斷激盪當時的臺灣本島人。尤其是在30歲以下的年輕世代心目中，謝介石的功成名就不僅令人艷羨，同時更是超乎想像。於是，在「有為者亦若是」的目標心態下，臺灣知識分子形成一股「滿洲熱」。對臺灣本島人而言，原本只是地理名詞的「滿洲」，如今成為真實的圖像，同時更是充滿想像，因此「**來去滿洲！**」成為當時本島人社會菁英之間的一句流行語。



謝介石與陳天來父子

在謝介石訪臺行程中不時可見「陳天來」（1872～1939）大名出現在報章雜誌報導中。從謝氏抵臺第一天，陳天來三子陳清波（1905～1944）就在基隆相迎；到謝介石離臺當天陳天來親赴基隆歡送，都可以見到陳氏家族身影。甚至謝介石一行人還於10月9日、12月5日兩度夜宿在陳清波家中，足見陳、謝兩家相交甚篤。

當時擔任「臺北茶商公會」會長、「臺北州協議會」會員的陳天來，政經地位舉足輕重，可說是臺北本島人中的代表性人物。陳天來在臺灣發跡時間甚早，因其父早年與李春生（1838～1924）曾共同任職於廈門「怡記洋行」，當李春生開始在大稻埕地區從事茶葉銷售時，陳天來便隨其父親渡海來臺灣從事焙茶所需的木炭銷售。眼見大稻埕地區茶葉的蓬勃發展，陳天來回到故鄉福建南安習得茶樹栽培、製茶技術，1891年返回臺灣後開設「錦記茶行」轉而從事茶葉相關事業。1900年前後包種茶成為世界潮流，陳天來順勢而為將茶葉銷往南洋諸國大受歡迎，緊接著在華南地區、日本內地也設有經銷據點，就此成為臺灣茶葉鉅子。由於茶葉輸出各國的貿易往來，不免涉及金融匯兌，因此陳天來也涉足外匯事業，先後成立「永成公司」、「永盛公司」並在華東、華南設立支店；而陳清波也在1918年籌組具現代銀行功能的「臺北勸業信用組合」（今「華泰銀行」前身）。到了1930年代，前一代「臺灣茶王」李春生早已仙逝多年、辜顯榮年事已高、「臺灣首富」林熊徵則長期寓居日本內地，因此陳天來儼然成為臺北本島人中最具活動力、影響力的政商意見領袖。

陳天來對臺灣產業界最大的貢獻是運用他在工商業界的實力，促使臺灣總督府廢除實施34年之久但已經不合時宜的《製茶稅則》法令，如此一來讓臺灣的茶葉更具競爭力能放手逐鹿於世界舞台。由此再度應證，真正政通人和的「有力者」、「實力者」才能改變政府的施政方向，此絕非舉無輕重的一般憤青或是嚮往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協左派」人士所能企及。

陳天來的人脈關係遍及日本內地、南洋諸國僑領、中國政界高官，因此在謝介石返臺之前早已相互往來。在滿洲建國不久的1932年5月，陳天來三子陳清波就以「臺北工商協會」會長的身分率團前往滿洲視察，足跡遍及哈爾濱、吉林、新京、安東、營口與大連，返臺後並於報章發表數篇心得評述滿洲未來發展的潛力。1937年10月陳天來以「臺北茶商公會」會長身分親自率團前往新京舉行「臺灣茶展示會」，為優質臺灣各式茗品開拓新市場。對謝介石而言，滿洲新興國家的對外貿易、建設基金籌措，都亟待臺灣鄉親成全，因此與當時臺灣工商鉅子陳天來交好實在意料之內。甚至在謝介石訪臺期間還傳出滿洲國在臺灣將設置總領事館，而呼聲最高的首任領事人選即為陳天來。

影像中為1935年12月5日於陳清波「三橋町」宅中合影。後排左起：陳天來四子陳清汾、滿洲國駐日大使館一等祕書官葉堯公、滿洲國駐日全權大使謝介石、謝介石長子謝喆甡、滿洲國駐日大使館主事杜嘯塵、謝介石次子謝津生；前排左起：謝介石女公子謝秋生、陳天來夫人林金英、謝介石夫人王香禪、陳天來長女陳寶珠、陳天來次女陳寶釵。（圖：劉宜俊）



固園黃天橫收藏

許丙與《日滿議定書》的背後

1932年8月8日，原先積極奔走希望日本帝國政府追認滿洲國建國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 繁（1876～1945，最終階級大將）卸任，繼任者為武藤信義大將（1868～1933，最終階級元帥）。溥儀執政身邊的近臣眼見可以主導滿洲國發展的「關東軍」司令官即將易人，希望能在日本正式承認滿洲國、武藤新司令官走馬上任之前展開遊說，企圖為滿洲國的自主性謀求更好的條件。於是溥儀在「執政府」祕書長胡嗣瑗（1869～1949）的建議下派出祕書課長蔡法平與律師林廷琛前往東京尋求管道遊說。

蔡法平本是板橋林家姻親，1907年在溥儀恩師陳寶琛的促成下，成為「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家長，總管臺灣首富林熊徵（1888～1946）的名下財產，在輩份上是林熊徵的表叔與林本源家族關係長遠。卸下臺灣職務後的蔡法平返回福建，成為林熊徵在福建資產的管理人，1932年在福州同鄉鄭孝胥的介紹下進入滿洲國「執政府」擔任要職。而蔡法平離開臺灣後，許丙也曾擔任「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家長，兩人長期保持頻繁的書信往來，同時在林熊徵與許丙籌建「華南銀行」的募資過程中也曾獲得蔡法平的諸多協助。

蔡法平等人奉溥儀之命兼程前來東京拜訪的對象就是許丙。許丙在進入「林本源第一房」任職後，由於工作上表現傑出、外交手腕靈活，不僅獲得林熊徵的高度信任，同時在1910年代後期已經成為林熊徵對外的代表人，與臺灣總督府高層、臺灣財界重要人士、「臺灣軍」高階將領關係深厚，而這些人脈也急速延伸至日本內地的政商界與軍界。因此，蔡法平希望藉由許丙在日本的政商管道，能夠求見到日本軍方高層進而轉達溥儀「執政」的意向。而事前已經藉由書信知曉蔡法平來意的許丙，早已安排好拜會先後擔任過「臺灣軍」司令官的菱刈 隆大將（時任軍事參議官）、渡邊錠太郎大將（時任陸軍航空本部長兼軍事參議官）、真崎甚三郎中將（時任參謀本部次長），以及當時的教育總監部本部長香椎浩平中將，並由他引見關鍵人物武藤信義大將。

在許丙的積極運作下，日本軍方高層包括即將上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武藤信義在內，均同意溥儀提出的五個條件：

一、執政府依組織法行使職權。

二、改組國務院，由執政另提任命名單。

三、改組各部官制，主權歸各部總長，取消總務廳長官制度。

四、練新兵，擴編軍隊。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議會，定國體。

影像中為1932年8月6日，蔡法平（右四）、夫人（右三）與長女蔡啟怡（右一）、女婿楊蘭洲（左一）由滿洲新京搭乘「福克F.VII」客機抵達東京羽田機場一景。前往接機者以林熊徵（中）為首，隨行人員有林熊光夫人石原文子（右二）、許丙（左三）、林熊徵員工盧秋鵬（左二）與吳國治（左四）。其中許丙也是楊蘭洲與蔡啟怡聯姻的介紹人。（圖：黃天橫先生收藏）



「大滿洲帝國宮內府顧問」

許丙不僅協助蔡法平說服日本軍部高層，同時還暗中動用與日本皇室、官方、內閣的種種關係，讓近衛文麿（公爵，1891～1945）以下的文職官僚能夠同情溥儀與滿洲國的立場，成為壓制一意孤行的「關東軍」的隱形力量。也因此，許丙遭到當時「關東軍」青壯派佐級參謀軍官的不滿，認為他阻礙了「關東軍」的脫韁野馬行為。尤其是1934年12月，許丙受溥儀皇帝之邀訪問大滿洲帝國之後，在「關東軍」參謀眼中更是被視為絆腳石，但因為許丙與「關東軍」數任司令官的私交良好因此莫可奈何。

在《日滿議定書》順利簽訂之後，許丙曾受滿洲國政府數度邀訪，最終在1934年底成行訪問滿洲。他第一站就先到奉天參拜歷代清帝的皇陵，兩天之後再前往新京參訪晉見溥儀皇帝。如同日本皇族、高官抵達臺灣時，必定先前往「臺灣神社」參拜一般，許丙此舉其實代表了他那一代的臺灣人對滿洲建國的普遍看法。臺灣的前清秀才、詩社「瀛社」第二任社長謝汝銓（1871～1953），在1931年滿洲建國時曾有詩云：「**漢人無憤滿人愉，三月長春建國都。應有詔書遙敬問，匈奴今有大單于。**」對大多數的臺灣人、尤其是1895年之前清治時期出生的人士而言，對自己的「身世認知」無疑定位在「前朝遺民」，對於前清皇帝充滿敬畏之情。如同謝汝銓詩中所述「**匈奴今有大單于**」，即將「大清統治」視為「異族」，與當時日本的異族統治臺灣別無二致，不過只是政權上的輪替而已；但即使是受異族統治，依然不能無視於曾為「臣民」的事實，這樣的「正視歷史認知」優於現代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抵達新京的當晚，許丙出席包括愛新覺羅・寶熙（1868～1942）、胡嗣瑗、許寶衡、愛新覺羅・熙洽、臧式毅、羅振玉等滿洲國宮內府、國務院高級官員的熱情晚宴，眾人對許丙兩年前運用自身在日本軍方、官方的人脈順利達成溥儀皇帝所提出的五個條件表達謝意。同時由於剛卸任的「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洲國大使」菱刈 隆，在任內十分尊重滿洲國官員的觀點與建議，而且平日在言談中經常提及與許丙的深厚情誼，讓在場人士與許丙彷彿一見如故一點也不陌生。

影像中為許丙（左一）與其東家林熊徵（右一）於許丙東京「大山町」自宅宴請愛新覺羅・溥傑（中央著軍裝者）並引見顏國年（右四，1886～1937）商討滿洲礦業開發一景。陪客為第十四任臺灣總督太田政弘（左二）、第十二任臺灣總督川村竹治（左三）、第十任臺灣總督伊澤多喜男（右三）、第十六任臺灣總督中川健藏（右二）；位於溥傑右手邊後方者為愛新覺羅・顯玗（川島芳子）。一張留影道盡林、許兩人在日本、滿洲高層關係之深厚；同時也駁斥後世學者誤將許丙「大山町」宅邸，錯認為其改名為「大山許丙」一事。（圖：許敏華所藏）



許丙與日滿關係

因為許丙在1932年間的從中協商，讓滿洲國高層與日本軍方、內閣能夠開啟直接溝通管道，避免凡事透過「關東軍」參謀時有可能發生的「欺上瞞下」狀況，因此事後溥儀多次透過「執政府」（1934年3月後改為「宮內府」）詢問許丙希望擔任該國何種官職以利繼續為滿洲國效力？許丙雖謙辭婉拒，最終還是被任命為「滿洲國執政府顧問」。

在1934年許丙訪問滿洲國此行當中，包括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以及皇族愛新覺羅．寶熙等滿洲國高級官員都將許丙的義舉視為「貴人相助」，因此拜會、回訪行程在10天當中幾乎滿檔。在許丙抵達新京的第二天，獲得溥儀皇帝的召見，並且賜宴共進午餐。溥儀對許丙這兩年以來對於滿洲國的諸多協助、建立與日本軍政高層的直接聯繫管道表示感謝。同時也對許丙先前透過與蔡法平之間的書信，建議派遣滿洲子弟前往日本內地求學，求取現代化知識以利建設新國家，同時還代為安排留學生在日本各地就讀學校、代為安排住宿並照料其生活表達謝意。而許丙則是謹守君臣之禮態度恭謹，猶如面對自身本國君主一般，連稱僅為盡其義務提供所能而已。

此外，溥儀皇帝還為許丙對自己在東京求學中的皇弟、皇妹們所提供的諸多照顧表達謝意，並希望能持續多加協助；同時溥儀也談及皇弟愛新覺羅．溥傑（1907～1994）的終身大事。由於溥儀膝下無子，已經由日本「學習院」高等科畢業、正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就讀的溥傑被「關東軍」視為王儲，也因此不斷推薦對自己有利的王妃人選，企圖營造能更進一步控制滿洲皇室的局面。原本滿洲人與蒙古就是透過連姻維繫「滿蒙一家」的血緣關係，到清帝國結束兩者皇族通婚總計有595次之多，其中滿洲皇室格格嫁入蒙古有432次，川島芳子就是一例。因而溥儀起初非常反對皇弟與日本女子通婚，但是「關東軍」的壓力如排山倒海而來，如果此事終究無法避免，與其讓「關東軍」操控溥傑婚事，還不如主動出擊用「位階高於軍部」的皇室之間通婚來維繫滿洲與日本的長久關係。許丙回到東京之後積極運作熟識的「北白川宮」家皇女與溥傑的婚事，但是由於日本皇室只能與本國皇室或貴族通婚此舉因此宣告破局；最後藉由相親，溥傑在1937年與「嵯峨家」侯爵之女嵯峨 浩（1914～1987）完婚，兩人婚後生活美滿並與許丙家持續往來。

左為攝於許丙東京「大山町」自宅影像。前排左起：「北白川宮」成久親王三女多惠子、滿洲國婉容皇后胞弟郭布羅．潤麒、「北白川宮」成久王妃房子、「北白川宮」永久親王、溥儀皇妹愛新覺羅．韞穎；後排左起：第六任臺灣總督安東貞美女婿曾任「臺灣軍」參謀的服部兵次郎少將、許丙夫人葉白、東園基文伯爵、「北白川宮」成久親王二女東園伯爵夫人佐和子、許丙、服部少將夫人節子、「北白川宮家」女官大久保、「北白川宮家」梅田事務官、許丙長子許伯埏。（圖：許伯埏所藏）



許丙的政商關係

在溥儀皇帝與許丙的面晤中還提及請臺灣人一同來建設滿洲國一事。基於《滿洲國經濟建設要綱》需要包括臺灣在內的國外民間資金投入國家建設，「宮內府顧問」許丙表示會盡其所能提供協助與人脈。溥儀言及此事其實有其背景：滿洲國的建設當然需要莫大資金，仰賴國外投資是當時必然之舉，然而包括滿洲國高層、關東軍參謀層級都不希望重蹈「明治維新」以來政壇被財閥操控的舊轍，因此對日本內地財團資本始終抱持疑慮，在此前提之下來自臺灣的投資與人才，就成為滿洲未來建設的重要選項。之後許丙信守承諾，不僅其個人與板橋林家資金投入滿洲土地、礦產開發，同時也邀集臺灣各大家族企業前進滿洲進行投資。

然而在事後，尤其在移住滿洲的臺灣人之間傳聞，許丙因為覬覦在滿洲開發土地事業可獲得龐大利益，因此才會與其東家林熊徵協助日、滿之間的協調溝通。此實為時空倒錯的小人之心。對許丙與林熊徵而言，就誠如李春生對日本與大清新舊政權的一貫態度：「**新恩雖厚，舊義難忘**」，在能力範圍內為曾是自己的皇帝與現今的國家效命，深感光榮而已。

在溥儀接見許丙的最後，他問許丙有何期待與要求，本以為許丙會如同當時官場之人一般企求官職或實質利益，沒想到許丙僅回覆希望能得到溥儀皇帝的墨寶。於是，兩人轉至書房，由許丙研墨、溥儀稍微思索之後寫下語出《孟子》「**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的「由義」二字相贈。由此可知許丙這位臺灣人在溥儀心中的地位，也道盡許丙傾囊相助的心態。這是兩人首次會晤，也是此生最後一次。

許丙與林熊徵在日本政商界的人脈關係不僅錯綜複雜，連水火不容的軍方派系都能介入協調，令人瞠目結舌。1935年11月底，即將上任的「臺灣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將（1879～1945）前來拜會許丙，除希望自己在上任後許丙能回臺灣多加指點之外，還請託許丙務必促成當時軍方「皇道派」、「統制派」兩位巨頭渡邊錠太郎、真崎甚三郎當面會晤化解誤會以利政局穩定。由於兩個派閥對許丙的熟識與信任，許丙順利促成渡邊大將、真崎大將與兩派人馬預定於1936年3月1日當面磋商；然而2月26日發生軍事政變，時任「教育總監」的渡邊錠太郎遭到刺殺身亡，因此不僅許丙安排的兩派協商化為烏有，進而從此日本軍方成為「統制派」的一言堂，國家開始走向覆亡的不歸路。

自古以來不論那個國家、政權，排除「革命手段」能夠影響政府施政、國策的唯有「實力派人士」。臺灣雖然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但是「男兒當自強」，如果能受人敬重、擁有實力也能如同許丙一般成為與統治者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統治者的人物，此即所謂「**大人之事備矣**」。臺灣在小林躋造總督（1877～1962，海軍大將）任職期間曾推行激烈的「皇民化政策」，在1940年許丙成功運作、遊說長谷川 清（1883～1970，海軍大將）取而代之繼任臺灣總督職務。長谷川總督抵臺首日先前往「臺灣神社」參拜，隨後聽從許丙建議立刻趨往艋舺「龍山寺」參拜，此舉也宣告小林總督的「皇民化政策」正式結束。

影像中為1930年2月林熊徵（左三男士）招待當時訪臺的日本陸軍教育總監武藤信義大將（右一），由「臺灣軍」司令官菱刈 隆大將（左四男士）、「臺灣軍」參謀長佐藤子之助少將（右五男士）、臺北州內務部長深川繁治（右二）陪同前往板橋林家花園遊覽合影。同行者包括當時「大永興業株式會社」（1921年由「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改組）取締役張園（左一，1895～1991）以及許丙（左二）。由許丙右手持雪茄煙、左手搭在同遊藝旦肩上的一派輕鬆模樣，可知與菱刈 隆、武藤信義大將等軍方高階人士平日私交甚篤。（圖：張園家族所藏）



臺灣本島人的「來去滿洲」

前有許丙不為人知的日滿臺之間的暗中協商，後有謝介石台面上的風光返臺，兩者在臺灣的上階層與一般階層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謝介石返臺的旋風，在臺灣青年知識分子間造成極大的迴響。臺灣青年瞭解到，除了臺灣、日本本土、朝鮮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廣大的市場與發展機會在等待他們。臺灣本島人前往滿洲發展時，由於身分是「日本籍」，因此各行各業平均薪資是臺灣本地的3倍以上。同時廣大的滿洲需要各種專業人才，幾乎只要願意赴任前往就有就業機會。而謝介石信守他在臺灣對父老兄弟的承諾，於大滿洲帝國「國務院」轄下的外交部（如左圖）內成立服務臺灣人的專門窗口，之後設立「臺灣同鄉會」讓遠道而來的父老之間相互聯絡交換資訊。謝介石還每日在自己官邸前舉辦流水席，為遇到困難的臺灣鄉親解決問題提供溫飽，即使在1937年他卸下滿洲帝國駐日本全權大使職務轉任「滿洲房產株式會社」理事長之後也未曾中斷。幾乎所有前往滿洲發展的臺灣青年，都曾受過他的直接或間接照顧。截至終戰時統計，臺灣本島人前往滿洲就業、求學人數超過5,000人以上。

優渥的薪資待遇，吸引許多臺灣菁英前往滿洲發展；加上因擁有「日本籍」身分的特權，因此在滿洲反而可享有許多在臺灣所無法擁有的特殊待遇與津貼。此外，基於日本與滿洲之間的協定，公務機關「滿洲籍」人員配額必須佔3/4，因此還出現若干臺灣本島人前往滿洲任職時先以「滿洲籍」身分「佔缺」，等待「日本籍」配額空缺時再行以「日本籍」身分遞補，以便獲得「外地津貼」。當今有部分人士批評，含臺灣本島人在內的「日本籍」人員，其薪資與待遇均優於「滿洲籍」人員甚多，因此造成「同工不同酬」現象。但若以今日臺灣籍人士前往中國工作作為類比，若非是在「重賞」之下，臺籍或日本本土人士很難離鄉背井前往異地工作，因此此一「不公」現象實屬必然。臺灣日治時期，來臺工作的日本內地人，同樣是基於來臺薪資高於日本內地，因此遠渡重洋前來臺灣，古今人同此心其道理一致無須贅言。或另有人批評，在滿洲的臺灣本島人待遇優於滿洲人，其實在日本立場而言，臺灣本島人亦屬「日本國籍」，基於「本國人立場」，其待遇有所差別亦屬正常不足為奇。

此外，「心理因素」也是促成臺灣本島人前往滿洲發展的重要因素。臺灣人在滿洲，相較處於「矮人一截」的臺灣，本島人是以「日本人」身分的「高人一等」姿態出現；換言之，是由委屈的「被統治者」一躍轉變成為「統治者」的優越感「微妙心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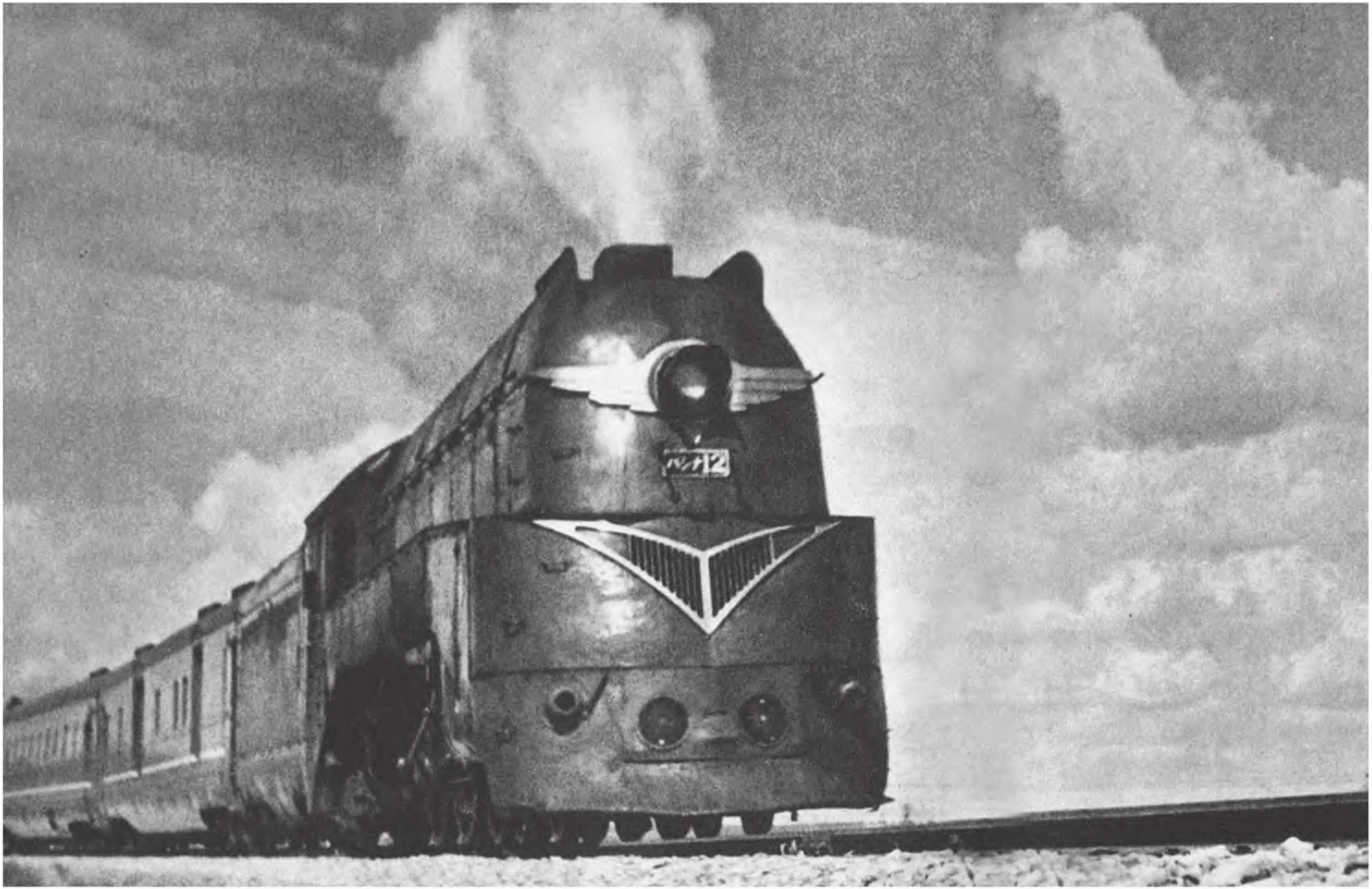
臺灣人爲何要「來去滿洲」

除了薪資之外，吸引臺籍青年「來去滿洲」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機會」。在日治時期的臺灣，雖然建設、教育得以普及；但是在臺灣，不論是公職機會、升學機會、就業機會員額均有其限制。該限制不僅只是因為臺灣「本島人」、「高砂族」與日本「內地人」身分上的差異，而是在於「職缺有限」與「升學窄門」的根本性問題所致。

以臺籍青年所趨之若鶩的醫學領域為例，就只有「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6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一所學校，無法擠入該校升學就讀者，只能花上大筆金錢前往日本內地的醫學大學或公私立醫學專門學校就讀。但是在滿洲則有「新京醫科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奉天）、「旅順醫學專門學校」、「大連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可供就讀。如此一來與臺灣相比，不僅只是名額激增而已，同時臺灣本島人還可以藉由日本籍身分在入學考試時獲得加分優先錄取；更遑論在滿洲求學不僅可以與當地學生相同獲得學費全免的優待，還可以獲得額外的生活津貼與補助。進一步，在畢業之後尚可在滿洲各地最現代化的一流醫院、醫學校任職或任教，因此為臺灣有志於從醫的本島人創造很大的吸引力及機會，這也造成至少有1/3的臺灣人都是從事醫學相關職業的結果。

不僅只是醫學相關學校，在高等教育上滿洲國成立之後擁有「建國大學」、「新京法政大學」、「新京工業大學」、「新京畜產獸醫大學」、「師道大學」、「女子師道大學」、「哈爾濱學院」、「哈爾濱工業大學」、「北滿學院」、「佳木斯開拓學院」、「齊齊哈爾開拓學院」、「龍井開拓學院」（吉林）、「滿洲教育專門學校」、「奉天工業大學」、「奉天農業大學」、「旅順工科大學」、「旅順高等學校」、「南滿洲工業專門學校」、「大連高等商業專門學校」以及專為培養國家高等文官設置的「大同學院」，以建國初期3千3百萬人口的滿洲而言不僅教育設施完備，其中還包括多所專為女子設立的高等教育學校，難怪對臺灣本島人充滿吸引力。進一步而言，對臺灣本島人來說，在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的同時，也代表了結束學業之後在滿洲的工作保障。

影像中為大連「滿鐵病院」，該院地下一層、地上四層，佔地9萬平方公尺，1925年完工時被稱為「東洋最大綜合醫院」，擁有620個病房。如果與當時臺灣最大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建築相比，便可知其規模上的差異。



臺灣本島人「來去滿洲」的途徑與類別

臺灣本島人遠渡重洋前往滿洲國發展的時間點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在1932年滿洲國成立之前，其中一個大時代的背景因素在於1929年10月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這個持續到1930年代中期為止的經濟恐慌，連帶造成1930年前期的日本、臺灣就業市場低靡。日本內地與本島知識階層謀職不易的結果，讓臺灣人決心前往滿洲尋找機會，以日本籍的身分獲得甚至高於日本內地兩倍的薪資與津貼，前去滿洲主要的目的地是在「關東州」。此階段在人數上較中、後期為少，同時以在「南滿鐵」或是其附屬機構任職為主。中期則是滿洲國建立之初到1935年底之間，此一階段滿洲國祭出種種優惠措施鼓勵外地人才前往就職以利國家建設，臺灣本島人前往者以從商、進行投資或是求學居多。而第三期則是由於謝介石返臺旋風所促成，讓大多數的臺灣青年認識到滿洲這個遙遠新天地與國家，同時燃起前往發展的興趣。

而前往滿洲的路徑則分為：由日本內地搭船到釜山然後藉由鐵道穿越朝鮮，一路進入滿洲；另外一條路徑則是由臺灣搭船，直接到達大連之後換乘每小時最高時速可達130公里的「特急列車亞細亞號」（如圖），抵達滿洲各地重要都市的目的地。至於前往滿洲發展的動機，大致分成下述幾種類別：

政界發展：在滿洲國建國初期，許丙、蔡法平與謝介石先後對於有各項專長的本島人，依據其專門領域的不同介紹進入政府部門或是滿洲國境內各省份從事行政工作。例如，出身臺北大稻埕的李朝舟曾任滿洲國興農部參事官、謝介石妻弟王溫石曾任外交部科長、新竹出身的郭輝曾擔任奉天省通遼縣稅捐局長、臺北州人林景仁曾任外交部政務司歐美情報司長、臺南州人楊蘭洲曾任經濟部工業科長、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畢業的陳亭卿任職於經濟部商業司、吳佐京擔任滿洲國駐朝鮮總領事、桃園人許水德任職於滿洲國財政部、臺中州出身的林鳳麟因「九州帝大」法科畢業專長曾任職司法部負責編纂法條。

財界發展：由於滿洲的銀行界官員，許多都是出身於總督府、臺灣銀行的財政官員，甚至掌握滿洲經濟命脈的「南滿鐵」歷任總裁、理事也不乏臺灣總督府、臺灣銀行出身人士，因此在滿洲的財政界、銀行當中許多臺灣本島人菁英得到重用。例如：畢業於「東京商科大學」的吳金川、蕭秀淮，以及出身「京都帝大」的許建裕、「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的高湯盤均曾任職於滿洲「中央銀行」；臺中清水楊家的楊基振、「東京商科大學」的鄭瑞麟曾任職於「南滿鐵」；「東京商科大學」畢業的王熙宗任職於「營口銀行」。


奉天タクシ
83
84
85

本島人「來去滿洲」的其他發展類別

醫界發展：地廣人稀，同時正值經濟飛躍發展期的滿洲國，需要大量維持國民衛生健康的醫師。這個情況非常類似日治初期的臺灣，各級醫療院所都需要醫學專才，日本內地醫師只要願意到臺灣服務、行醫就祭出高薪與優渥條件；臺灣本島人醫師在滿洲醫院行醫的薪資本俸數倍於臺灣本地，與在滿洲的日本籍文官相同，還可有職務津貼、冬季採暖津貼、勤務地津貼以及在外地生活津貼等等福利，享有絕佳的生活環境與條件。例如：早期有「臺北醫學校」畢業的謝唐山，前往「關東州」下的「營口同仁醫院」任職；豐原人謝秋濤最終任職「奉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長」，在滿洲行醫時間超過30年；臺中州人廖泉生在「滿洲醫大」畢業後行醫，終戰後回臺開設「臺中仁愛醫院」；花蓮港廳人張宗仁在「日本醫科大學」畢業後任職於「南滿鐵道醫院」。

而在開業醫方面，在滿洲開業取得執照比臺灣容易，同時臺灣人醫師由於語言與人種背景更容易取得當地人信任，開業之後上門求診患者源源不絕生意興隆。例如：早期的臺東廳人孟天成在大連開設「博愛醫院」，最終不僅成為綜合醫院同時還開設數間分院；臺中州人黃順記在「滿洲醫科大學」畢業後於奉天開設「博愛醫院」行醫，而且其弟黃深智、黃雅幫也同樣都在滿洲成為開業醫；此外，黃子正在「臺北醫事專門學校」畢業後，於新京開設的「大同醫院」成為滿洲國外交部的特約醫療機構，之後經由謝介石引薦，成為溥儀皇帝與其家人的專屬御醫之一。在滿洲大連、奉天、四平、新京、哈爾濱、旅順、鞍山都可以看到臺灣本島人開業醫的足跡，難怪在滿洲人心目中會覺得臺灣人幾乎都是醫事從業人員。

從商發展：臺灣本島商人遊走於臺灣、日本、中華民國、滿洲國者為數眾多。從早期的陳天來家族以茶葉為主的貿易之外，之後臺灣與滿洲之間的農作物、紡織品、工業產品往返頻繁。特別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華民國與滿洲國貿易斷絕，臺灣本島人的特殊身分，讓滿洲國與臺灣的雙邊貿易量激增。彰化出身的陳錫卿在滿洲經商極為成功，同時也因謝介石關係任職於滿洲國文教部；此外淡水人洪克成以及臺南人許鶴年、黃烈火、周塗樹等人均在滿洲經營事業有成。

為理想而發展：土地廣大、機會眾多的滿洲，是希望闖蕩新人生者的天堂，這片「機會樂土」讓日本內地與臺灣懷抱夢想的青年勇於闖蕩。由於「滿洲映畫協會」是當時華語電影的製作重鎮，而臺灣本島又缺乏電影製作環境，因此臺中州人柯鴻礎、臺北州人張天賜被吸引投效進而擔任導演。而阿緱廳出身的客籍文學家鍾理和，與女友鍾台妹相戀進而論及婚嫁，但因「同姓不婚」習俗，只能出奔滿洲追求婚姻幸福。此外，屏東郡人張喜榮原本在客運會社擔任車掌，但聽聞四個舅舅都在滿洲發展良好，毅然帶著微薄積蓄與一床棉被由高雄港搭船前往大連，最終在影像中的「奉天TAXI」謀得駕駛工作，薪資為臺灣公學校教員的三倍。（圖：何思瑩）



在滿洲建國前後到終戰為止，超過5,000臺灣本島人前往滿洲謀職、經商、投資、就學以及追求理想，他們直接或間接都受到蔡法平、許丙、謝介石的協助。這三人或許國籍各異、身分各有不同，但是對於臺灣同鄉的熱心別無二致；他們運用自己的人脈、地位或金錢協助臺灣的父老兄弟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與社會地位，這才是真正「有力者」的力量。影像中為1935年謝介石（前排右二）與滿洲國駐日大使館一等祕書官葉堯公（前排左二）、謝大使三子謝文凱（前排左一）參訪「新竹少年刑務所」後留影。該所所長中山瑞芳（前排右一）雖然也列坐前排，但刻意與謝大使保持恭謹距離、連座椅也有所不同，足見謝介石的地位實高不可攀，無怪乎謝介石會造成「**來去滿洲！**」風潮。（圖：霧峰郭双富所藏）

5 神光宇宙下的外交與國防

滿洲來去

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



「秩父宮」雍仁親王訪問滿洲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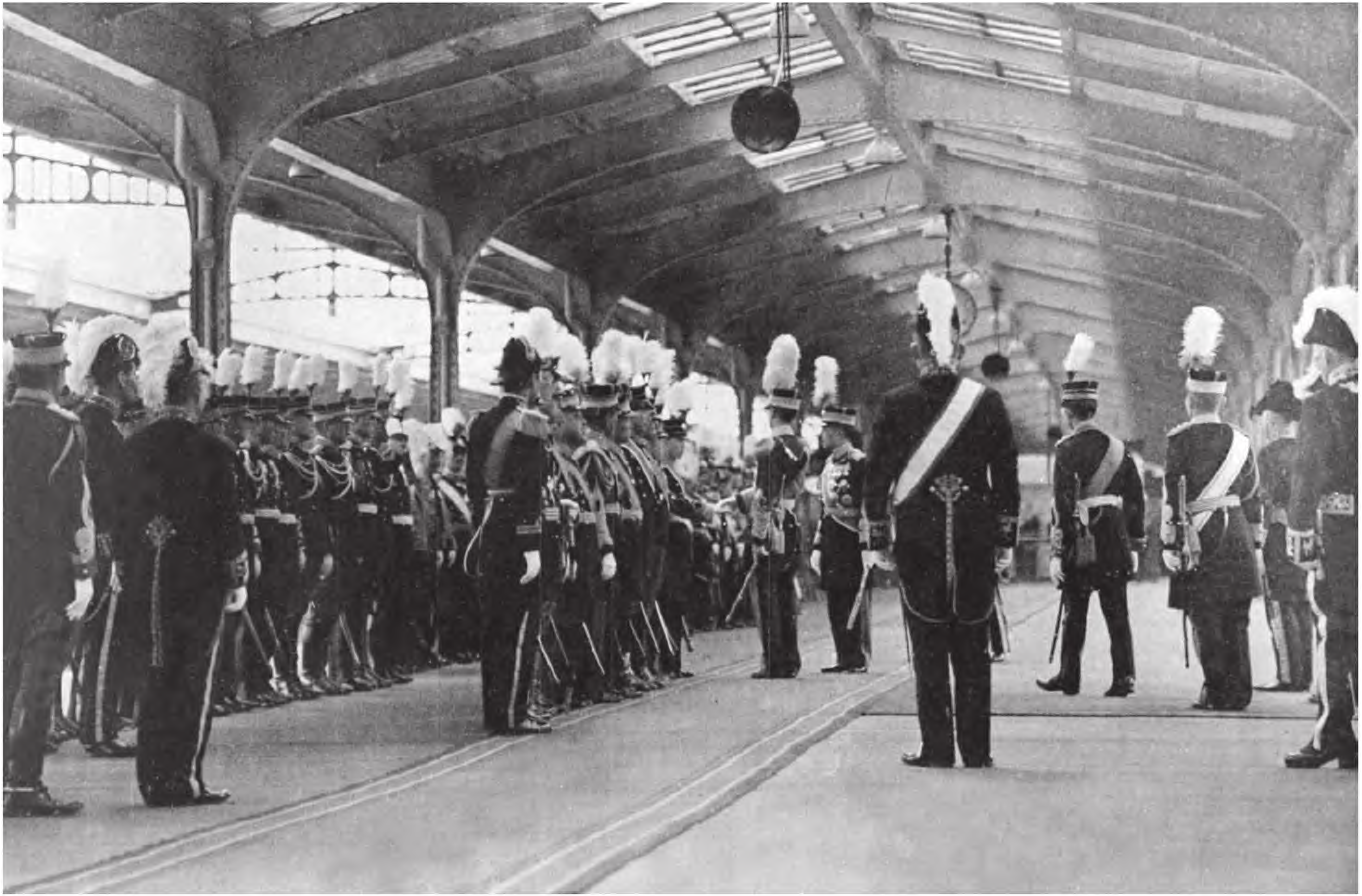
毫無疑問，滿洲國建國後在外交、內政上最重要的盟邦就是大日本帝國。因此如何維繫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是滿洲國最大的課題。

1934年6月5日，昭和天皇皇弟「秩父宮」雍仁親王以天皇代表身分訪問滿洲國。雍仁親王此次來訪，最重要的目的是代表昭和天皇慶賀溥儀登基成為「大滿洲帝國」皇帝，同時還帶著昭和天皇的親筆祝賀信函前來。日本天皇在1971年之前從未打破過在位期間進行海外訪問的前例，這也是為何昭和天皇以雍仁親王作為祝賀代表的原因；此舉也象徵著兩國皇室之間的關係日益穩固，對滿洲國而言意義重大。日本皇室對滿洲皇室的態度不像「關東軍」或日本軍方那麼獨斷，反而是遵從外交禮節將滿洲皇室當成正式的外國君主看待，這樣的態度與舉措看在滿洲國要員與溥儀的心裡，當然別有一番不同感受。

「秩父宮」雍仁親王搭乘帝國海軍重巡洋艦「足柄」於6月5日前往大連港，次日上岸之後改乘「亞細亞號」一路趕往滿洲國首都新京。6日下午6時列車到達新京車站，溥儀皇帝率領內閣官員親自在月臺迎接，雙方相互握手致意。當晚，在新京街頭舉行萬人「奉迎提燈」大遊行作為歡迎慶賀。7日上午9時40分，雍仁親王前往宮內府訪問，接著在「勤民樓」內的正殿晉見溥儀皇帝與婉容皇后兩陛下，並且呈上昭和天皇的親筆祝賀函。此外，雍仁親王還代表昭和天皇對溥儀皇帝頒授日本帝國最高勳等的「大勳位菊花大綬章」，以及對皇后婉容頒贈女性的最高等「勳一等寶冠章」。在結束正式拜會行程之後，溥儀與雍仁親王各自退出「勤民樓」，褪去正式大禮服改著軍常服在戶外歡談寒暄。

影像中即為當日拜會行程結束之後留影。前方中央右側為「秩父宮」雍仁親王、左側為愛新覺羅・溥儀皇帝。左二為滿洲國尚書府大臣郭宗熙、左四為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左五為「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中將（1881～1960）、左六為日本宮內省式部長官林 權助（1860～1939）。右二為滿洲國宮內府大臣沈瑞麟、右四為「關東軍」司令官菱刈 隆、右六為日本參謀本部參謀次長植田謙吉中將（1875～1962）、右七為滿洲國侍從武官處武官長張海鵬上將。溥儀皇帝左胸最上方佩戴的即為剛從雍仁親王手中獲頒的「大勳位菊花大綬章」。

雍仁親王在繁忙於新京的官署拜會行程後，在6月8日上午10時與溥儀一同校閱滿洲國軍的千人部隊。6月11日下午2時，在新京的「西公園」還盛大舉行滿洲各級學校青少年參與的「奉迎運動會」，出席人數高達上萬人。6月13日，雍仁親王結束新京行程前往奉天參訪；15日轉往大連搭乘軍艦「足柄」返回日本，圓滿結束訪滿任務。



大滿洲帝國皇帝訪問日本

1935年4月2日，為答謝大日本帝國天皇御弟「秩父宮」雍仁親王的來訪，同時應雍仁親王之邀溥儀正式出訪日本。這是溥儀皇帝畢生首次出訪海外，日本舉國上下以隆重對待外國君主之禮迎接溥儀來訪。

當日6點50分，溥儀從新京皇宮出發，抵達新京車站後轉乘火車，17時20分於二十一響禮砲聲中溥儀抵達「關東州」大連。在大連車站恭迎溥儀的包括日本「關東州」的文武官員，其中階級最高者為時任「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洲國大使」南 次郎大將（1874～1955）。17時36分，當溥儀車隊抵達港口時，擔任「御召艦」任務的日本新銳戰艦「比叡」響起禮砲，同時在主桅杆上升起代表大滿洲帝國皇帝的「蘭花紋章皇帝旗」，碼頭上的軍樂隊也吹奏起樂曲，在「比叡」上的大日本帝國海軍官兵，齊聲高呼「萬歲」恭迎溥儀皇帝登艦。溥儀在艦上官兵列隊敬禮中，登上在「比叡」第四砲塔上特別設置的「御座所」觀禮台，接受上萬名民眾行最敬禮送行。18時整，「比叡」旁的輕巡洋艦「球磨」再度響起禮砲，在艦上、岸上眾人的「萬歲」聲中，「比叡」緩緩駛出大連港。此時的溥儀，內心激動萬分，在觀禮台上招手回禮，畢竟這樣的禮遇是他生平的首次經驗。之後，溥儀在「比叡」戰艦上，寫下他此刻的心境：**「海平如鏡，萬里遠航。兩邦攜手，永固東方。」**

該艦隊航向日本橫濱港途中，經過長崎外海「男女群島」海域時，大日本帝國派出「聯合艦隊」各式軍艦70餘艘，進行海上分列式接受溥儀校閱。「聯合艦隊」的壯盛軍容，帶給溥儀心裡無比的震撼。他再度以詩文描述感想：**「萬里雄航破飛濤，碧蒼一色天地交。此行豈僅覽山水，兩國申盟日月昭。」**由此可見溥儀皇帝對於此行的期待，以及對強化滿洲帝國與日本帝國之間國交的強烈使命感。1935年4月6日，大滿洲帝國皇帝座艦「比叡」抵達橫濱港，大日本帝國海軍「橫須賀鎮守府」的官兵在港口列隊恭迎。當溥儀抵達港灣時先是鳴笛、鳴砲，裕仁天皇御弟「秩父宮」雍仁親王親自在碼頭迎接，隨即陪同溥儀校閱帝國海軍儀仗部隊，同時天空中呼嘯而過上百架帝國海軍航空隊軍機，也向大滿洲帝國皇帝致敬，溥儀則回以舉手禮。

11時30分，溥儀在雍仁親王陪同下搭乘「御召列車」抵達東京驛，展開20天的參訪行程。當插有滿、日兩國國旗的皇室專用列車到達時，軍樂隊吹奏起滿洲國國歌，溥儀步下列車踏上鮮紅地毯之際，在場等候的裕仁天皇走向前握手為禮親切寒喧。在裕仁天皇介紹之下，月臺上身著正式禮服的大日本帝國所有皇族成員、文武百官列隊逐一拜見溥儀皇帝（如圖）。這歷史性一刻的安排與執行細節，讓溥儀十分雀躍，同時更是深感榮耀。



溥儀皇帝的東京訪問行程

在裕仁天皇的陪同之下，溥儀皇帝校閱了「近衛儀杖隊」禮儀官兵，接著在裕仁的目送下搭上皇室馬車，由雍仁親王陪同、「御鹵簿」儀杖騎兵前導下，前往下榻的「赤坂離宮」。在東京車站前廣場，早已隆重佈置了「奉迎」牌樓，夜晚還加上照明設備，顯得富麗堂皇。日本政府將這次溥儀的來訪，當成「國家盛典」舉辦，從東京驛到「赤坂離宮」沿途有「近衛師團」4萬5千官兵、21萬一般民眾手持滿、日兩國國旗夾道歡迎，同時一路上軍樂聲、高呼萬歲聲不絕於耳。大日本帝國的皇室傳統禮儀、典章制度，大都承襲自大英帝國皇室，因此對深受莊士敦爵士影響的溥儀而言，之前雖然從書本上獲得皇室禮儀的相關知識，但親身體驗畢竟尚屬首次，此刻溥儀的心境澎湃不難想像。

當日午後2時5分，在雍仁親王的陪同下，溥儀乘坐皇室馬車前往皇居晉見天皇與皇后陛下。在晉見裕仁天皇、皇后時，溥儀對大日本帝國在滿洲國建國前後的全力協助與支持表達謝忱；同時也對雍仁親王於1934年出訪滿洲國深表感謝。在正式晉見拜會的最後，溥儀以大滿洲帝國皇帝的身分，將大滿洲帝國最高等勳章「大勳位蘭花頸飾」頒贈給裕仁天皇、「大勳位蘭花大綬章」頒贈給皇后陛下。

4月7日，溥儀先至裕仁皇母節子皇太后（1884～1951）的「大宮御所」進行非官方的拜訪，由於溥儀與節子皇太后曾流產未出生的太子正好同年，一見如故之下十分親切因此稱呼他為「滿洲殿下」；而溥儀在陪同其散步時還親手攙扶皇太后上坡。隨後，溥儀一行前往「明治神宮」參拜，車隊所經之處沿途受到民眾手持滿日國旗夾道歡迎。當車隊抵達「明治神宮」時出現令溥儀大出意料的場景，此時在「明治神宮」外苑廣場已經聚集了上萬的女子高等學校學生，手上揮舞著滿、日國旗排成「奉迎」隊形，這樣的盛大場面讓溥儀的情緒不禁激動起來。參拜過後接著是前往「聖德紀念繪畫館」的參訪行程與參拜「靖國神社」。

4月8日上午11時29分，溥儀蒞臨在東京麻布區的「滿洲國駐日本公使館」，接受在日本的滿洲國留學生、各界代表四百多人的「奉迎會」，該會最後在萬歲三聲之下結束。當日下午，東京市教育局發動女子學校學生、女子青年團代表四千餘人從「日比谷公園」出發舉行慶賀遊行，下午3時抵達終點「赤坂離宮」前奮力揮舞滿、日國旗並高呼萬歲（如圖），溥儀皇帝則在離宮二樓陽台上揮手答謝致意。當晚於內閣首相官邸舉行歡迎國宴，「秩父宮」雍仁親王、「閑院宮」載仁親王、「伏見宮」博恭王以及內閣各大臣、帝國議會代表盛大出席；岡田啟介首相代表各界對溥儀致奉迎詞，而溥儀也在最後致謝詞並接受眾人高呼萬歲。



溥儀皇帝校閱帝國陸軍「近衛師團」

4月9日上午9時50分，溥儀皇帝蒞臨位於代代木的練兵場，略事休息之後與昭和天皇共乘皇室馬車前往校閱台，準備出席「近衛師團特命陸軍觀兵式」。影像中馬車上即為日、滿兩國元首，緊跟著皇室馬車之後者為「秩父宮」雍仁親王（右一）、滿洲國侍從武官長張海鵬陸軍上將（右二）、侍從武官長本庄 繁大將（右三）。這場閱兵式匯集了「近衛師團」一萬五千餘名官兵，圍觀群眾達到十餘萬人。在「朝香宮」鳩彥王指揮官一聲令下，溥儀皇帝與昭和天皇站在閱兵台上，接受「近衛師團」一萬五千官兵整齊劃一行「舉刀」、「舉槍」最敬禮，接著在軍樂隊雄壯的進行曲聲中逐一校閱步兵、騎兵、砲兵、工兵、戰車部隊、自動化機械部隊的地面分列式；最後天空中出現帝國陸軍「飛行第五聯隊」所派出的98架各式新型戰機進行空中分列式，向滿洲國皇帝致敬，溥儀則在地面對空中行舉手禮答禮。

4月14日12時20分，溥儀皇帝再度前往皇居向昭和天皇、皇后與皇族道別，其後天皇於皇居內「豐明殿」賜宴，岡田首相以下150餘人與會共饗，在互道國運昌隆聲中溥儀結束東京行程。4月15日，大滿洲帝國皇帝抵達京都展開訪問，京都府在車站周邊發動數萬民眾與學生沿途恭迎。4月18日，由「京都府商工會」出面官民合辦，於「平安神宮」舉行正式奉迎會，參加與會者達6千人以上。奉迎會主辦方還在「平安神宮」前搭建臨時高台，滿洲國皇帝站在高台之上，聆聽由京都府知事在台下所恭讀的奉迎文。

4月20日，溥儀抵達千年古都奈良。在溥儀參訪名勝「東大寺」、「春日神社」之後，還進行夜遊賞櫻行程。當夜遊車隊抵達一可遠眺「三笠山」之處時，在漆黑的山腰上，數千奈良市民提著燈籠，排列出「奉迎」二字，令溥儀十分感動。4月21日，滿洲國皇帝抵達大阪湊町驛，在車站主要聯外道路矗立著巨型「奉迎」牌樓，同時沿途依然是人山人海。大阪府在「大阪商工會議所」舉行了上千人的歡迎茶會，所有關西地區的政商雲集，以積極拓展與滿洲國貿易及簽訂多項合約作為溥儀來訪的大禮。其後，溥儀轉往神戶訪問，並於23日在日本各界的歡送之下，再度搭上御召艦「比叡」由神戶港啟程返回滿洲國。在登艦前，溥儀接受了圓滿負責此次接待的「樞密院顧問官」林 權助男爵（1860～1939）的道別，溥儀皇帝也特地請林顧問官代為向節子皇太后致意，觸景傷情之餘還掉下淚來；林顧問官見狀也同樣潸然落淚，懇請皇帝陛下保重龍體。



溥儀皇帝二度訪問日本

1940年6月22日，溥儀皇帝由新京出發赴大連搭乘「御召艦」戰艦「日向」第二度出訪日本，26日抵達橫濱港時在港口受到昭和天皇二弟「高松宮」宣仁親王（1905～1987）與帝國海軍儀杖隊隆重歡迎。11時35分，皇室「御召列車」抵達東京驛，裕仁天皇親自率皇室成員、文武官員在月臺迎接，闊別五年兩人相見格外親切，一旁則有身著海軍軍服的宣仁親王（右一），以及米內光政總理大臣（1880～1948，海軍大將，天皇後方鞠躬者）陪同。由於當時日本已經進入「國家總動員」時期，天皇、皇室成員、溥儀皆穿著軍常服。

27日溥儀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隨後拜會節子皇太后。28日前往首相官邸拜會，並接受宴會招待。29日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盛大的奉迎會，其後節子皇太后特地為溥儀皇帝舉行招待餐會。30日則是由滿洲國駐日本大使阮振鐸（1893～1973）主辦「大滿洲帝國皇帝來日奉迎會」，阮大使在致歡迎詞後在場眾人高呼萬歲三聲。7月1日，溥儀皇帝參加由昭和天皇舉辦的國宴，與各界重要人士共進餐會。2日離開東京，前往京都、滋賀、伊勢、大阪，6日由神戶港出發返回滿洲。

溥儀此行表面上是為了慶賀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而來，然而對他而言真正的目的是前往「伊勢神宮」求取祝禱過的「祓」以便回國為「建國神廟」鎮座。溥儀第二次訪問日本之際，滿洲國因為日本大量投入的建設資金，雖然建國才短短八年但是實力已經今非昔比。被稱為「日本的生命線」的滿洲，對深陷中國戰場的日本而言不僅是堅定的盟邦，同時也是物資、原料的最大供應地。此次溥儀的訪日行程，依然被當成重要外國元首對待，固然日本在「國家總動員」之下無法像1935年首次訪日一般鋪張豪華，但是應有禮節樣樣不缺。對當時的日本國民而言，溥儀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不僅極富名聲同時國民也相信他是一位堅定的盟友。在溥儀的參訪行程中，政府雖然動員民眾夾道歡迎，但是自動自發想目睹滿洲國皇帝龍顏、高呼萬歲三聲者也不絕於途。

此外，無論滿洲當初建國過程如何，一旦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認，日本皇室則是以重要友邦的真誠情誼相待，在兩次訪日的過程當中溥儀皇帝自然點滴在心。前述節子皇太后對待溥儀猶如親生皇子，而溥儀在前次離開日本之際曾委託林 權助顧問官代為道別，因而才會有二次訪日時皇太后親自設宴招待之舉。自幼顛簸命運乖舛的溥儀，無疑在節子皇太后身上感受到關愛，雖然他事後在獄中被迫由阮振鐸代筆寫下言詞鄙俗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表示：這一切都是「巴結」而已。但是伸手攙扶皇太后、臨別時掉下眼淚的這些舉動，絕非從小接受帝王教育的溥儀所能偽裝而出的「演技」。溥儀在書中也曾承認，他在1935年訪問日本之際，受到天皇、朝野的熱情招待與尊重，讓他產生一種他是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真皇帝的「錯覺」，彷彿當上皇帝之後身邊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帝王之道與「建國神廟」

溥儀雖然一生中三度當過皇帝，也從莊士敦的教導與書籍中得知歐洲各國的「帝王之道」，但是在之前未曾出國訪問過的他，首次在1935年親身體驗到何謂「萬民擁戴」的帝王之尊。溥儀親眼目睹昭和天皇與皇室成員所到之處，帝國臣民的崇敬之心與恭謹舉措，他回想起自己兩度被「民國」驅逐下台，這一切讓他猶有錐心之痛，如何能像日本皇室一般「萬世一系」成為他最大的課題。

在日本，溥儀感受到各界對他真心尊崇絲毫不假，「秩父宮」雍仁親王在東京驛送別時曾言：「**皇帝陛下此次訪日，對日滿親善做出巨大貢獻。我天皇陛下，對此深感欣慰。懇請陛下今後務必致力維持兩國親善，順利歸國。**」如果在日本天皇、皇室、首相眼中他是個「真皇帝」，那如何壓制處處干涉的「關東軍」不要讓自己繼續成為「假皇帝」，是當務之急。於是，溥儀想到日本的皇權基礎是來自於「天照大神」授與統治權給神武天皇，至今統治日本將近2,600年，如果能將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分靈到滿洲，想必自己也能成為日本皇室的化身，讓「關東軍」有所顧忌。

此外，在兩度訪日行程中溥儀都參拜了「靖國神社」，目睹日本全國上下對於「明治維新」以來犧牲的將士是如何崇敬，讓他起心動念要在國內建立「建國忠靈廟」，紀念為滿洲建國所犧牲的臣民將士。如今有許多人對溥儀皇帝參拜「明治神宮」、「靖國神社」之舉提出批判，其實在當時這是再平常不過的國賓行程。來訪日本的歐美各國皇室貴族、政治要人，在東京行程必定包含「明治神宮」、「靖國神社」等參訪地點，成為外交上的慣例。即使是在二戰結束後的1956年，當時的中華民國立法院長張道藩也曾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溥儀打算如同臺灣的「臺灣神社」一般，在滿洲「建國神廟」祭祀主神為「天照大神」並請求由天皇下賜「白銅圓鏡」的「神體」，但是不論是皇室或內閣都認為滿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能與臺灣、朝鮮相提並論。溥儀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伊勢神宮」藉由分靈到滿洲祭祀，此案也因為上述同樣理由遭到日本拒絕。無奈之餘，堅持要祭祀「天照大神」的溥儀只好在1940年訪日之前，預先委託京都業者代為製作「白銅圓鏡」，之後再前往「伊勢神宮」求取祝禱過的「祓」帶回滿洲，於1940年7月15日拂曉舉行「建國神廟」鎮座大典（如圖），並發表《國本奠定詔書》。而從京都帶回的「白銅圓鏡」，加上由裕仁天皇賜予的寶劍與屏風就被當成「建國神廟」的「三種神器」。從此滿洲國成為以「國家神道」為主體的國家，溥儀個人也成為「人神一體」的皇帝。然而在過程中，滿洲國數度以正式外交文書提出協助設立「建國神廟」，但自始至終都未曾得到日本皇室與內閣的許可，對日本政府而言這僅是溥儀個人的決定而已。


歡迎滿蒙代表

滿洲國初期的外交困境

在滿洲國成立之前，滿洲大致是呈現「北蘇南日」的勢力範圍控制局面。身為第三國的美利堅合眾國，雖然對滿洲的經濟意圖起步最晚，但是對滿洲利益的雄心卻是列強中最為明顯者。在前述「李頓調查團」報告尚未形成結論之前，美國就對歐美、日、中各國發出警告，表明美國將不承認任何中、日兩國之間，違反美國在滿洲利益或違背「門戶開放原則」的協議。同時美國在之前也盡力離間大英帝國與大日本帝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其結果讓「英日同盟」於1923年失效之後不再續約。綜觀其目的，在於美國無法接受滿洲利益由日本、蘇聯或中國任一方獨享；同時也無法容忍英、日兩國聯手坐享在亞洲地區的利益。

「國際聯盟」發表滿洲建國並非是「民族自決」的結論，認為該地區主權雖歸中國所有但建議成為自治區，並要求必須交由「國際聯盟」各會員國派兵執行「維和任務」的主張；外加美國不斷要求滿洲應該在「門戶開放」的原則下，讓列強各國「利益共享」的雙重壓力下，雖然滿洲國外交總長謝介石通電各國要求承認該國「國際法人」地位，但只有大日本帝國在1932年、薩爾瓦多與梵蒂岡在1934年承認滿洲國的獨立國格；然而德國、英國、美國、法國、蘇聯在滿洲國還是設有領事館或是辦事處，甚至連美國也成為滿洲國的前五大貿易國，於是國際間成為一種默認滿洲國「存在」的特殊現象，猶如今日世界主要國在臺灣設有各式名目的「在臺協會」一般。

此外，在1932年滿洲國宣佈建國獨立之後，謝介石外交總長還是順利在邊境、港口接收海關，並建立出入境管制辦法、通商通郵辦法與關稅制度。其間，滿洲國外交部成功在1932年與蘇聯簽訂協議，「東清鐵路」北段改為「滿蘇共管」，讓治權不及於滿洲的中華民國不斷抗議；滿洲國還進一步於1935年順利與蘇聯交涉，以1.4億日圓為代價簽訂《蘇滿關於中東路轉讓基本協定》（日稱《北滿鐵道讓渡協定》）收購該段鐵路成為滿洲國國家所有。此外，與中華民國之間，雖然相互不承認對方的存在，但是滿中邊境的關稅、通郵、通車、通航則依據「訂定條文」的方式維持，並互設辦事處持續雙方的經貿往來。雖然上述外交上的折衝成果，有大日本帝國在背後操作的痕跡，但以謝介石總長為首的滿洲國外交部也是功不可沒。

這樣的外交困境並不止於滿洲國而已，其鄰邦蒙古人民共和國自1924年宣佈獨立以來也同樣只有蘇聯承認其國家地位。蒙古人民共和國在滿洲國建國之後不斷出現邊境騷擾現象，進一步兩國於1935年1月發生「哈爾哈廟事件」的小規模邊境衝突，為弭平滿、蒙邊境紛爭，作為「第三國」的蘇聯建議1935年6月在滿洲國境內的「滿洲里」，召開影像中為邊境劃界而舉行的外交談判「滿蒙滿洲里會議」。這也創下兩個相互不承認的國家外交談判的先例。



滿洲國的外交關係

滿洲國初期的外交處境，非常類似今日臺灣的外交狀況，與各國雖然有實質往來甚至建立相對辦事處，但是始終無法突破外交困境達成實質承認關係。例如蘇聯早在1932年，就先後同意滿洲國在海蘭泡、赤塔、海參崴、莫斯科設置領事館，但因不想得罪中華民國而遲遲未與滿洲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世界各國對滿洲國的外交承認，直到1937年之後才有所突破。1930年代的世界局勢與政治意識形態大致上分為：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制度國家」、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制度國家」與以德國及義大利為首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三種國家制度各有擁護者並相互結盟，反之不同制度的國家則相互敵視對抗。大日本帝國與大滿洲帝國也徬徨於施行「國家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十字路口；然而身為主體國的日本，因為國內軍人干政事態日益嚴重，終究步步往「國家社會主義」方向靠攏。這樣的發展，也嚴重影響到大滿洲帝國的對外關係。

大滿洲帝國於1937年正式與義大利、西班牙建交。同年大滿洲帝國經濟部大臣韓雲階（1894～1982）率領「滿洲帝國修好經濟使節團」出訪德國、義大利、梵諦岡、西班牙，會見教宗庇護十一世、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等各國元首，並簽訂友好貿易協定。德國在不願得罪中華民國的狀況下，多年間一直處於舉棋不定狀態，最後因中國國民黨政權日益親近蘇聯，終於在1938年5月正式承認滿洲國，並將其原先設於新京的總領事館升格為大使館。1939年，大滿洲帝國加入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但在二戰期間並未對「同盟國」正式宣戰；同年，匈牙利與滿洲國建交。1940年之後，隨著世界各國結盟局勢分立更加顯著，斯洛伐克、法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丹麥、克羅埃西亞、波蘭、蒙疆自治政府等國，均先後與大滿洲帝國建交。

1940年3月，由汪精衛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成立，同時與大滿洲帝國交換外交承認。1941年4月13日，日蘇在莫斯科簽訂《日蘇中立條約》，蘇聯承認大滿洲帝國，同時換取該國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承認；同年8月5日，泰國正式承認大滿洲帝國。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緬甸、菲律賓與大滿洲帝國建交。總計截至終戰為止，在當時世界80餘國中，正式承認大滿洲帝國者有23國之多，超過臺灣現今邦交國數字。在非邦交國中，相互簽訂貿易協定或是採取實質外交的國家也包括英、美諸國在內。僅1935年度的統計，英、美兩國就分列對滿洲國第三及第四大投資國，投資金額超過6,600萬日圓（約今日1,000億元）。

圖為1943年11月5日，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會議」。前排坐者左起緬甸國總理巴莫（Ba Maw，1893～1977）、大滿洲帝國總理張景惠、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汪精衛、大日本帝國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泰國代總理旺・威泰耶康親王（Wan Waithayakon，1891～1976）、菲律賓共和國總統勞威爾（José Laurel，1891～1959）、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首領鮑斯（Subhash Bose，1897～1945。鮑斯本人終戰時在出亡日本途中，飛機故障墜毀於臺北松山機場，詳見本社《灰飛的存在》）。



「關東軍」與滿洲國

「關東軍」原本只是協助「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維護鐵道沿線安全的「守備隊」，到了1919年隨著「關東都督府」的行政改制，脫離「關東廳」長官的節制，在旅順成立直屬於天皇的「關東軍司令部」。這項行政制度的改革，確立了日本在「關東廳」的「軍、政分離」，但是也讓「關東軍」實質「獨立」於文官的掌控之外。隨著時代的推移，「關東軍」不再只是負責「關東廳」與「南滿鐵」沿線安全維護的部隊，已經逐漸演變成為控制滿洲地區軍、政大權的勢力。

1928年，區區一個「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1883～1955），竟能逾越權責於皇姑屯炸死「東北王」張作霖；1931年，「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作戰課長石原莞爾以佐級軍官位階，居然凌駕日本內閣與天皇，獨斷獨行全面發動「滿洲事變」，事後再要求日本內閣予以追認其行為的正當性，可見其勢力龐大已然是「國中之國」的姿態。最終「關東軍」不僅在1932年一手策劃滿洲國建國，甚至影響帝國海軍少壯派軍人發動「五一五事件」，挾怨暗殺當時遲遲不肯承認滿洲國政權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犬養 毅。而「關東軍」的「國中之國」理想，具體的落實就是滿洲建國。

滿洲國建國之後，「關東軍司令官」不僅兼任「大日本帝國駐滿洲國全權大使」一職，同時還與滿洲國軍共同防禦滿蘇蒙邊境，成為滿洲國軍的領導單位。1935年，「關東軍司令部」從旅順軍港遷移至新京（如左頁圖），代表著「關東軍」不僅只是防禦日本所屬「關東州」的職務範圍，其控制勢力業已擴及全滿洲。1930年代前後，「關東軍司令官」雖然表面上是在滿洲權力最大的人物，但是政策方針的擬定卻是掌握在佐級參謀軍官的手中，石原莞爾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這批出生在1890年前後的軍人，與「明治維新」初期出身於武士階級的軍人不同，他們大部分都是來自於一般平民階級家庭；尤其是1900年後出生的尉級軍官，更多是來自於貧窮的農村。這些軍官雖然享受「明治維新」為日本帶來的現代化成果，但是也深刻體悟到資本家與財閥榨取社會底層的不平等現象，這也是為何「關東軍」青壯派軍官仇視日本財閥的根本性原因。此外，1873年日本開始施行《徵兵令》，士兵階層大部分都來自日本各地農村，而這些貧窮的農村到1930年代還是不斷出現賣女為娼的殘酷事實，目睹這些慘狀的廣大士兵們當然也支持軍官們的主張。由於日本國內的政治已經被政客與資本家把持，青壯派的軍人對政治的無力感達到極限，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新興而未曾被玷污的滿洲國」自然成為他們理想中國家的出口。

1930年代前後各種政治理想百花齊放，對知識分子而言「國際共產」是顯學；而對於日本軍人而言，既視「共產主義」為寇仇，又對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強烈不滿，這樣的情緒讓「關東軍」對建立「新國家」充滿了熱衷。如果能理解當時日本的社會背景，與其說將滿洲的建國歸咎於「關東軍」的野心，倒不如說滿洲建國是「關東軍」對抗「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具體結果。



滿洲國軍

「滿洲國軍」以陸軍兵力為主體，同時也包含艦艇部隊的「滿洲國海軍」，以及航空部隊的「滿洲國飛行隊」。1932年4月15日，滿洲國公佈《陸海軍條例》並創建滿洲國軍，初期建軍目標為「維持國內治安與國境周邊、河川警備」。部隊的來源，大多是改編自原先張作霖系統的「奉系」部隊、滿洲各省警察隊以及各地區的防範盜匪自衛團成員。1932年建軍之際，滿洲國軍總人數約7萬人接受「關東軍」訓練整編。其後因中國、南洋戰事所需，「關東軍」人員、武器被抽調至各前線戰區，因此從一支「攻擊性武力」漸漸弱化轉型為「防禦型武力」。而原本作為「支援部隊」的滿洲國軍，漸漸取代「關東軍」的部分任務；同時在滿洲地區也開始執行「半徵兵制度」，因此接受「關東軍」組訓後成軍的滿洲國軍隊總數，截至終戰時為止至少達15萬人以上。

滿洲國軍依據《滿洲國政府組織法》（近似滿洲國臨時憲法），陸海空軍均接受滿洲國皇帝統帥，同時軍隊必須效忠於滿洲國皇帝。但是在滿洲國軍隊中設有「日系軍官」一職，在部隊中高階軍官、教官、顧問均由「關東軍」日籍軍官轉任，而這些軍官的調任、升遷均受「關東軍」管轄。因此在實質上，滿洲國軍的軍事行動、管轄均處處受「關東軍」節制。同時滿洲國軍的所有武器、裝備都由日本提供，因此與「關東軍」之間的依存關係就顯得更加密不可分。此外，由於滿洲國軍是與「關東軍」協同作戰，因此軍隊操典、部隊號令、武器名稱都是以日語為主；國家軍務則由「軍政部大臣」負責（「軍政部」後改稱「治安部」、「軍事部」），前後總計有四任大臣分別為陸軍上將張景惠、于芷山（1882～1951）、于琛澂（1887～1944）、邢士廉（滿人錫爾德特氏，1885～1954）。

1932年12月28日，滿洲國制定「陸軍制服」，1935年再制定「海軍制服」。1938年滿洲國開始實施「徵兵制」，年滿二十歲男子必須服義務兵役三年，於每年春季應召入伍新兵20萬人，役男編入滿洲國軍、警察、地方警備隊等單位。而體位不符兵役要求者，則需服三年勞動役。1939年，滿洲國在新京創建「滿洲國陸軍軍官學校」，開始培育本國高級軍官人才。該校招生對象除滿洲人外，也包括日籍（含日本、臺灣、朝鮮）人士在內，其中第二期畢業生朝鮮人朴正熙還於1963～1979年之間擔任南韓大統領。同時為培育軍醫人才，除畢業自「滿洲醫科大學」之需服義務役者外，還創立「滿洲國軍醫學校」，招收中等學校畢業生進入就讀，修業四年期滿後以少尉軍醫任官。此外還有為專門培育蒙古人軍官而設立的「滿洲國興安學校」，除步兵之外，專事培養騎兵軍士官，1941年愛新覺羅・溥傑即於該校擔任教官。影像中為滿洲國的禁衛軍部隊。



滿洲國海軍與飛行隊

1932年4月15日依據滿洲國《陸海軍條例》「滿洲國海軍」正式建軍建軍，此一時期的艦艇由之前「奉系」軍閥所遺留的5艘砲艇組成。由於滿洲國沿海的海防事務交由日本帝國海軍艦艇協防，因此滿洲國海軍主要防務為松花江、黑龍江、烏蘇里江等內陸河川與國境警備任務，軍事顧問則由日本帝國海軍派遣軍官擔任。當冬季河川結冰時，海軍艦艇官兵則轉為陸戰隊從事戰備任務。1934年11月依據《江防艦隊令》海軍「江防艦隊」正式成立，該艦隊成為滿洲國海軍唯一的艦隊。

從日本帝國建軍開始，日本海軍與陸軍之間的爭端不斷，這樣的矛盾也殃及滿洲國海軍。1939年2月15日，「關東軍」為了不讓帝國海軍插手滿洲國海軍事務，竟然將軍事顧問改由陸軍軍官擔任，同時將滿洲國海軍編入滿洲國陸軍之下改稱為「滿洲國江上軍」，艦上官兵一律改著陸軍軍服，至此滿洲國海軍等同宣告解散。到了1944年，原本遠離戰火的大滿洲帝國由於身陷美軍的轟炸半徑當中，因此開始著手將艦艇主砲撤除改裝高射砲，或將部分商船加裝高射砲與機槍，以增強對空防禦能力。

「滿洲國軍飛行隊」成立於1937年2月，主要基地位於新京飛行場。在建軍之初，以帝國陸軍「九七式」戰鬥機以及「隼」戰鬥機為主力機種。之後，為因應來自蒙古與蘇聯的空中威脅，於奉天與哈爾濱相繼成立「飛行戰隊」。1940年，將各飛行戰隊整合成立「滿洲國飛行司令部」，同時開設「陸軍飛行學校」，專職訓練滿洲當地飛行人才。該學校也接受「滿洲航空」委託，代為組訓該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滿洲國軍飛行隊」在極盛時期，擁有各型戰機約110架。

滿日聯軍航空部隊首次對外的大型實戰為「諾門罕戰役」。在第一階段的戰事中，由於飛行員素質優於蘇蒙聯軍，因此不論在戰鬥或轟炸均取得壓倒性優勢。在第二階段的戰役中，蘇聯投入超過滿日聯軍2倍以上的戰機，並調動於「西班牙內戰」中具豐富實戰經驗的飛行員參戰。雙方激戰結果，在戰役期間，滿日聯軍遭擊落64架、受損93架；蘇蒙空軍被擊落與墜毀249架，受損機數至今不詳。滿日航空部隊的表現固然優異，但上述的損失數字已佔全部航空兵力的60%。然而反觀蘇聯在蒙受重大損失之後，卻能源源不絕補充戰機，兩者國力相較勝負之間顯而易見。此外，1945年滿洲國的工業地帶與軍事基地遭到來自成都的美軍轟炸機攻擊，滿洲國飛行隊組成「蘭花特別攻擊隊」對美軍B-29轟炸機展開衝撞式攻擊作戰。

溥儀為強化滿洲國軍隊的愛國思想與精神力量，1940年在「建國神廟」鎮座之後，發想源自日本「靖國神社」的滿洲新京「建國忠靈廟」在9月18日舉行鎮座儀式。該廟中祭祀建國前後為滿洲國犧牲的文職、軍人與警察，總計24,141名，其中包括日本、滿洲、蒙古與俄羅斯人等不同族群。影像中即為鎮座當天景象，儀式由溥儀親自舉行祭拜，滿洲國軍隊齊聚在廣場致敬。之後還在「建國忠靈廟」舉行遺族追悼紀念儀式，參加者包含上述各民族犧牲者的遺屬。



由於在「滿蒙邊境問題」上雙方歧見甚大，日蘇不斷在邊境增兵，雙邊關係外弛內張。而蘇蒙基於「相互防衛」簽訂《蘇蒙相互援助議定書》，刺激日本加速與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至此，滿日、蘇蒙兩軍事同盟對峙態勢日趨明顯。由「關東軍」負責訓練編組而成的滿洲國軍，雖然擁有26個步兵旅與7個騎兵旅，但是由於缺乏實戰經驗，不足以防衛滿洲東北方、西方的漫長國防線。因此滿洲邊境的國防安全，實際由「關東軍」部隊負責駐守。而在滿蒙兩國邊境線上，基於維護滿洲國與蒙古國主權考慮，日蘇兩國主力部隊均只擔任第二線的增援防禦，第一線邊境駐守部隊則由總數7萬名的滿洲國軍，與蒙古國「蒙古人民革命軍」相互對壘。至於由蘇聯組訓、裝提供備的「蒙古人民革命軍」，至1939年已擁有8個騎兵師及1個裝甲旅兵力。影像為1939年「諾門罕戰役」中日軍配備的「九五式」輕戰車與「九七式」戰鬥機。

滿洲來去

6 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 蘭花綻放下的虛與實



「王道樂土」的誕生

「王道樂土」是滿洲國引以為傲的主張，同時也被當成滿洲建國時的政治標語。提出此一主張背後的「關東軍」青壯派軍人，不僅只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同時大多數也是「亞細亞主義者」。日本在1880年出現「興亞會」組織，該會的主張是為了對抗西方列強對亞洲的蠶食鯨吞，需要促進清帝國、日本、朝鮮各國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合作。在日本成功現代化之後，如何協助亞洲各國儘速現代化脫離西方列強的掌控，讓亞洲成為一個區域性的聯盟，就是「亞細亞主義者」的主張。這個主張在當時確有其必要性，但是由於日本自負於成功達成現代化的經驗，眼見其他諸國依然積弱不振，心急之下便以「指導者」自居對他國動輒指點，以致造成各國反彈。

具有「國家社會主義」與「亞細亞主義」思想的「關東軍」領導層，從向來的「日本統治滿蒙作為日本、朝鮮屏障」的思考，漸漸轉變成為「讓滿蒙從日本獨立而出」的極端想法，面臨這種「獨立威脅」的日本政府看在眼中也只能默認或追認「關東軍」的種種暴走行為。而「王道樂土」這個政治主張的背後，其實就蘊含了「與日本不同政體」的意涵在內。被稱為「關東軍的大腦」的石原莞爾進一步認為，應該鼓勵有志一同的日本國民，放棄日本國籍成為新國家滿洲國的人民，並將滿洲努力發展成為匯集亞洲移民的「東方的美利堅」，因此在「王道樂土」的目標之下，其人民追求的目標是「五族協和」。

所謂的「王道」其實就是站在西洋文明「霸道」的對立面。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雖然成為可以與歐美比肩媲美的現代化國家，但是「關東軍」的領導層認為一味的崇尚西方思想，進而丟棄東洋的傳統美德，稱不上是一個完整的哲學文化思想。特別是到了1920年代之後，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思想家認為，西方國家動輒以武力征服弱小民族是一種船堅炮利的「霸道」行為，而東西雙方最終必然會演變成為「王道」與「霸道」對決。而西方列強之所以成為「霸道」，其根源在於講求「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資本主義」競爭所造成。「關東軍」的「反財閥」思想，充分體現在其所控制之下的滿洲國建國初期經濟政策上，並且極力抗拒日本內地資本家進入滿洲市場，直到「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時期才被打破，但還是對於財閥跨業種經營設下重重障礙，最終形成「國家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

「王道樂土」原本就是「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而任何的哲學思想在理論階段都是極具理想性格的美夢，然而落實到執行層面之際，因為人性的的陰暗面往往會造成極大落差。滿洲國的「王道樂土」政治主張，同樣是具有柏拉圖式「理想國」的遙遠夢想。









大滿洲帝國的「五族協和」

大滿洲帝國全境土地面積1,133,437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面積的3倍、臺灣面積的32倍，但是1932年建國之際全國人口只有29,288,000人。由於境內民族組成複雜，因此在建國時就標舉「王道樂土、五族協和」，作為國家的中心思想與建國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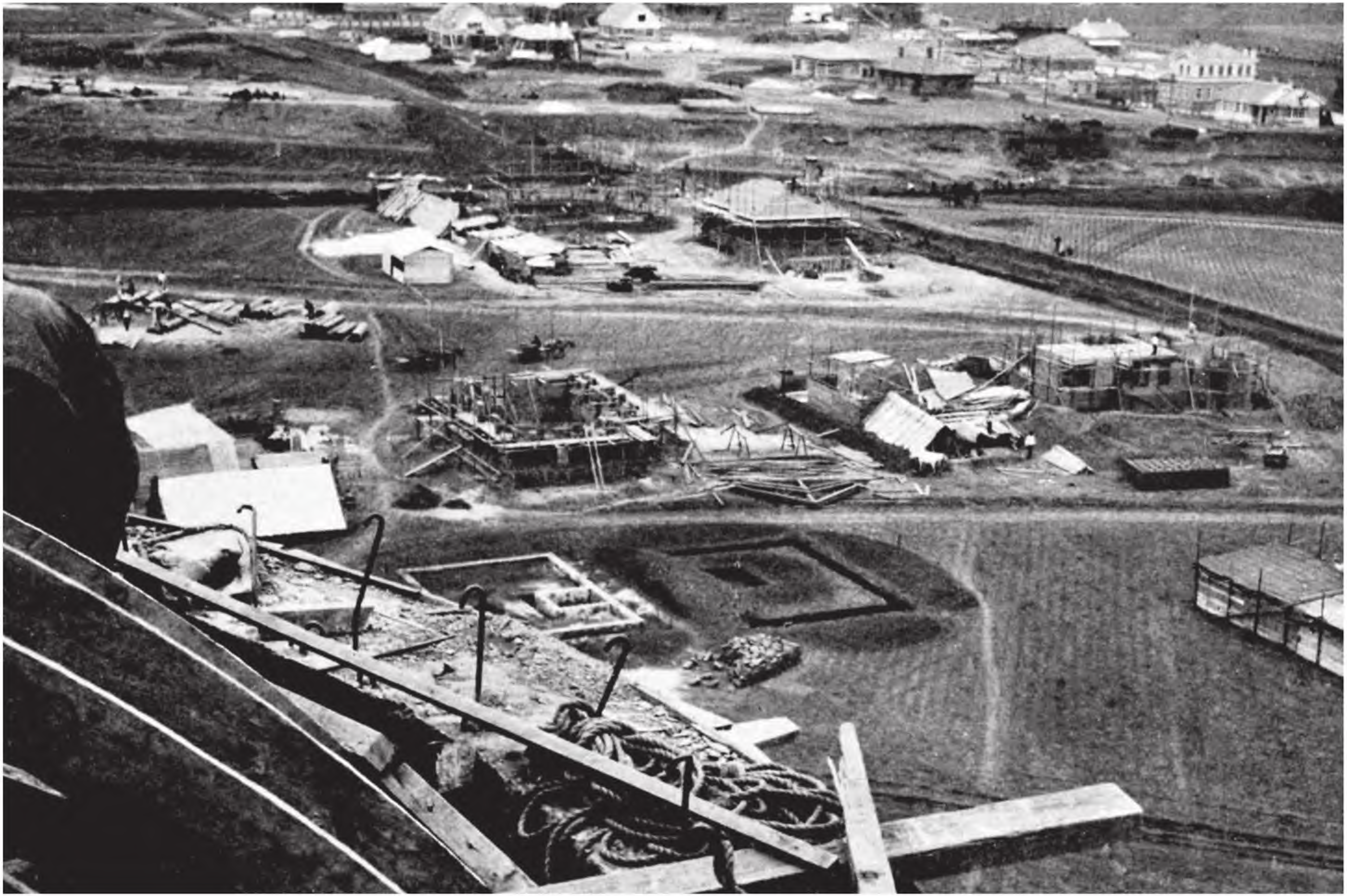
滿洲國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在1942年所做的國勢調查中，全國人口總數達到44,242,000人。其中滿洲人大約39,885,562人，約佔94.65%；但是所謂的「滿洲人」當中，滿族約180萬人、蒙古族約70萬人，其餘皆為漢族。日本人（含臺灣本島人與朝鮮半島人）為2,128,582人，佔人口總數的5.18%。其他則為俄羅斯族或猶太族以及他國人士，約佔人口總數的0.16%。此外以都市人口而言，依照總數多寡依序是：奉天、哈爾濱、新京、大連、安東、營口、吉林與齊齊哈爾，總數約在300萬人，都市集中化現象並不明顯。

地廣人稀的滿洲，到處都有尚未開發的土地與機會，而這正是機會主義者、理想主義者與拓荒主義者的天堂。因此來到滿洲闖天下的人，大都懷抱著滿洲是「樂土」的浪漫主義思想，這種心理非常類似19世紀美國人由東部往西部開拓發展的「大拓荒時代」狀態。其中移民滿洲人數最多者為中國境內的漢族，這些移民者大多從山東搭船，攜家帶眷往滿洲移動。由於中華民國建國以來連年的兵禍與饑饉，讓其國民被迫離鄉背井往地大物博同時正在積極開發中的滿洲前進。同時因為滿人的漢化，因此滿洲當地普遍使用漢語，語言上的便利成為漢族移民的重大考慮因素，這與近年臺商西移中國拓展的道理相同。在滿洲國成立之前，每年大約有20萬人前往滿洲，在滿洲國建國之後每年移民人口則多達百萬人以上，這也是滿洲漢族人口比例居高不下的最大原因。然而，這些毫無身家背景的漢族移民到滿洲後，從事的大多是苦力的工作。

此外，在大清帝國覆亡之後，許多滿族人與蒙古族王公為了避免被漢族誅殺，大多隱姓埋名掩藏自己的身分；大滿洲帝國成立之後，藉此機會回到屬於自己故里的滿蒙人口也不在少數。至於朝鮮族方面，移民滿洲的歷史已有數世紀之久，這些移民大多在滿、朝邊境一帶務農或從事貨物買賣。在1910年「日韓合併」之後，日本帝國積極鼓勵朝鮮的貧農前往滿洲打天下；然而許多朝鮮「半島人」藉著自己是「日本人」的身分，在滿洲胡作非為、藉機對當地居民報復，為日本增添許多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日本籍朝鮮「半島人」的惡形惡狀，之後隨著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更是變本加厲，這恐怕是日本戰前「國家政策」中最大的敗筆。

俄羅斯人大都集中在滿洲北方或是哈爾濱一帶，其中絕大多數是1920年前後反抗俄國共產革命時逃離的「白俄」人士，他們在滿洲開店做生意維生或是以逃難時帶出來的家產過生活。而俄國裔的猶太人，則是在1930年代史達林「大清洗」時期，被強迫從俄國各都市流放到西伯利亞地區自生自滅的難民，之後尋求管道逃離到滿洲定居。

影像中從左至右依次為滿洲國中的鄂倫春族、漢族、俄羅斯族與朝鮮族。



滿洲國的第一期「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

在滿洲國建國之後，「關東軍」主要任務在於維持滿洲的國防，同時培育滿洲當地警察與滿洲國軍隊。在經濟建設上，「關東軍」基本上還是透過「南滿鐵」作為建設的基幹。在1937年至1941年這段時間，滿洲國的第一期「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集中於都市規劃、上下水道、公共設施以及各項農、牧、礦、工業的產業開發計劃，期待能建立滿洲國的工業發展。

當時「南滿鐵」開始大量在日本國內招募日籍員工，並且以高於國內3倍左右的薪資吸引人才。在此同時，滿洲國各官署也開始大力招募滿洲當地人才，經過文官訓練之後進入各官方機構服務擔任公職。在當時，滿洲國的官方法定語言是滿洲語（北京語）以及日語，各項文書均以上述兩種語言發佈，因此擔任國家公務員的前提是必須通曉日文（這與1949年之後，在臺灣擔任公務員必須通曉北京語的道理相同；反之，許多原為日本國民的臺灣人公務員，因為不懂北京語，遭到中華民國政府以「不適任」為由解任）。

「關東軍」對滿洲國的期待，是將其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國家，而且必須強大到足以與北方的蘇聯對抗，滿洲國等同是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的最前線，進而保障在滿洲後方的朝鮮與日本的安全。而在經濟上，「關東軍」並不希望日本國內的財閥直接進入滿洲，因為「關東軍」希望在滿洲這片樂土上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因此歐美的「資本主義」以及蘇聯的「共產主義」都不是「關東軍」的選項。為了建設滿洲成為強大的國家，在第一期的五年計劃中由日本政府直接或透過「南滿鐵」投資滿洲的金額，最初預定為11億6千萬日圓（約今日1.7兆元）。這個龐大資金當中的80%交由「南滿鐵」及其相關子公司運用，作為建設滿洲各地的經費；其他的20%則是作為支付滿洲國政府各部門及其官員的運作與開銷。

在滿洲國建國之後，「南滿鐵」的組織與營運也產生極大變化。原本屬於大日本帝國的「南滿鐵路」新京以南路段，無償讓渡給滿洲國政府，而滿洲國再委由「南滿鐵」代為負責營運；至於新京以北的路段，則是由滿洲國與蘇聯合資成立「北滿鐵路」共同營運。1935年3月23日，大日本帝國、滿洲國與蘇聯經過多年折衝、多次討價還價之後，簽下《北滿鐵道讓渡協定》，蘇聯將「北滿鐵路及其附屬地」以1.4億日圓（約今日2,000億元）的代價賣給大滿洲帝國，其背後出資者實為日本政府，但由「滿洲國有鐵道」統一負責管理。1936年10月1日，公司改組為「滿洲國鐵路總局」。而原有屬於日本的「南滿鐵路附屬地」，也在1937年11月5日撤銷日本的治外法權併入滿洲國。

如影像中的新京初期開發為例，要如何從零開始將一片遼闊荒蕪之地，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國都，其工程之浩大不難想像。如參考次頁影像，更能發覺其中的天壤之別。


タイプライター

第二期「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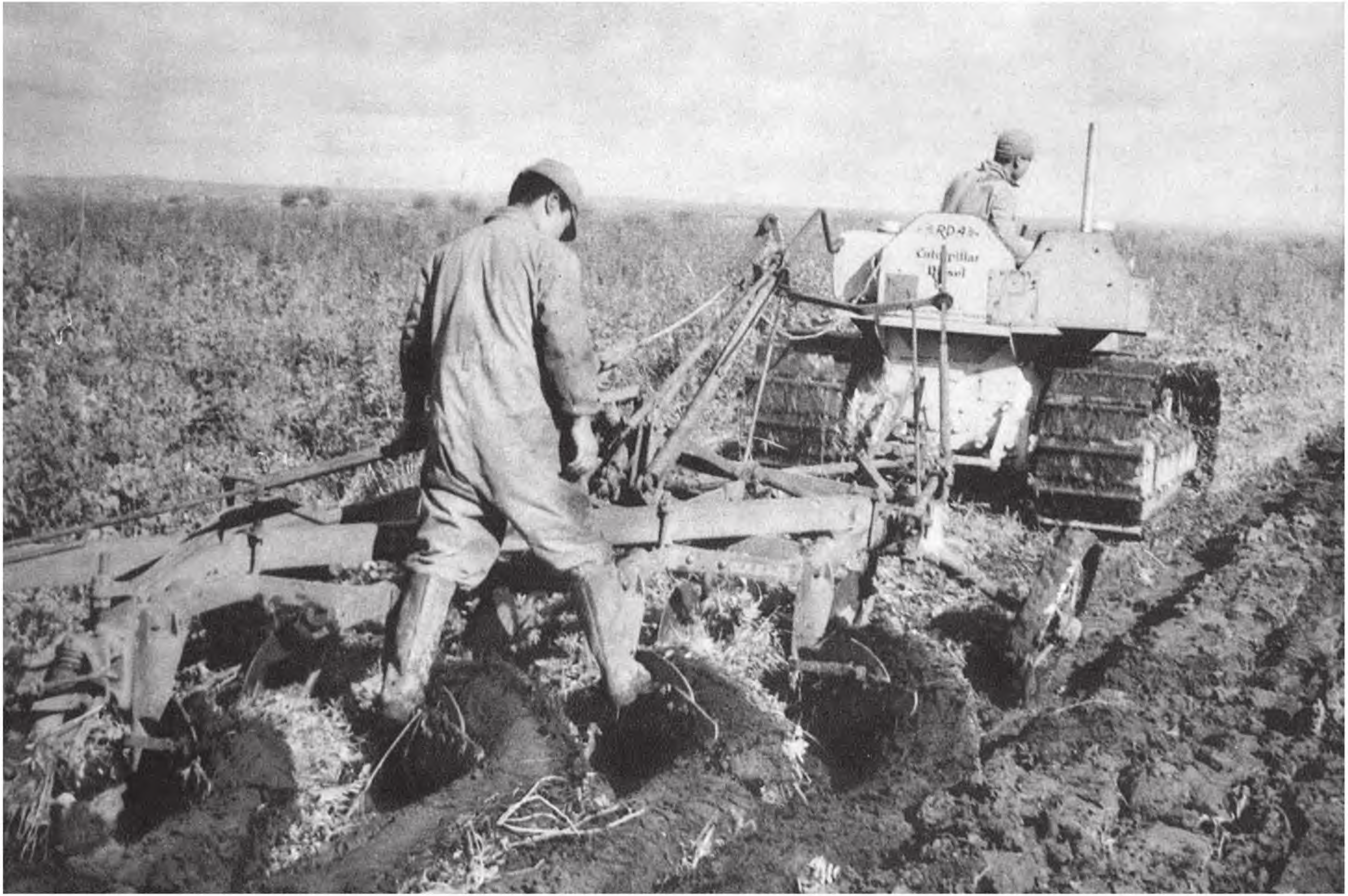
以滿清末年至民國初年的客觀條件，中國政府根本無力控制滿洲，其結果不是俄羅斯揮兵南下佔領滿洲，就是日本北上佔領滿洲。滿洲處於兩大強國的角逐之下，不論是「日清戰爭」或是「日俄戰爭」的結果，都在在說明滿洲不可能成為中國所能統轄的領土。站在滿洲人的立場而言，如果相較於俄羅斯的沙皇式高壓統治，或是之後史達林式的恐怖統治，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下，選擇日本恐怕算是上策。這也是在滿洲國成立之後，滿洲地區並未發生重大反抗的根本原因。

大日本帝國在滿洲的經營，不僅只在於國防上的需求，更是日本政府的一項空前重大投資，並非殖民地主義式的單向經濟榨取。透過「南滿鐵」募集資金在滿洲展開積極建設並藉此獲利，因此滿洲又被稱為「日本的生命線」。然而滿洲建國之後單純以經濟投資為考量的「南滿鐵」與「關東軍」角色主客易位，整個滿洲都在「關東軍」的掌握當中，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反而在「關東軍」的支配之下。先前在後藤新平總裁時代所喊出「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的口號，也儼然成為「關東軍」獨立於日本法治體系之外的堂皇理由。由於「關東軍」的核心是軍人而非政客或是資本家，因此採取反資本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立場」。在滿洲國成立的初期，「關東軍」帶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與理想主義思想，真心想將滿洲建設成為無財閥階級的均富國家。這也是「王道樂土理想」的目標之一。

但是，理想終究不敵現實。單獨靠滿洲國政府與「南滿鐵」對外募資的金額投入在廣闊的滿洲土地上猶如杯水車薪，因此如何獲得更多包括臺灣在內的各地資本來提供滿洲更廣泛的建設，成為「關東軍」十萬火急的要務。1936年，原本擔任日本「商工省工務局長」的岸 信介（1896～1987，後為日本第56、57任內閣總理大臣）到任滿洲國實業部總務司長，在岸 信介的強力說服與牽線下，原本拒絕財閥前來投資的「關東軍」終於同意由「日產集團」出資投資滿洲，並設立「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作為控股公司，正式展開空前規模的第一期「1937年～1941年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該公司初期資本額為4億5千萬日圓，滿洲國政府佔有其資本額的一半，同時該株式會社保證10年之內必須每年至少上繳給滿洲國政府6%以上獲利金額。

為了讓日本國營的「南滿鐵」以及包括民營的「滿洲重工業開發」等大型資本能順利進入滿洲，滿洲國國務院在第一期「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時期頒發《重要產業統制法》，規定每一種業別只准許一家公司投資專營的「一業一社」原則，避免公司之間資本主義型態的惡性競爭，這也確立了滿洲國「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的總投資金額初期為26億日圓（約今日3.9兆元），之後隨著投資擴大與政策需求最終追加至50億日圓（約今日7.5兆元）。其投資標的則包括建造工廠、經營交通、鋪設水電、建造水壩等等項目。而第二期計劃也以同等預算金額於1942年展開，集中於與重工業相關的建設。

對照前頁影像中1935年新京「新發屯地區」荒蕪一片的照片，左頁影像為1939年該地區開發過後成為「新發路商圈」的景象，兩相對照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RDA
Caterpillar
Diesel

「滿洲拓殖公社」與日本內地移民

早在1906年，「南滿鐵」第一代總裁後藤新平就已經看見滿洲的未來與潛力，因此大力鼓吹日本國民能夠移民滿洲。但是對於大多數日本國民而言，非不得已否則絕不願遠離家鄉移民滿洲，因此後藤新平的倡議幾乎沒有太大成效。

1935年，滿洲國政府、「南滿鐵」、三井集團、三菱集團共同出資，成立了「滿洲拓殖株式會社」，開始有規劃性的鼓勵日本內地人組成「移民開拓團」前往滿洲開拓。該株式會社在1937年8月擴編為「滿洲拓殖公社」，總社位於新京。「滿洲拓殖公社」的主要工作是招募移民、為移民者設置必要設施、提供移民者融資、取得並分配「移民開拓團」所需的土地、對移民開拓者所組成之農會或機構提供設施及融資，以及其他移民到滿洲國開墾之必要協助。在日本政府的計畫中，預定從日本內地外移至少一百萬戶農民，前往滿洲進行拓荒。從1935年「滿洲拓殖株式會社」成立之後，立即使用大量文宣進行滿洲的介紹與宣傳，同時積極在滿洲各地進行土地購置行動。該社在1943年間，僅日本籍職員就已經超過3,300人以上，除了總社之外，在東京與新京也成立分社，同時在滿洲各地擁有13個事務所、55個出張所，提供移民者所需的各項服務與指導。

「滿洲拓殖公社」在滿洲收購的農地以尚未開發者為主。由於南滿洲地區開發幾乎飽和，已無適當土地可收購，因此為日本「農業移民開拓團」所準備的工作土地，大都集中在北滿洲人煙罕至之地，特別是在滿蘇交界地區。這樣的舉措，讓1945年8月9日蘇聯突然進攻滿洲時，日本移民因為首當其衝而蒙受極大死亡後果。「滿洲拓殖公社」最終於滿洲收購了2,000萬公頃的土地，佔滿洲國14％國土，其中有350萬公頃是從滿洲人已開發的土地中購得。這樣的大片面積工作，依靠傳統的人力、獸力並無法滿足勞動力的需求，因此連在日本國內少見的大型農業機具，也在北滿洲的「開拓團」農地上出現（如圖）。

大日本帝國的「滿洲農業開拓移民推進計劃」，其具體內容是希望從1936年～1956年20年之間，能鼓勵100萬戶、500萬人移居滿洲。在計劃推行開始至日本戰敗為止，農業移民總數大約只在27萬人左右。基於「移民滿洲」的國家政策，日本各農業縣鄉間村長、村幹事開始前往農家積極鼓吹移民。其主要說服的對象大都為貧農，或是無土地繼承權的非嫡長子家庭，政府還承諾前往滿洲開拓的男子可以免除兵役。因此這些在日本幾乎毫無經濟前景的家庭，在政府的鼓勵下來到滿洲耕種，同時從政府獲得在滿洲的土地購置、房屋建設、農具購買、生活津貼以及前往滿洲旅費等等的高額補助獎勵。




蒙満け拓

「滿蒙開拓團」與「青少年義勇軍」

日本內地的「滿蒙開拓團」報名者在申請通過之後，接著要進行身體檢查、體能測試。原本就是出農家子弟身的「滿蒙開拓團」團員，無須特別進行農事方面的訓練，只要教導其適合在滿洲種植的農作物知識即可。滿洲國成立之後，橫行於滿洲的馬賊大多已經絕跡，但是在滿蘇、滿朝邊境還是有少數土匪出沒。因此，男性團員要先接受軍事訓練，女性團員則先接受護理訓練，方能確保與維護本身的安全。

初期實驗性質的第一批「滿蒙開拓團」人數約為500人，於1932年被送往滿蘇邊境的佳木斯。在「開拓團」到達屯墾地之前，「滿洲拓殖」的先遣部隊已經先行抵達該地，將生活所需的基本居住、炊事設施建設完成，移民遷入之後可獲得土地分配。基於移民安全與生活習慣上的考慮，「開拓團」是以「團體」為單位遷入開墾地，一方面便於守望相助，另一方面在農業機具的使用上則更有效率。土地廣大的滿洲，讓移民每戶持有土地幾乎都在10公頃以上。左頁左圖即為位於滿蘇邊境的佳木斯「東海村開拓團」農民合影。

自1936年起鼓勵農戶移民滿洲，截至1945年戰爭結束為止，日本總共輸出了「開拓團」881團，移民戶數為46,000戶。由於每戶移民都擁有10～20公頃土地，因此在農忙時期即使擁有機械也不足以應付龐大的勞動量。所以「滿蒙開拓團」的日本移民只好在當地尋找勞工，最後演變成日籍「小地主」與滿洲「長工」之間的關係，這是在「開拓團」設計之初所料未及之事。特別是於1945年日本政府出爾反爾，連滿洲移民團的成年男子也必須接受入營徵召服兵役，因此擁有廣大土地但是缺乏勞動力的情況更形嚴重。

隨著戰局變化，日本國內成年男性人口急遽下降，因此從1938年開始，日本在國內編組「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左頁右圖）前往滿洲開拓與協助移民團的安全防禦，人數達到86,000人。這批15～18歲、高等小學校以上畢業的青少年，在接受短期的軍事訓練之後，懷抱著為國奉獻的崇高理想遠赴滿洲，在太平洋戰爭後期成為移民滿洲的勞動主力。「青少年義勇軍」除了從事一般農業耕種之外，還要負責衛戍各個「滿蒙開拓團」自治村周遭的治安。

滿洲國成立之後，由於日本與滿洲簽下的《滿日議定書》中明訂，滿日兩國同盟，互相防衛並允許日本在滿洲國駐軍。因此「關東軍」部隊最主要功能在於防禦滿洲國邊境，尤其是與蘇聯及蘇聯附屬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一帶。自1932年滿洲國成立至1934年間，滿蘇蒙邊境即不斷發生「相互越界」、「侵犯領空」、「擅自移動國界」等小型衝突達152次之多，廣大的邊境防務讓「關東軍」兵力疲於奔命。因此「青少年義勇軍」的日本青少年移民也被充當成邊境守衛隊，名義上是在填補人力不足的邊境地區所需的地方治安兵力，實質上則顯示出「關東軍」與滿洲國軍在邊境防務上的兵源嚴重不足。



新京「滿洲國大同學院」與臺灣人

滿洲國培養高級文官的深造教育機構為「滿洲國大同學院」，該學院前身為「資政局訓練所」，創立於1932年7月（如左頁圖）。

「大同學院」召集日本勢力範圍內各地中階層文官、大學畢業生或留日畢業生，經由考試錄取之後，在該學院研修6個月至1年時間作為後日進階高等文官的必經之路。從1932年10月，第一期學生畢業，至1945年終戰為止，共計有19期畢業生，人數超過4,000人。入學考試科目則包含「法制」（日本憲法及民法）、「語學」（英法德俄擇一）、「常識」（政經時事）、「口試及體檢」。日本國籍者（含臺灣本島人、朝鮮人）可報考日語授課的「大同學院第一部」就讀，而1935年至1941年間開設的「第二部」則專收滿洲地區不懂日語之滿、蒙、俄人。

「大同學院」進修課程包含：建國精神、國家政策、政治經濟學、軍事戰略、國際關係、統制結構、民族學、滿洲地方民情。此外，由於「大同學院」學生包含各種不同種族，甚至有俄羅斯人在內，因此針對其語言背景，施以日、滿、蒙、俄等語言教育。而在「大同學院」研修中，除一般體育課程用以鍛鍊體魄之外，「軍事訓練」與「馬術教育」是重點體能課程之一。由於在滿洲偏遠地方，尤其是北滿邊境地區，自大清以來「馬賊」出沒不斷，因此未來官吏派駐滿洲邊陲地區者，必須面對武裝盜匪入侵，軍事課程、實彈操演成為必修科目。

由於臺灣本島人通曉日本語以及漢文，因此不論是在入學考試或是進修課程當中，都比日本內地人、滿人具有語言上的優勢，「大同學院」的確是對想在滿洲發展、擔任官吏者的絕佳途徑。臺灣本島人如果能通過「滿洲語」（北京語）的檢定考試，可依據成績的優劣分為四個等級，任官期間還能獲得每月6～20圓（約今日9,000～30,000元）的「語言津貼」，此舉目的在於務求在滿洲的高等官員都能至少熟悉兩種以上語言，這個制度與日本在臺灣統治期間對內地出身者官吏語言獎勵辦法相同。

1933年10月，「大同學院」第二期畢業生首度出現5名臺灣本島人：法政大學出身的歐陽餘慶（任總務廳法制處參事官兼大同學院教官）、臺北帝大出身的陳錫卿（任文教部參事官）、臺北帝大出身的黃瀛澤（薦任二等任興農部技佐）、早稻田大學出身的黃千里（薦任三等任民生部勞務司輔導科長）、明治大學出身的黃清塗（薦任二等任外交部政務廳）。截至1941年，結業於新京「滿洲國大同學院」的臺灣本島人學員共計有29人，在取得任官資格之後相繼出任滿洲國各單位官員。而朝鮮出身的「大同學院」結業生中最著名者，是在朴正熙（1917～1979）遇刺身亡之後繼任南韓第十任大統領的崔圭夏（1919～2006）。



滿洲中央銀行與貨幣統一

滿洲國在1932年6月15日，由日本政府出資3千萬日圓（約今日450億元），於新京成立「滿洲中央銀行」，統籌管理滿洲國的貨幣與經濟指標；7月1日正式營運之日，合併原本「東三省官銀號」（奉天）、「吉林永衡官銀號」、「黑龍江省官銀號」以及在奉天的「邊業銀行」等銀行，總資本額因此一躍達到8千萬日圓（約今日1千2百億元）。

「滿洲中央銀行」在成立時發行「滿洲國圓」計1億5千萬圓。到1939年配合滿洲國經濟的蓬勃發展，貨幣發行已達到6億2千萬圓，由此數字也可以發現滿洲經濟在數年之間的巨大進展，以當時滿洲國的經濟發展而言，其個人平均所得、國家生產總額早已超越關內的中華民國。「滿洲中央銀行」除了新京總行之外，1933年時在滿洲、日本、中國各地總共設有142所分行或辦事處。而新京總行（如左頁圖）的巨大建築設計師為西村好時（1886～1961），現今的臺灣銀行臺北總行也是出自於他的設計。

「滿洲國圓」發行之初，與中華民國相同採用「銀本位制」，但是1934年美國通過《購銀法案》，由美國財政部購入白銀作為儲備金，此舉造成中華民國白銀外流而引發通貨膨脹。1935年4月，「滿洲國圓」與「中華民國法幣」正式脫鉤，改採與日幣等值的計價方式，實施蔚為國際主流的「黃金本位制」，以確保發行滿洲貨幣的國際流通性以及穩定性。在此之前由「朝鮮銀行」與「橫濱正金銀行」於「南滿鐵路及其附屬地」所流通的法幣，從1935年11月開始進行回收，改由「滿洲中央銀行」發行的「滿洲國圓」進行整合與統一。「滿洲中央銀行」在貨幣發行早期，「滿洲國圓」對日圓的匯率是100：60，到了1935年雙方匯率已形成1：1比例；之後由於滿洲國經濟體不斷成長甚至超越日本成為東亞第一，到1942年時匯率已經逆轉成100：120！「滿洲國圓」最早是委由日本「內閣印刷局」代為印發紙幣及貨幣，至1944年間因為太平洋戰爭戰事延燒到滿洲，運送貨幣的船隻有遭到美國潛水艇擊沉的危險，因此在日本國內調集數十台印刷機，交由「大滿洲帝國印刷局」自行印刷紙幣發行。

「滿洲中央銀行」的設立目的在於確保國家資本、控管金融市場、統一金融貨幣系統、維持金融財政穩定以及規劃滿洲國未來經濟發展方向。1932年時初代總裁為被稱為「財政通」的滿洲鑲藍旗人榮厚（1874～？）出任，副總裁則是由臺灣銀行前任副頭取山成喬六（1872～1960）擔任。1936年之後分別由「日本銀行」出身的田中鐵三郎（1883～1974）、奉系軍人出身的闞潮洗（1888～1952）、「橫濱正金銀行」出身的西山 勉（1885～1960）出任總裁；同期間的歷任副總裁則為「東清鐵道」出身的蔡運升（1879～1959）、「日本銀行」出身的大澤菊太郎、滿洲官僚系統出身的徐紹卿（1892～？）。由上述可知「滿洲中央銀行」總裁、副總裁的人事安排是以「滿日平衡」為考量；同時由於滿洲央行屬於國營機構，高層的任命充滿「關東軍」、「南滿鐵道」、「日本銀行」、「臺灣銀行」、「朝鮮銀行」的相互角力色彩。



滿洲國的農業

擁有廣大土地的滿洲國無疑註定是農業大國，在3,900萬人口當中有3/4是農民，已耕作面積達到16萬5千平方公里，大小約4.6個臺灣全島面積。雖然已開發耕作土地達到上述數字，但是在預定計畫中尚未開發利用的耕作土地居然還有14萬平方公里之多！滿洲的前五大傳統農作物依序是：大豆、高粱、小米、玉米以及小麥，其次才是日本移民遷入之後導入試作的水稻，以及原有數量不多的大麻、紫蘇、棉花、甜菜。1937年開始，滿洲國的農業進入國家計畫經濟時代，除了積極開發北滿洲一帶的耕作土地之外，在已開發的耕地上也採取輪耕的方式提高或控制各種農作物的產量。

在諸多農作物當中最大宗為大豆，1933年時滿洲的大豆生產量達到530萬噸，對外大豆輸出貿易總額高達2億4,800萬圓，佔農作物輸出總額的59%。大豆除了供給食用之外，還能製作成大豆油、醬油、調味料、抽取維生素B；其榨取殘渣豆粕還能作為飼料、肥料，應用範圍極為廣泛。大豆對滿洲國而言與臺灣的甘蔗意義相同，不只是一種農作物而已，同時也是一種工業用的原料。由於滿洲國的大豆佔了當時國際市場的六成以上，因此也是一種可以左右國際期貨的經濟型作物，透過連結南北綿密的滿洲鐵道，其中大約半數的大豆直接輸往歐美海外為滿洲國獲取大量的外匯；17%的大豆用來供應內需市場食用，其餘的則是被提煉成為大豆油。

1940年，滿洲國高粱產量達到460萬噸，僅次於大豆。在臺灣，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高粱只能做高粱酒使用，但其實在滿洲高粱是作為主食用途的重要農作物。高粱的食用方式與稻米相同，經過蒸煮之後食用，也有將高粱磨成粉之後做成烤餅的食用方式。至於水稻的種植則是在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由日本導入才漸漸在滿、朝邊境的鴨綠江一帶展開試種。雖然滿洲的氣溫、降雨量均不利於水稻耕種，但是基於稻米是日本內地與朝鮮移民的主食，只好在氣溫較高的夏季栽培日本內地生長期較短的品種，經過多年不斷實驗，在1910年前後終於成功栽種。但是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滿洲稻米的供應量截至終戰前為止，也只能提供給包含臺灣本島人在內的日本籍居民自給自足而已。

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大日本帝國在糧食供給需求日益增大，因此對「東亞糧倉」的滿洲農作物供應要求也隨之提高。特別是在大豆的延伸副產品上，例如人造奶油「乳瑪琳」、沙拉油、油漆、肥皂等需求量日益激增；到了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進入石油極缺狀態，甚至還從大豆油中提煉出汽油供軍需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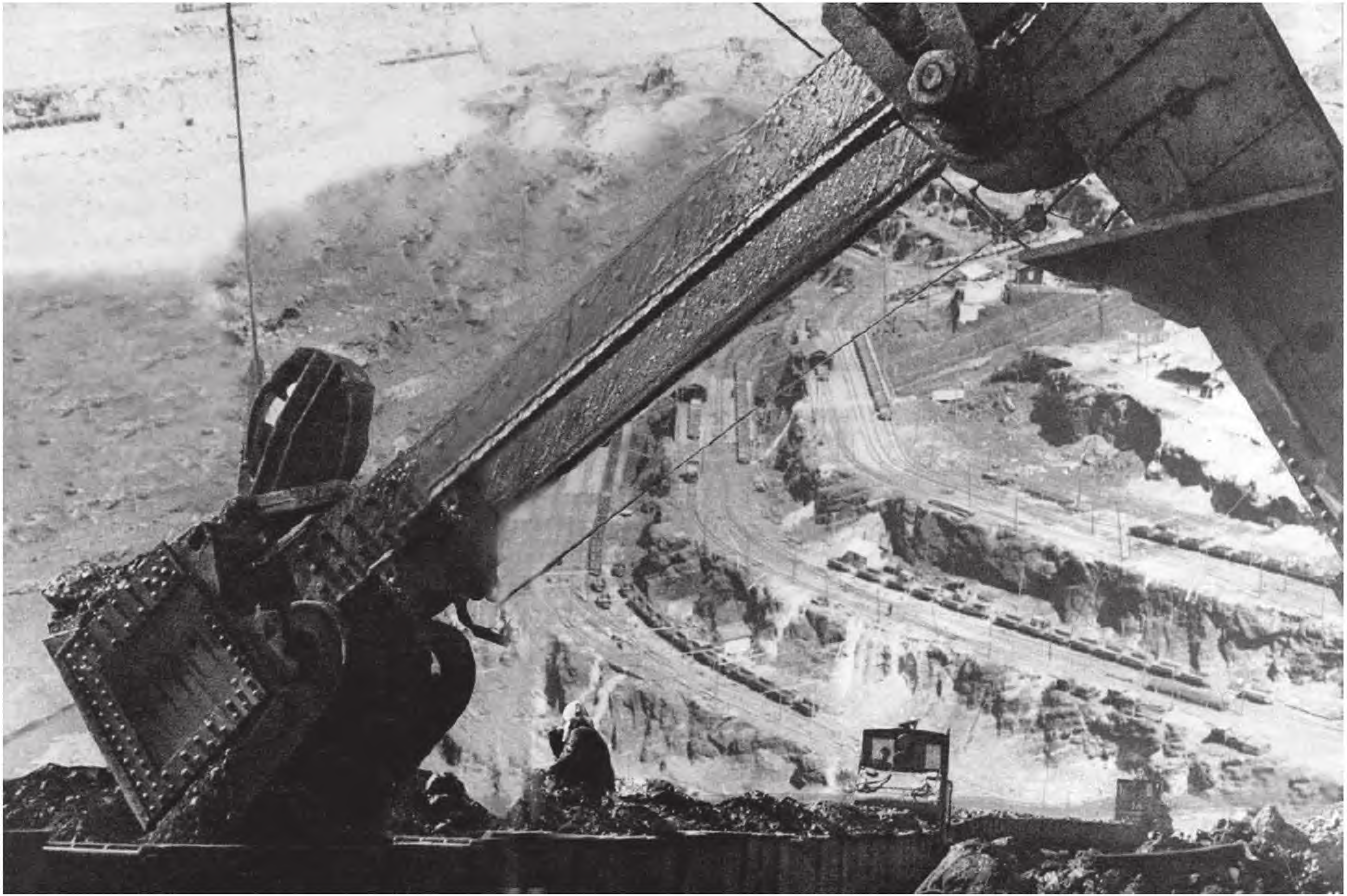
滿洲國的畜牧業

相對於農業的驚人成果，滿洲國的畜牧業也毫不遜色。在日本勢力尚未進入滿洲之前的滿蒙地區，農業與畜牧業是僅有的傳統產業。因為土地遼闊滿洲人農家可以提供數量充足的飼料，而該地的蒙古人則擅長於放牧飼養，因此滿洲毫無疑問在畜牧業的發展上也佔盡先天的優勢。在滿洲國成立之後，靠著日本的技術引進許多科學化的畜牧業觀念與技術，進而成立「國立種馬場」、「國立綿羊改良場」、「種馬育成牧場」、「綿羊合作社」、「馬疫研究所」等機構與設施，提升滿洲畜牧業的品質與產能。

一般提到滿洲，在畜牧業上通常會聯想到羊或是牛。但依據1936年的統計，滿洲國內畜牧物種當中為數最多的是豬隻，數量達到860萬頭；其次是綿羊，數量將近272萬頭；山羊的數量為50萬頭；而牛隻數量為252萬頭左右；作為交通工具使用的馬匹280萬頭、騾數量81萬頭、驢則有75萬頭；另外，在滿蒙邊境一帶還畜養有駱駝，數量為12,000頭。由上述數字當中可以發現，滿洲當地動物性油脂與肉類食品主要來源是豬隻，而數量龐大的綿羊則提供源源不絕的紡織原料，此外牛隻的運用主要在於酪農產業，專門提供乳製品的「荷仕登種乳牛」則是在滿洲建國之後才引進該地。以當時全世界的畜牧業規模而言，滿洲絕對稱得上是「畜牧大國」。

以農業為主體的農家所飼養的牛、馬、驢、騾都僅為附屬性質家畜，主要作為增添農村勞動力或交通工具之用；而綿羊、山羊、豬隻、雞隻的飼養則屬於農耕之外的副業行為。有別於農業家庭，在地滿族人與蒙古人則是以大型畜牧業作為其固有生活方式，因此需要廣大的土地用以游牧放養，其龐大的牛群、羊群、馬群則可視為其「活動財產」。在滿洲建國之前，從關內前來的中華民國移民，常因為擅自侵佔滿蒙族自古以來的放牧草原土地，因此雙方時常發生糾紛、械鬥。在滿洲國建國之後，針對漢族與滿蒙族的土地糾紛，使用法令契約的方式進行仲裁，同時引進現代的法庭訴訟功能與警察制度，因此大幅降低流血事件的發生。

向來滿洲境內的家畜都被滿蒙民族視為私人財產自由放牧，在品種改良上缺乏先進技術。滿洲國成立之後接受「南滿鐵」的建議，銳意推行「畜產開發五年計劃」，積極從品種改良與飼料改良兩個方向著手，由國家出資推廣知識教育與改良輔導，短時間內立即獲得良好成效。由於在滿洲各地成立綿羊的大型示範農場，並且導入機械化生產的畜牧加工產品；此舉使得原先在酪農產品、羊毛原料的取得上十分依賴澳洲的日本，在滿洲建國之後大舉將訂單轉向滿洲國購買輸入，使得滿洲的畜牧相關產業呈現欣欣向榮景象。此外在皮革產業方面，主要交易市場設於奉天與哈爾濱，最大的外銷地則為美國；年度外銷金額從建國前的192萬圓（約今29億元），建國後由於引進日本的生產加工技術，在1933年度就立即一躍增加為323萬圓（約今48億元）。



滿洲國的礦業與石化工業

滿洲國在礦產上種類繁多，其中包括金礦、鐵礦、鉛礦、銅礦、硫化鐵礦、鎂礦、鋁礦、油頁岩、滑石、石棉、長石礦以及石灰，其中含量最豐富的是煤礦，在俄羅斯帝國佔領時期的1900年前後開始積極開採。

在俄國控制下的撫順，煤礦的開採量每年大約只有200萬噸以下。到了1920年，開採量達到每年370萬噸左右；1925年開始每年開採量激增至550萬噸，1934年後更是達到800萬噸的開採能量（如左頁圖）。1941年之後，為了支應太平洋戰爭的需求，撫順煤礦的開採甚至達到1,000萬噸以上的規模；這個數字還不包含黑龍江省、吉林省、熱河省以及奉天省的加總數字。依照推估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之際，滿洲地區的煤炭開採量，每年應該已達2,000萬噸以上的規模。隨著煤炭的大量開採，在各煤田周圍迅速建立衛星工廠與都市，包括煉油廠、化學工廠工業城以及住宅、學校、醫院、公會堂等相關民生設施。滿洲國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礦生產地，煤礦以及由提煉所帶來的石化工業附屬產品，為滿洲的經濟提供強大的血液動能。

在煤炭的開採過程中可一併開採出油頁岩，經過精煉可產出重油、柴油、汽油等燃料及其他的附屬產品。其中重油可提供輪船所需的能源，柴油則是火車與汽車的能源，而汽油則是汽車與飛機所不可或缺的能源；此外，精煉過程中還能萃取瓦斯、瀝青、石蠟、溶劑等等附屬品。在當時石油化學工業尚未發達的時代，石油化學應用範圍不如今日廣泛，如果能持續經營滿洲國的石油化學工業，其產值可能遙遙領先世界各國、獨步全球。

在「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政策中，希望至少能達到各項農工產品「自立自足」的目標，而此一目標憑藉著物產豐富、投資擴大在短時間就宣告達成。1937年因為中日戰爭的爆發，滿洲地區各項產業隨著軍事需求的增加，開發的速度就變得更加迅速，預定計劃達成目標不斷往上調升。以滿洲撫順一地而言，1941年度僅汽油產量，就已經達到1,325萬公升的產能，重油則是16萬公噸。此外，由於滿洲在1944年之前是大日本帝國勢力範圍內唯一沒有受到盟軍空襲的區域，因此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滿洲的生產與軍需工業就顯得更加重要。

滿洲的礦業、工業是由「南滿鐵」、三菱集團、三井集團以及日產集團與滿洲國政府共同經營型式，以合資關係或明訂獲利盈餘比例上繳大滿洲帝國政府，屬於國家所掌控的「統制經濟企業」，滿洲國內有七成企業屬於此一類型。隨著各項資源的開發，提供當地居民工作機會且付予相對報酬，讓滿洲的產業由傳統的農業與畜牧業得以快速轉型進入工業化時代。



滿洲國的重工業

由於滿洲盛產鐵礦，保守估計有超過25億噸的蘊藏量，僅遼寧一地的高含量鐵礦儲量就已超過10億噸之多，因此隨著鐵礦開採冶鐵業也在礦區周邊成形。鋼鐵是重工業的首要條件之一，在滿洲最著名的冶鐵業是設置於鞍山的「南滿鐵」旗下「昭和製鋼所」，以及大倉集團旗下的「本溪湖製鐵所」。滿洲冶鐵工業的產能十分驚人，在1936年間，滿洲全境可生產鐵塊58萬噸、鋼材40萬噸；到了1943年鐵塊生產量提升到171萬噸、鋼材210萬噸。當然其中產量提高的原因是軍需工業的需求，但是也提升了滿洲國重工業蓬勃發展的速度。

滿洲國的重工業發展從建國以來至1943年為止，都維持著高度的成長率。除了製鐵業之外，其他還包括了石化工業、機械工業、窯業、汽車生產、飛機製造、造船、武器製造以及包含製鋁工業在內的各項金屬相關產業。1944年因為戰時統一管理的需求，滿洲各地的製鐵所、冶鐵事業全數整併在本社位於鞍山的「滿洲製鐵株式會社」之下。到了二戰末期，滿洲的重工業、鋼鐵與石油，幾乎成為維持日本繼續作戰的唯一供應地，為了保護鞍山鋼鐵廠不受盟軍空中攻擊，「關東軍」還特地在鋼鐵廠周邊配置當時日本最新銳的「疾風」戰鬥機，由此可知鋼鐵廠對於軍需與作戰的重大意義。

礦業開採與工業生產需要龐大的勞工投入，近世常有人對滿洲的日籍、滿籍工廠勞工，「同工不同酬」的問題提出批判但未能深究其根源。開拓滿洲的各項事業，需要大量的專門技術人員及勞工，而人員取得的方式不外乎是從日本內地、臺灣、朝鮮等地招募，或是從滿洲、中國關內雇用。而日本籍人士大多不願遠赴滿洲工作，因此「南滿鐵」與日本企業不得不祭出「重賞」政策。就結論而言，日籍員工與滿洲當地雇用「同級職」員工薪資的確相差4～5倍，但是因為背景與薪資結構的不同，自然形成「同工不同酬」現象。這就好比：20世紀後期，臺灣企業為鼓勵臺籍員工遠赴中國工作，同樣以數倍於中國當地員工的薪資作為獎勵一般。滿洲國的國力發展，需要的莫過於「資金」與「人才」，在建國之初仰賴日本投入資金與來自日本各地的菁英。但是滿洲憑藉著豐厚的物產與實力，在1941年之後的國家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成果就已經與日本不分上下；1940年代兩國原本的依存關係情勢為之逆轉，日本依賴滿洲的程度已經遠超過滿洲對日本的需求。此時，日本籍員工與滿洲國當地員工的薪資差距逐漸拉近，過去數倍於當地員工薪資的好景已不復返。



滿洲國的經濟與臺灣

滿洲國建國之前的商業活動大都侷限在「南滿鐵」沿線的大都市或是北滿的哈爾濱，在「滿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之前於滿洲境內流通的貨幣達到15種，各式券種則有136種之多，這也相當程度阻礙該國的商業發展。在建國後積極整頓財政、建立稅制，才讓商業活動步向現代化國家的正軌。在「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之下，制訂工業、商業的五年計劃，迅速讓滿洲國經濟體日益壯大；1933年度國家歲出、歲入各為2.3億圓，到1937年度已經擴大到各3.4億圓的數字，這充分反應出滿洲國的經濟成長與建設速度。

滿洲國在1933年進口貿易總額為5.1億圓，而出口總額則是4.2億圓，前五大貿易國分別是日本、中華民國、德國、美國與蘇聯；進口前三大項目為紡織品、小麥以及金屬，而輸出前三大項目為大豆、豆粕以及煤炭。到了1939年，進口貿易總額為17.8億圓，而出口總額則是8.26億圓；由上述數字除了可以發現驚人的進出口經濟成長率之外，其中雙邊貿易總額的82%是來自日本，出現大幅入超數字的主因在於基於滿洲國大規模的國家現代化建設，必須由日本輸入各式原物料以及各型機具。如果單純計算日本以外貿易總額則是出超1.1億圓（約今1,650億元），其主要原因是在1938年滿洲國分別與德國以及義大利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以大豆相關的產品為主力大量對外輸出所致。

臺灣與滿洲的貿易關係始於1905年，初期僅限於日本統治的「關東州」勢力範圍內，從臺灣輸出酒精與糖業相關製品為主；與同時期臺灣對中國福建的貿易量相比等於小巫見大巫，並不特別被重視。1931年「滿洲事變」發生之後情況發生大逆轉，由於福建爆發反日情緒情勢不穩，原本銷往福建或經由福建進行轉口貿易的市場大受影響，短時間內萎縮到剩下25%，因此臺灣本島商品必須另覓市場，而1932年建國亟待開發物資進口的滿洲國成為臺灣出口商品的救星。1932年臺灣對滿洲國出口金額為197萬圓（約今30億元），與前一年相比激增70%之多；以金額而言，臺灣出口的物產以砂糖獨占鼇頭，其次是蜜柑與酒精。而同年滿洲國對臺灣的出口額為1,456萬圓（約今218億元），其中豆粕就佔了1千萬圓，其次是大豆、化學肥料、麻袋以及煤炭。雖然對臺灣而言嚴重貿易入超，但是豆粕是臺灣農民用來作為飼料或肥料等輔助農作物生長用途，因此滿洲國的出口品對臺灣農業有著巨大意義。

到了1938年臺灣對滿洲國的輸出總額達到1,932.5萬圓（約今290億元），與1932年相比足足多了將近十倍；而滿洲對臺灣的輸出也來到2,619.4萬圓（約今393億元）之譜，其中以高經濟價值的臺灣茶最具戲劇性變化。針對滿洲國年需求量達一千萬圓的茶市場，臺灣「茶商公會」會長陳天來早在1932年就振臂疾呼前往拓展市場，在大稻埕茶商響應下當年貿易金額為18,901圓。滿洲建國之前由於臺灣茶需繳付高額進口稅，因此市場被無需繳稅的中國茶所獨佔；但是滿洲國成立之後，臺灣茶與中國茶均屬舶來品平等納稅，品質優良的臺灣茶瞬間在滿洲大獲好評進而寡佔市場，在1938年輸出金額已經突破400萬圓大關（約今60億元）。

影像中為1943年5月，溥儀皇帝前往安東視察「東洋人造絲」工場一景。



「滿洲航空」與滿洲國交通

截至1931年為止日本對滿洲投入18億圓（約今2.7兆元）的投資費用，其中大都集中在與「南滿鐵」相關的經費；1931年至1937年短短6年之間，再行投入27億圓（約今4兆元）作為與滿洲國合資企業的經費。在交通建設上，1933年滿洲國政府將鐵道設施收歸國有委託「南滿鐵」經營，到1939年滿洲鐵路總長度已經達到10,500公里。

除了鐵道交通之外，航空事業也是滿洲國積極經營的交通項目。1931年創立的「關東軍軍用定期航空事務所」，在1932年正名為「滿洲航空株式會社」，業務範圍以旅客運輸為主，兼營郵政運輸、軍事運輸、空中測量、偏遠地區的物資運送、向尚未建立機場的偏遠地區執行空投運補任務、航空器維修與製造等業務。「滿洲航空」旗下為支應各項業務所需，擁有包括日製、德製、美製、英製等多樣化機型，其子公司「滿洲飛行機製造株式會社」甚至還自行研發出「MT-1」型客機。

「滿洲航空株式會社」由滿洲國、「滿鐵」與住友財團共同出資成立，首任社長由國務院總理鄭孝胥長子鄭垂擔任。其母港機場為新京機場，定期航線總長9,000公里，以大連-奉天-新京-哈爾濱-佳木斯為主線；不定期航線則由新京作放射狀通往滿洲各大城市。同時另有飛往天津、平壤、蔚山、東京、大阪、福岡等外埠定期航線。影像中即為1937年6月1日新京-東京首航典禮景象。1937年「滿洲航空」全額出資成立「國際航空株式會社」，負責由滿洲國新京出發，經由東京、印尼、印度、希臘抵達德國柏林的國際航線。

滿洲國的三大交通運輸分別是鐵路、海運以及航空，在上述三項交通工具無法覆蓋之處，則以綿密的公路網作為銜接。截至終戰時為止，「滿鐵」已在滿洲鋪設15,479公里的鐵路，而當時全中國境內鐵路總長度則不及2萬公里。相較於鐵道運輸的完備，滿洲國公路算是起步較慢的建設，此點與臺灣總督府的建設步調先後次序相同。在公路方面，滿洲國建國之初公路總長度僅3,000公里，在經過兩期「五年自動車國道計劃」建設之後，10年間已經擴建至6萬公里，而全中國境內公路總長則不及8萬公里。在滿洲各地區由不同的「乘合自動車」所經營的公共汽車客運，作為中小型城市之間聯絡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彌補鐵道運輸所無法接觸到的間隙地段。原本在滿洲國的交通建設計劃當中，最終希望能在各重要城市間建築與德國相同的無速限高速公路，可惜隨著終戰來臨、滿洲重新劃入中國版圖後無法實現。而原先計畫在新京與奉天興建地下鐵道的計畫，也同樣因為終戰而宣告無疾而終。



滿洲國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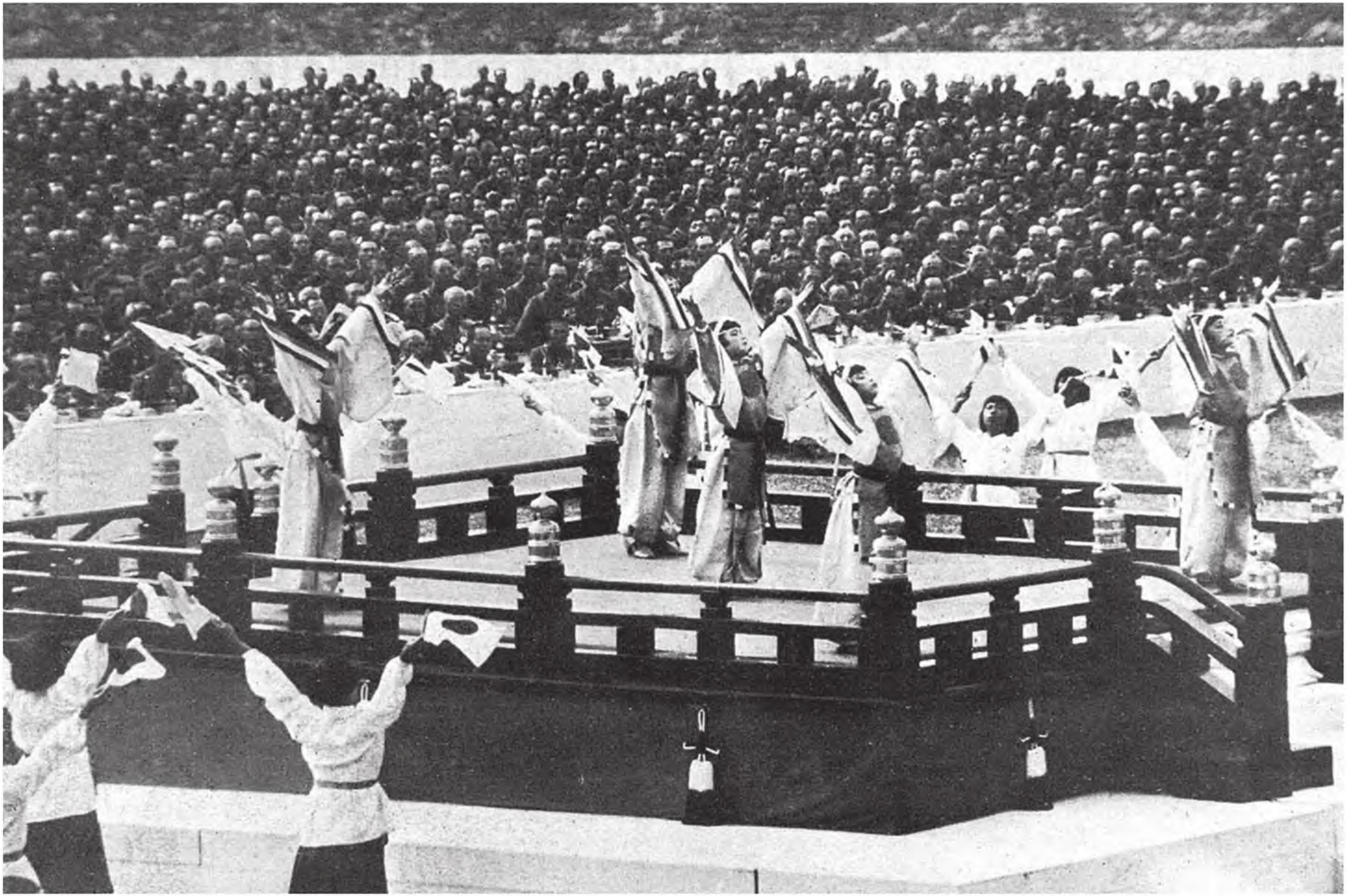
1932年滿洲國建國時，初等教育的人口只有50萬人；至1943年，初等教育人口已達180萬人。其原因在於先前滿洲移民大都為窮苦人家，無力供學童上學接受教育，滿洲建國之後則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因此學童就學率為之激增。

滿洲國的教育以「儒教」為根基，歸屬滿洲國「文教部」管轄，在滿洲全境設立12,000所小學、200所中學、140所「師道學校」以及50所高等教育專門學校。「初級小學校」修業時間4年、「高級小學校」修業時間2年，課程內容包括修身、國語（滿洲語）、算術、勞作、美術、體操以及音樂課；學童在「高級小學校」時期開始修習日文，同時還加上歷史、地理與自然三個課程。其中史地部分揚棄之前的「中華民國史觀」，「文教部」的新版教科書以滿洲為觀點出發，講述從三千年前開始的「肅慎」阿爾泰民族滿蒙史地。中學教育則分為「初級中學校」與「高級中學校」，修業時間各為3年；高等教育部分則設有「師道學校」（師範）、工業大學、醫科大學、畜產獸醫大學、農業大學、女子大學等等。依1941年統計，當年度高等教育學校畢業生人數達到4,600名以上。

滿洲國因為將滿洲語與日語列為官方語言，因此由「高級小學校」開始修習日語，同時設有分為五級的「日本語檢定考試」。進入「高級中學校」就學者，必須達到日語檢定三級以上；進入高等學校或大學就讀時，日語檢定能力必須達到二級以上程度。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因日籍教師佔多數，大都以日語授課，少數則以漢語或蒙語授課；在哈爾濱地區則有25所學校，使用俄語教學。而在小學校授課的日本籍教師，則需學習滿洲語以便教學，並以「滿洲語檢定考試」分級作為「語言津貼」。

滿洲國十分鼓勵女性接受教育，設有多所女子專門學校，滿洲女子接受教育狀況極為普遍。最高學府的新京「女子師道大學」以及「奉天女子師範學校」、「旅順女子師範學校」等，主要是培育未來小學校、中學校的女性師資人才。女子師範學校對學生施以專才職業教育，除了一般科目之外，尚有師範科、農科、工科、商科、家事科、裁縫科、烹飪科、美術科、工藝科、音樂科等類別。修業3年之後，針對學生所學專長分派進入一般中、小學校擔任教席，或是分派進入專門職業學校任教。此外在醫學部分還有「大連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在此教育風氣之下，滿洲國女性社會地位也高過於當時的中國。

滿洲國最高學府為設於新京的「建國大學」，等同日本的帝國大學，從1938年5月開始招收滿洲及日本全境滿日蒙俄各族學生，至終戰為止共計有畢業學生1,400名。「建國大學」設有政治、經濟、文教等科系，同時開設研究所提供畢業生深造。學費則由國家提供全額補助，同時學生一律住校由國家提供津貼。校長由「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兼任，開校典禮時由皇帝溥儀親自到場出席，可見對於該校的重視程度。「建國大學」創立之初充滿社會主義的理想性格，在「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的構想中希望是一所「亞細亞主義的亞洲大學」，學風極為自由。在戰後，「建國大學」畢業學生遭遣送西伯利亞勞改，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面臨整肅的命運。



滿洲國的藝術文化

滿洲在建國之前的藝術活動，以傳統中國北方戲曲藝術居多以及少數聚集於哈爾濱白俄族群中的西方音樂活動。為鼓勵各項現代藝術快速導入滿洲，並且建立屬於滿洲本身獨特的藝術文化，1933年10月在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宗室寶熙、學者羅振玉、財政界榮厚、閣員熙洽以及日本漢學大儒內藤湖南、服部宇之吉、池內 宏、狩野直喜、羽田 亨等人的領銜下，成立「滿日文化協會」。該協會的宗旨在於保存滿洲固有文化、發揚儒教文化、實現「五族協和」理想，進而積極創設各種藝術獎項、展覽與藝術交流活動，期望提升滿洲國民的文化素養以及藝術教化。其中第一要務即為將固有的滿洲文物加以整理、保存於新成立的「奉天國立博物館」，並計畫於新京設立「滿洲國中央博物館」。

在「滿日文化協會」的常務理事也是中國美術學者杉村勇造的籌劃下，1938年於新京順利舉辦「滿洲國美術展覽會」，這個年度藝術展覽的盛會其實是源自於日本內地「帝國美術展覽會」、「臺灣美術展覽會」的相同發想，目的在鼓勵多種族組成的新國家的新銳藝術人才。「滿洲國美術展覽會」從第一回開始，到1945年終戰為止總共舉辦八回；其中分為東洋畫部門、西洋畫部門、雕刻部門、書法部門以及工藝部門。為強調「五族協和」各部門的入選作品包容了各種不同文化的內涵，同時為鼓勵滿洲當地藝術人才參選創作，某些部門入選者還刻意增加非日本籍者的比例。

相較於當時日本與中國，滿洲國的出版審查相對寬鬆，因此在文學領域也培養出許多帶有自由主義、鄉土主義色彩的作品。國族背景不同的文學青年在滿洲以滿文、日文、俄文進行創作，並且以「同人誌」形式發表許多純文學出版物。其中日文的《作文》、《滿洲浪漫》文學雜誌與滿文《明明》、《藝文志》以及以梅娘為主的女性文學與以拜可夫（Nikolaĭ Baĭkov，1872～1958）為代表的俄國文學最具知名度。

北滿洲原本就聚集許多俄國裔人民，西方的音樂對他們而言是與生俱來的素養，創立於1908年的「哈爾濱交響樂團」就是一例。1937年，伴隨著「滿洲映畫」對電影配樂的需求「新京交響樂團」成立，成為南滿地區以日本人與滿洲人團員為主體的交響樂團。上述兩個交響樂團為推廣西洋音樂藝術，不斷推出定期演奏會；其中「新京交響樂團」的常任指揮大塚 淳還在1937年創立「新京音樂院」，成為培養滿洲當地學習西方音樂人才的搖籃。

此外，臺灣人在滿洲樂壇上也扮演「意外的角色」，1942年為擴大慶祝「滿洲建國十周年」活動，滿洲國國務院公開對全滿洲徵選〈十周年慶祝歌〉樂曲，結果當時任職於「吉林師道大學」音樂科助理教授的董清財作品入選。出身於臺灣屏東車城的董清財在「臺南師範」畢業後前往東京「武藏野音樂學校」就讀，於1933年遠赴滿洲發展。影像中即為「滿洲建國十周年紀念祝典」中的藝文樂舞表演「蝴蝶」。演出者穿上黃、紅、藍、白、黑五色舞衣，象徵五行中的東西南北四方位，統一於黃色的「中土」當中。


步步高

滿洲映畫協會

滿洲的電影事業始於20世紀，初期由俄羅斯人導入，上演的電影大都是法國片，而觀眾也僅限於俄籍人士。在1905年日本統治之後，雖然開始輸入日本電影，但是電影藝術始終未能普及到一般滿洲大眾，到1932年滿洲國建立前電影院總計只有30家。建國後日本的大型電影公司雖然屢次想在滿洲設立分公司或製片廠開拓滿洲市場，但是「關東軍」認為電影是對國民的「宣撫教化」工具，始終反對在思想上理念不合的日本資本主義電影公司染指滿洲。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關東軍」深覺成立宣揚「滿洲國政策與建國理念」的大眾電影公司刻不容緩，於是同年8月「滿洲映畫協會」（簡稱「滿映」）在「關東軍」的主導下成立。該公司由滿洲國與「南滿鐵」共同出資，主要事業內容是「電影製作」、「電影輸入輸出」與「電影發行」。「滿映」是屬於「國策企業」（國家特許企業）性質的獨佔企業，攝影機、燈光、佈景、底片、剪接與播放器材等硬體全由國家購置；而導演、演員、工作人員等等也是國家給付薪資酬勞的公務員。

草創初期的「滿映」首任理事長由滿洲皇族金壁東（愛新覺羅・憲奎，1896～1941，川島芳子兄長）擔任，以日本、中國、歐美進口的電影發行票房作為收入，用於支付該公司拍攝具有「滿洲建國精神」電影的相關軟硬體費用。雖然理事當中有曾擔任「日活」製片場所長的根岸寬一（1894～1962）、名製片家牧野光雄（1909～1957）擔任製作部長，然而「滿映」正因為政策性色彩過於濃厚、從業人員大都為外行人士、內部金錢開銷浮濫，因此產出的電影票房慘澹，同時也遭到輿論嚴苛的批評。眼見「滿映」朝不利的方向發展，時任國務院總務廳次長的岸 信介與「弘報處」（新聞局）處長武藤富男決定以撤換高層人事的方式進行改革，由曾任「滿洲國協和會中央總務部長」的傳奇人物甘粕正彥（1891～1945）出任「滿映」第二任理事長。

1939年，集右翼軍人、憲兵、特務、警務、政治人物於一身的甘粕正彥出任「滿映」理事長消息一出，「滿映」社內群情譁然，普遍認為「滿映將成為右翼軍國主義的急先鋒」。然而原本對岸 信介等文人而言僅為「酬庸性質」的甘粕正彥上任後，與「滿映」上下工作人員相處融洽，積極禮聘具有實際製作電影經驗的專業人士加入「滿映」，毫無架子的開明作風與先前風評判若兩人。同時甘粕正彥也致力於拉近「滿映」日、滿工作人員的薪資差距、嚴禁出現之前的女演員出席陪酒惡習、盡力對外集資並從德國引進尖端軟硬體及知識技能，將「滿映」的名聲推向高峰，甚至有超越日本「東寶」、「松竹」、「日活」之勢。

1938年「滿映」發掘生於奉天的山口淑子（漢名李香蘭，1920～2014）演出《蜜月快車》，一片而紅成為滿洲、日本、中國的超級紅星。甘粕正彥在上任後也持續重用這位化名「李香蘭」的「滿映」專屬日籍演員，1943年還出借李香蘭給臺灣總督府拍攝《莎韻之鐘》電影。在甘粕正彥的帶領下，「滿映」配合國家政策，製作出一系列以愛情、親情、古典文學作為包裝的名利雙收「國策電影」。甘粕正彥在終戰之日第二天，召集所有「滿映」員工表達謝意，並將「滿映」公司中所有現金提領發放給滿、日員工，在安頓完員工後於8月20日服毒自殺身亡。


建國十周年慶祝 興亞國民動員全國大會
建國十周年慶祝 興亞國民動員全國大會

綻放的蘭花——滿洲國十年有成

滿洲國自1932年建國以來，由於獨立於中華民國之外遠離戰火，得以維持穩定和平狀態；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又因為成為軍、工、農產業的主要輸出國，不僅一時成為世外桃源的「王道樂土」，同時因為專致於國內各項建設與開發，在終戰前滿洲國已經成為亞洲第一大經濟體，生產總額也名列世界前五大國之林。而滿洲在建國之後尚有大面積未開發土地，因此每年吸引近百萬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加入，至終戰前已開發利用土地面積已達到九成以上。

滿洲國第二任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曾在建國十周年時，列舉滿洲建國之後的重大成就，包括：滿洲國是多民族組成的國家，與英美帝國主義基於人種差別的奴役性質殖民全然不同；滿洲國強化北方邊防，目的在於遏止蘇聯共產南下侵略，維持滿洲國政府的和平運作；歲入從建國之初的2億7千萬圓，到建國10年時已攀升到44億5千萬圓，高達16倍以上的驚人成長率並且持續增加；建國時滿洲國內吸食鴉片者超過130萬人，至建國10年時由於實施「漸禁政策」與「鴉片專賣制度」，吸食者僅剩萬人以下。

由對外貿易輸出的數字變化，也可以發現滿洲國國力的增長。1930年滿洲對外輸出總金額為3.78億，其中農產品就佔了48.7%，其次為農產加工品佔比30.6%，而工礦輸出僅佔10.2%；此一時期的滿洲，只靠農產或是大豆相關產品支撐外貿。由於在1937年的第一期「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中，對工礦產業、交通通信、農牧產業投入60億圓開發經費；在1941年滿洲國已經由農業國發展成為以工業、礦業為主體的國家，而1942年開始的第二期計劃中也預計投入同等規模的經費繼續建設。

在滿洲國產業轉型的背後，支撐工業化需求的電力事業發展尤其驚人。1932年滿洲總發電量能為26.5萬瓩，1934年11月將滿洲各電力公司整合成為「滿洲電業株式會社」。「滿洲電業」為了配合突飛猛進的各項事業開發案，積極著手新設火力以及水力發電廠建設計劃。在「滿洲電業」2萬名以上員工的努力下，經由50道環狀超高壓電線、電纜，將電力輸送到滿洲國各角落；截至終戰時為止，「滿洲電業」已經能供應140萬瓩火力發電，以及水力發電90萬瓩，總發電量能達到230萬瓩規模，相當於當時日本本土的總發電量。在水力發電方面，「滿洲電業」於1934年運用第二松花江的水利資源，興建全亞洲最大的「吉林豐滿水庫」，並在1937年興建「豐滿水利發電所」，於1943年開始對外送電。

影像中為1942年5月18日「興亞國民動員全國大會」大遊行一景，由「滿洲國協和會」旗下各組織推派10萬名代表參加。這場盛會是一連串「滿洲建國十周年紀念祝典」活動的一部分，加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滿洲進入全國總動員時期，因此活動比起歷年更加擴大舉行。一黨專政的「滿洲國協和會」截至1939年為止，將全國9～15歲的少男少女組織成40萬人的「協和少年團」、16～19歲青年組織成40萬人的「協和青年團」，而20歲以上的成年人加入「協和會」者達到130萬人，「協和婦人會」人數則達到20萬人。



滿洲建國十周年紀念祝典

1942年8月8日～11日，為慶祝建國十周年舉行「滿洲國建國十周年慶祝東亞競技大會」。這場於新京南嶺「國立總合運動場」舉行的運動競技大會，包含田徑、游泳、棒球、排球、籃球、軟硬網球、馬術、桌球、橄欖球、足球、自行車、體操、劍道、柔道與相撲等運動項目，開幕式由溥儀皇帝親自蒞臨祝賀。由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比起1940年舉辦的「東亞競技大會」少了美國夏威夷與其殖民地菲律賓的參賽選手，只有日本內地、臺灣、朝鮮、滿洲國、中華民國（南京）、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蒙）推派680名選手參加。

「滿洲建國十周年紀念祝典」從1942年元月開始在滿洲各地進行活動，各項演講、座談、展覽、藝文、運動競技、賽馬、宗教祭祀、燈會以及國民動員，洋洋灑灑幾乎週週有盛會。其中最大的祝典是9月15日在新京舉行的「紀念式典」，日期的選擇上則刻意挑選日本正式承認滿洲國的「友邦承認紀念日」當天。「紀念式典」在當天上午9點於新京南嶺「國立總合運動場」舉行入場式，滿日各界代表萬餘人以及各國祝賀使節團依序入場就座，當溥儀皇帝進入會場時樂團演奏的滿洲國國歌響起，全體來賓肅穆起立致敬，在施放和平鴿、禮炮以及滿洲國飛行隊在會場上空的分列式之後皇帝入座。11時整「紀念式典」正式開始，演奏完滿洲國、日本國歌之後，由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致祝詞、日本駐滿洲國全權大使梅津美治郎致賀詞。接著全體起立在「新京交響樂團及合唱團」的帶領下高唱前述由董清財作曲的〈十周年慶祝歌〉，其歌詞如下：「**八紘一宇奏鈞天，帝德巍巍民具瞻。仁澤溫光被四表，吾儕同頌王道平，祝我滿洲國建國，於茲十周年。**」整個式典最後在〈滿洲國建國歌〉、〈萬歲歌〉聲中結束。影像中則為在新京大同廣場舉辦的「滿洲建國十周年紀念祝典」大遊行一景。

在建國以來十年之間，滿洲國行政、立法、金融、財政體制完整建立，境內的盜匪馬賊也大致宣告絕跡治安狀態良好。隨著1萬2千公里的鐵道鋪設完成，鐵道年載貨量超過8千萬噸，進而各項產業出現4倍以上的傲人成長率。在上述驚人成就與繁榮發展的背後，雖然滿洲帝國是藉由依附日本而存在，但是該國國民以能生活在此標榜「王道樂土」的新國家深感驕傲。況且對於滿洲國民而言，當時眼前只有三個選項：日本、蘇聯或是中華民國。

與其選擇持續戰亂、建設落後的中華民國；或是選擇高壓、掠奪的蘇聯，對滿洲國民而言，寧願選擇在日本帝國控制下暫時成為「權宜性獨立」的國家，因為至少日本是在「建設」與「法治」的前提下干涉滿洲國政。只要滿洲國持續成長，或許等待局勢演變，終究有一天能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況且滿洲人目睹由蘇聯扶植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雖然比滿洲早8年獨立，但是國內建設與發展停滯不前，滿洲國民兩相比較之下更是點滴在心。

然而，這樣的心願終究無法達成。隨著終戰，過往傲視東亞的繁華強盛，宛如煙雲夢土一般，消逝無蹤。

來去滿洲

滿洲國「虛與實」寫真

著　　者：王佐榮
總 編 輯：林信賢
美 編 部：王詠堯
發 行 部：張維忞
電子書格式：EPUB

出　　版：蒼璧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10679 臺北市大安區樂利路86巷4號1樓
電　　話：+886-2-8732-3958
傳　　真：+886-2-8732-5295
劃撥帳號：50309603
劃撥戶名：蒼璧出版有限公司
網　　址：www.warmg.com
製版印刷：金瓚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21年9月
售　　價：新台幣68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頭戴玉飾的女性〉1930／作．伊藤順三
以慶典之際頭戴翠玉裝飾的蒙古族女性作為宣傳主題海報，明顯受到當時「裝飾風藝術」的影響。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懷抱羔羊的女性〉1937／作．伊藤順三
以盛裝打扮的蒙古「布里亞特族」女性作為主題的宣傳海報，其背景採用了北滿洲常見的「虞美人花」作為裝飾。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人聲鼎沸的長春驛〉1924／作・伊藤順三

在月台準備轉乘的不同國籍裝扮乘客，左方為「南滿鐵」的火車、右方為俄國所有「東清鐵道」綠色列車。時鐘黑色指針標示著長春當地時間11：10，而紅色指針則是哈爾濱時區的11：35。下方則附有當時「南滿鐵」的路線圖。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天女〉1917／作・杉浦非水
天女背上的羽翼、腳踩著帶有翅膀的鐵輪、下方橙黃色的東昇旭日，象徵著右下角「南滿鐵」企業標誌的迅速形象。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面具舞〉1930／作・伊藤順三
以滿洲節慶舞蹈作為主題的海報，以外國旅客為對象的簡潔意象呈現當地特有的民俗，同時以「S.M.R.」的縮寫取代一般的「南滿鐵」社名。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鐵道路線圖〉1938

在路線圖上方特別標示出「穿越滿洲平原的新流線，亞細亞號列車」，右側閃電圖示則為「亞細亞號」列車專屬標誌，同時標示大連到哈爾濱只需要12小時30分。



大連汽船株式會社〈臺灣航路圖〉

一目了然的航線圖呈現出該會社滿洲與臺灣之間的航點，從大連直達基隆與高雄。同時臺灣、朝鮮、滿洲、中國之間的相對地理位置、風土人物也以趣味化方式表現。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車輪〉1939／作・春日太治平

為了「南滿鐵道突破一萬公里」而公開徵選的第一名海報作品。以巨大的鐵道車輪與背後的奉天古城描繪出重量感與「南滿鐵」的時代感。

POSTCARD



作者簡介

王佐榮

是廣告人，也是老師。曾任世新、中原大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民視「新聞大解讀‧臺灣文藝復興」單元常任與談人。

目前任職木馬廣告公司與輔仁大學助理教授。

著有《二戰德軍系列》、《連合艦隊系列》、《帝國‧臺灣》、

《李火增攝影集系列》、《鄧南光攝影集系列》、

《東宮行啟》、《百年戰疫》、《淡水新政記》等書。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蒼璧出版
www.warmg.com

ISBN 978-986-06825-2-6
00680
9789860682526
售價：680元